

庞进文集第八卷

# 美抒妙达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特写、报告文学、序言、评论、散文、随笔、信札等九十五篇，共二十二万字，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 20 年代的当下。作者以真切、精到、生动的文学性笔墨，将冰心、季羡林、张中行、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刘成章、吴三大、江文湛、方英文等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的生命轨迹、人文风采、创作成就、独特贡献等跃然纸上。作者所秉持的“文学艺术根源于人本身，其要旨、诀窍，在于情之美抒、思之妙达”等观点，书中亦有比较透彻的阐述。



作者简介：庞进 作家、龙凤文化研究专家。1956 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http://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  
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八卷

美持妙達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八卷

## 美抒妙达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9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58: 00



# 目录

- 主编感言/1
- 橘灯不灭/6
- 冬日访胡采/8
- 王汶石的信念/10
- 李若冰的大漠情结/12
- 黄土地上一寿松/14
- 对作家路遥的龙文化阐释/16
- 感念陈忠实/18
- 呼唤民族精魂 成就一件大事——在陈忠实先生谢世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22
- 圆融：平凹片断/24
- 与凹兄下跳棋/28
- 赞赏与尊重：王愚先生/30
- 刘成章先生/33
- 回复刘老师/35
- 浓郁的色彩 大写的人——刘成章画集序/37
- 寻找：生命的题目——读《我的夏娃》致程海/41
- 读《山匪》/44
- 与方英文下象棋/46
- 宏阔绵延的诗意空间/48
- 田玉川诗的三大意识——序《人的密码》/51
- 乔盛：和苦难较劲/55
- 爱歌/57
- 烈火烧得太阳红——读乔盛《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59
- 如画风景任君描——在乔盛《干部论》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62

乔盛的使命意识

——在乔盛《人才论》《干部论》《领导论》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64

体现民族精神风貌的“这一个”——读乔盛《杨家城》有感/66

朝后看：诗人的勇气与锐目/68

《梦中家园》引发的思考/70

一木三枝 蔚出林表——多重身份的邢德朝/72

情之美抒与思之妙达——序黄伟兴《怦然心动》/75

赤子情怀/79

吴建华与太极城：一放眼一辈子——在《中华太极城传》研讨会上的发言/81

象美意邃 养眼润心——范超散文品读/84

诗文的档次——在陈嘉瑞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89

把天堂带回家——刘爱玲的故事/91

与延鸿飞一起《回家》/98

作家的情怀——序姜华《太极城笔记》/100

他们——写给安康的文学朋友/102

淳朴诚厚说德安/106

美助深情笔作旗——在医斯美资助作家白忠德签约仪式上的讲话/105

壮美的原野/106

洄上：阡陌走韵弹拨声——序韩传栋散文集《阡陌心田》/108

感叹张之沪/110

巴漠有大气象/113

漂亮就是刚刚好——在何红雨新书《女人就是要活得漂亮》分享会上的发言/115

奔突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读山石《世纪流浪》/116

渴望崇高/119

也谈鹏鸣/122

一本好书/124

赤子之歌/127

情深、文朴、哲绪飞——王忠义诗集《心语》序/130

生命的体验、书写与歌唱——序《石尚斋散记》/133

朴素，真挚，暖心——序张岩散文集《心河流声》/136

尊严的呼唤——在《关陇风情》研讨会上的发言/138

文学作品应追求思想出新——在首届阎良富平作家联谊会暨王书明诗集《漆水叙事》  
研讨会上的讲话/140

简评《天水关》/142

歌词的修改（三则）/143

读书有感（四则）/147

发现的锐目/149

文载以碑 木秀于林/150

美莲出湖/151

银户县，文户县/152

江文湛和他的红草山庄/153

画出精神的骨/155

虎来庐中赏内画/157

李敬寅的“梅”/159

苦之美/161

活在艺术中——序韩靖《图说武则天，乾陵》/164

钩沉为友——怀念吴三大先生/165

初识张炎侠/166

痴迷与撞击/168

傅翀/170

驰骋英雄气 纵横中华情——序《多伦多 108 好汉》/173

斑斓多彩汇情思——序《枫国絮语》/175

《枫国絮语》第二辑前言/177

从纸币读加拿大/179

文学艺术的根源/181



散文的“情”与“思” /182  
妙文全在一颗心/185  
悟泉/186  
痛快些，舒展些/188  
意象：智慧与情感的交融互渗/190  
象之河与意之流/192  
也算散文观/194  
一次有关散文的发言/195  
墙上黑点与创造喷发/197  
白纸黑字/200  
不看也罢/202  
“夹缠”的评奖/204  
华山焚书与“爆冷门” /206  
为什么要编这本书/209  
幸运的行当/211  
  
《庞进文集第八卷·美抒妙达》后记/213



# 主编感言

## 1. 缘起

《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未来出版社 1999 年版）这部书，缘起于一次小小的聚会：在中国文化报工作的孙小宁女士从京城回来，她要找一家出版社搞一次书评活动，我向她推荐了未来出版社。第二天她要走，在未来社工作的老同学费润民就约我一块儿为小孙饯行。交谈中，老费谈起了选题的事，问我有没有好的想法。我说前些日子我参与过一家出版社的策划活动，他们想搞一套当代活着的名人谈自己死亡的书，如自撰悼词啦遗嘱啦等等。想法当然很好了，但操作起来怕有困难。因为人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死的好像又都是别人。让活着的人说自己的死，对旷达超脱想得开的人来说，问题不大，对一般人而言，就有些犯忌讳了。这么看来，还是有关“生”的文章好做。未来社面对的是青少年，可以围绕当代名人的童年搞一个选题。老费说对，他们谈“死”，咱言“生”，生比死好……搞一个“名人童趣”怎么样？我说不错，在座的几位也都说好。于是，老费说：“我和社里的头们商量一下，要是定下这个选题，老同学，就有劳你给咱担纲做主编了。”我说行吧。未来社的人都是些干事业的人，事情很快定了下来，之后又商量了几次，将题目改定为《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

## 2. 约稿词

接下来就是约稿了，我花了一个晚上，打出了这样的“约稿词”：

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每一个童年都有一串难忘的趣事；伴随着这些趣事的，是一份天赐的童心。多姿多彩的童趣快乐了生命的春天，开启了心智的扉门，而

纯洁无瑕的童心则为我们的一生注入了求真、求善、求美的基因，使我们无论在哪个年龄区段，一旦回味起来，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多么有趣的童年啊，多么宝贵的童心！

作为一位“名人”，您是某个领域的成功者了。成功者的童年不一定是有名的，但一定是有趣的，这个“趣”可能就在那些曲曲折折、坎坎坷坷、艰艰难难，以及尴尴尬尬、哭哭笑笑、蹦蹦跳跳之中。不觉得吗？童年的牧笛、鸽哨，甚至大呼小叫高唱低吟，都是您的成功之旅最初的号角和瑟音呢。当然，您的童心童趣也无疑会给千千万万个关心着你们的人们以乐生的快慰、成长的启迪和意味悠然的心领神会。如今，您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做一些充满童趣的事情吗？您在浮嚣的时事尘务中还能保持一份童心吗？

《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为您提供这样一个回首当年、焕发童真的机会，您可以尽情描绘您少儿时节的趣事，您也可以写写您成年之后做过的充满童趣的事情。当然，“趣”有多多了，包括天趣、兴趣、乐趣、妙趣、闲趣、雅趣、情趣、理趣、意趣、志趣等等，因此，您的文章可以笔墨多样不拘一格，只要写得生动有“趣”，有“童趣”即可。……

### 3. 赴京

约稿信发出去了，几天后就有了反馈。第一个寄来稿件的，是天津的女作家赵玫。接着，上海的赵丽宏的稿子也到了。看来，这个选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要编好一部书，仅靠发约稿信显然是不够的。得考虑出去组组稿。北京是当代名人会聚的地方，要组稿首先得去京城。经过一番准备，我于1998年6月初出发了。本来出版社要派大员和我同往的，无奈为了准备今年的书市，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一时竟派不出人来。

人一生总要遇一些想不到的祸事：在到京的第二天，一对窃贼就光顾了我，手机、照相机和装在衣袋里的钱被一盗而走。这种事的关键在于破坏人的心情，手机是为了和作者联系方便，出发前才买的；带相机也是为了给作者拍照，忽然一下全没了，能不恨可恶的罪犯吗？能不埋怨首都的治安状况吗？当然更多的还是怨自己：为什么这么大意呀？为什么这几年屡屡遭劫呀？为什么只想着节省经

费而不包房住，结果倒给“六指儿”以可乘之机……

懊丧是难免的，但人不能总滞留在懊丧中。失去，失去，这些年已失去了许多，好在没有失去自己。只要人还在，就得焕发精神，努力地去把事情。我的使命是组稿，我得把该跑的路跑到，把该约的人约到。感谢我们的乡党、“文坛基辛格”周明先生，我的联络本上的许多电话号码，都是周先生提供的。臧克家、赵大年、程树榛、舒乙、陈昌本、叶延滨……电话一个一个打，文章一篇一篇约。最难忘的是和叶君健老先生家人的通话：我说明情况后，话筒里传来叶老夫人低沉悲痛的声音：“你们的选题挺好的，可叶先生没法参与了，他病得很重，我们一直在抢救。他下肢瘫了，手也写不成字了，许多没干完的工作，都放到那儿了……”放下电话，我沉默了。是啊，一盏灯燃到了生命的尽头，就要熄灭了，可这盏灯，照亮过多少读者的心啊！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不也是“灯”的事业吗？前辈之灯是璀璨夺目的，光华四射的，我们的灯怎么能黯淡呢？只有更明亮，更璀璨，才能告慰已经远行和即将远行的前辈，才能对得起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后人……

去张中行老先生家取稿也是难忘的，尽管张先生在电话里已将详细住址告诉了我，可我下出租车后，还是转了几个大圈才找到。是三楼的一个两居室寓所，面积不宽阔，厅很小，尤其对高个头的张先生来说，尤显矮狭。这使我有些意外：像张先生这样的融贯中西、著述丰厚、影响深远的大学者，生活条件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呀。张先生穿一件方格衫子，套着蓝套袖，八十九岁的人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思维还是那么清晰，真是奇迹！他将打印好的稿子交给了我，然后便古今中外地聊起来。由美国总统访华谈到中西体制的差异，由令人忧心的治安状况谈到反腐倡廉，说到某些人的巧取豪夺，张先生道：“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血汗换来的，那些靠不义之财生活的人，他们敢这么说吗？！”其言也铿铿，其情也愤愤。短短的几十分钟交谈，使我不仅看到了一个文化大家的睿智，也看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清正和率真。我想，如果我们能活到张先生这么大的岁数，我们能有先生这样的精神状态吗？小到对自己，大到对民族，对国家，对世界，我们能像先生这样坦然无愧吗？

## 4. 读稿

稿子源源不断地飞来了，一些寄到了出版社，一些直接寄给了我，还有几篇由小孙约到后再转寄过来：合到一起是厚厚的一摞。我花了三天时间，仔细地阅读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带着几代文化人诸多信息的精品佳作，从世纪老人冰心（九十八岁）的《寄小读者》，到年轻的女作家王子君的《在梦里成长》，从黄土高坡的贾平凹、刘成章、杨闻宇，到南方岛国的晓雪、刘树德、和谷……五十多位作家，五十多颗火热透亮又活泼多情的心。他们用一支支生花妙笔，将浸润着烙印着水乡晨露、古城晚霞、山野风光、漠塞烟尘的“童心”“童趣”跃然纸上，让人时而忍俊不尽，时而叫好拍案，时而感慨唏嘘。

季羨林老先生是誉满海内外的大学问家了，目前还以年近九旬的高龄，主持着《东方文化集成》《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等大型丛书的编纂。电话里，季老的助手告诉我，多年来，先生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然而，先生也有“一闲对百忙”的时候。你看他，为了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便“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将莲子种入屋前池塘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池塘边看上几次；绿叶出水后，他总是请求捞水草的农民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在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他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读着这段清丽隽永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在水塘边独步的，季老那清瘦的身影和智慧的目光。老人家是在参悟“池花对影落”的境界了。是啊，这样的境界也只有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保持着足够关切，又具备着童心童趣的人，才能透彻地感悟到。

陈祖芬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了，我们从她的作品里，能读到闪光的智慧和强烈的使命感，亦能读到从字里行间蹦溢出来的激情和率真。她和丈夫梦溪先生热爱大自然，对大自然创造的艺术品更是情有独钟：从东北的“一大片木材群落里”抱回一个“半人半蛙”，由大连“一个游人不到的海滩上”捡回一块“背部龟裂的赭红大扁石，活活是一只血色乌龟”，还有许许多多的“树们石们”都源源不断到她家落户。用她的话说，就是把大海捡回了家，把森林搬回了家。——这是成年人的故事了，体现在成年人故事里的童心和童真尤其可贵。这种可贵，

同样展示在贾平凹的《玩物铭》里。

更多的作品，当然是讲童年时的故事了。人和人不一样，童年和童年也不一样。老一辈的童年，有着较多的旧时岁月的印痕，新一代的童年，总是和共和国的灾难相关。而不管哪一种童年，其个性特点和地域色彩都是鲜明的。程树榛先生为曾经自行扯断红丝绳“暗自疚歉”，女作家叶广芩则对自己小时喜欢“上房”感慨再三；年长的何金铭先生小时候爱哭，为心爱的小鸡被老鼠咬死而流泪不止；年轻的吴晔先生献给读者的却是一片苦涩的笑——那年月真是“把人饿失塌了”；袁鹰先生为能吃到半块名叫“透糖”的零食而心满意足，王英琦女士则对一种名为“大救驾”的地方点心渴念不已。还有展现在牛汉、侯雁北、童道明、千里青、陈喜儒等众多作家笔下的灌黄鼠、逮雀儿、养蝥蛄、斗蟋蟀、捉蝴蝶、呼叫崖娃娃，以及偷书读、学画画、剪窗花、看云彩、望星星、自制武器打野仗……

## 5. 编排

我一边读稿，一边顺手做些编辑工作，改改错别字，把个别句子调整调整，为避免重复，一些文章的题目也变了变。这一切做完之后，我想到了排名顺序。排名是一门学问，尤其在我们中国。我们见到的，有按官职大小排序，有按姓氏笔划排序，也有按成就大小排序，各有各的妙处，也各有各的不妙处。作家们或许不在乎这些，但五十多篇作品，总得有个先后啊。能不能换个方式呢，我想到了年龄。一般来说，年龄长一些，成就就大一些，贡献就多一些，声名也就大一些——当然不全是这样。于是，就按年龄排了顺序。这样的排序如果前无先例的话，我们这部书就是一个创新了。

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有赖于众多同志的努力，他们的功劳与此书同在——广大读者对此书的喜爱，将是对他们，也是对我的最好的奖励。

（刊于《书海》1998年第6期；收入《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未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橘灯不灭

在我的感觉里，冰心老人该是我们这代人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她的作品算不上特别多，却有着鲜明的特色，让你读后忘不了。如《寄小读者》《小橘灯》等等。尤其是步入老年后发表的几篇小短文，说的都是肺腑真言，且针芒见血，并不掩饰和忌讳什么，这在“夹缠”成为时尚的当今文坛，实在是不可多得。于是，就从心底里景仰这位前辈，祝福她和我们一起跨入新的世纪。

1998年6月，未来出版社策划出一部题为《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的书，邀我作主编。北京是名人荟聚的地方，我便赴京组稿。在健在的当代作家艺术家中，论年龄和影响，冰心老人首屈一指。为了能约到她老人家的稿子，我同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和冰心老人一家交谊深厚的周明先生通了电话。周先生说，冰心老人住在医院，已不能写文章了，你就从她已发表过的作品中选吧。回到西安后，我就选了老人家《寄小读者》中的第十封信。

《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是以作者年龄大小排序的，冰心老人的文章和大名位列第一，下来是臧克家、张中行、季羨林、黄宗江等五十多位作家艺术家。此书已于1999年元月出版发行，装帧不错，印得也很精美。接到第一本样书，我便情不自禁地在书的衬页上写下了“这是一部好书，读了使人幸福”的话。是啊，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和你谈心的，便是可敬可爱的冰心老人！那份真挚，那份清纯，那体现在秀丽文字间的浓浓爱意拳拳爱心，使你觉得，活着，就该像冰心老人那样，求一个“纯”，求一个“真”，求一份坚定从容，求一份无愧我心！

给冰心老人的样书和稿酬要托周明先生收转，于是我于2月27日上午再次拨通了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说，冰心老人的身体情况不太好，刚才她女儿还打来电话，说院方已通知了家属，这次怕是过不去这个坎了。又说，他年前（2月24日下午）去北京医院看望冰心老，正巧遇上朱熔基总理专程来看望冰心老人。



朱总理还题了“祝冰心老人健康长寿”的词，体现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作家、对文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重视。事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春的问候》的文章，交给了《文艺报》。我说你将文章复印一份给我吧，《文艺报》是专业报，我们是地方晚报，各有不同的读者对象，不冲突的。周先生说好，马上寄。

收到周先生的文章已是3月2日，而冰心老人已于前天（1999年2月28日）晚上21时，走完了她99年的壮丽人生，与世长辞了。怀着沉痛悼念的心情，我立即将周先生的文章编了，并写了一篇说明文字。几天后，《春的问候》出现在报纸副刊的醒目位置，并被评为好稿。我将这篇文章的样报向周明先生寄去，并请他转告冰心老的家人。心中就想：人都是要告别这个世界的，人又都会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冰心老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文章，也留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与人类的真善美同在——橘灯是不灭的。

（刊于《新闻之友》1999年第4期）



庞进在冰心文学馆（2019年3月8日，福州）

## 冬日访胡采

这是一张由主人珍贵保存的照片：身穿大棉袄的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坐在正中，身前身后或坐或站地簇围着一百多人；背景是旧房、土坡和窑洞。他们中间有丁玲、草明、刘白羽，也有我们陕西文学界的前辈——胡采先生。胡先生站在第三排，披件深灰色的衣服，显得很俊气很精干。

这是五十一年前（1942年）的事情了。那年他二十九岁，是以边区文协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编的身份出席这个著名会议的。“会开了三个礼拜，”胡先生回忆说，“主席先讲了一个前言，大家分组讨论，5月23日的下午，又集中起来，听主席讲话。先在房子里面讲，后来人来得多了，坐不下了，就移到房子外边的土坡上讲。没有那么多凳子，我们就盘腿坐在地上听。印象中主席没有讲稿，后来看到的《讲话》，是根据记录整理成文的。讲完话后，主席还招待大家吃了顿小米饭，那时候困难，菜里有点肉，就很不错了。”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胡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自幼家贫，只读过几年小学。二十岁左右，在家乡河北省蠡县开始接触左翼文艺作品和苏联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后来去北平自修读书，开始为一些报纸副刊撰写文章。“七·七”事变后，正式参加抗战文艺活动，曾在山西第二战区主编《西线文艺》。1940年2月到达延安，主编《大众习作》。《讲话》促使他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此后，无论在边区文协工作，还是在西北文联任职，以及主编《延河》文学月刊、长期参与陕西省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担任省作协和省文联的副主席、主席，他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向，并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文学评论工作。

胡先生认为，人民大众的火热生活是文艺作品取之不尽的源泉，文艺不能离开生活胡编乱造；但是，生活不等于艺术，文艺作品不能原封不动地简单地照搬生活；生活和艺术之间，有一个“变”的问题，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要遵循艺术

规律，在概括、加工、提炼、升华上下功夫，做到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胡先生的文艺思想，在他的已出版的《思想、主题及其它》《从生活到艺术》《新时期文艺论集》《胡采文学评论选》等七部著作中有集中、系统的表达。而《从生活到艺术》一书，经初版，再版，又再版，印数累计达 124500 册，许多作家艺术家都从中等到过有益的启迪。

如今的胡先生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视力衰退了，脑子不如以前好使了，但老人的心态并没有老化，作为省作协和省文联的名誉主席，他总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出席一些文艺界的会议，在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还常常有针对性地将一些精辟的见解讲出来。1993 年内，他一边养病，一边仔细地整理出自己的题为《文艺专论及其它》的“最后一本”书稿。

胡老对改版后的西安晚报副刊很关心，希望我们“把延安文艺传统精神同新时期广大群众的热切要求结合起来”——这是老人思考了十几分钟后才下笔题写的。

（刊于《西安晚报》1994 年 1 月 6 日）



胡采（左二）与杜鹏程（右三）王汶石（右二）等

## 王汶石的信念

“我与您不识，但您的《风雪之夜》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给我廓开了文学之门。后来接触了不少中外名著，然而我仍是对您的这本书真情不断，在空虚之极的时候，是您的书给了我精神世界的色彩……”这是湖南一位作家两月前写给王汶石一封信中的话。这位作家随信寄来了他的小说新作，并说这是实现他当年的“诺言”——将自己写的书寄给从未见过面的老师。

是的，从20世纪50、60年代走过来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大木匠》《新结识的伙伴》《沙滩上》等作品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那些性格显明、形象生动、举止可爱、精神可嘉的“新人”们，丰富了新中国的文学画廊，给意气风发的建设者以激励、以感染、以教育、以鼓舞。作家捧一颗火热的心，读者添一份向上的力。于是，王汶石成为“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受到包括周扬、茅盾、叶圣陶等文坛大家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赞赏和肯定。他的短篇小说被译成六七十个国家的文字，也被收入国内多种选集，且和论文《漫谈构思》同被选入高校教材或辅导教材。专门研究他及其作品的著作如《〈风雪之夜〉评论集》《汶石艺概》等，也先后出了四本。

“在创作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云变幻，有一条要坚持，就是写新人。”满头银发的王汶石先生和笔者侃侃而谈，“在火热的建设事业中，在历史的每个阶段，新人总是层出不穷。这些新人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凡人，但他们都具备着新人的素质，塑造好他们的形象，是我自始至终的信念。”

那么，什么是“新人”的素质呢？王老在背诵了《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话后说，古代人讲“天下为公”，我们现在则讲“共同富裕”，总之是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为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奋斗，这便是“新人”的最基本的素质了。战争年代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英雄先烈具备这样的素质，建设时期克己奉公、精诚奉献的优秀人物也具备这样的素质。作家们应

当用手中的笔，描绘他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风采，使全社会学有榜样，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前途，人类也才有前途。“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信念，文学创作应当是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不可定为一律。但我还是希望作家们多写一些有利于培养‘四有’新人，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精神文明素质的东西。”

刚过七十二岁生日的王汶石是山西万荣人，1942年在延安加入西北文艺工作团，1949年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先后任《群众文艺》《西北文艺》副主编。1954年后从事专业写作，曾长期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现在是陕西省作协的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的身分还未卸去。目前在养病之余，保持着和中青年同志的通信联系，写一些评介文字及短小诗文，并着手整理自己的旧作。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1月15日）



王汶石（左）与陈忠实

## 李若冰的大漠情结

对于六十七岁的李若冰先生来说，能有一段时间由自己支配，用来写点想写的东西，就是莫大的快慰了——每天的事太多，好像都是该做的，总是静不下来。前年秋天，在太白山蹲了将近一个月，就写了不少文章，感觉真是好极了。

那么，如果有这么一段时间给他，他会怎么安排呢？

“去大漠，去戈壁”，他略加思索后对笔者说，“我的文学生涯是从石油战线开始的。1953年我从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归来，结婚不久就到酒泉地质勘探大队担任副大队长，两年后，我首次进入柴达木，创作了《勘探者的足迹》《在柴达木盆地》等引起反响的作品。1957年我二进柴达木，写了《山·湖·草原》《祁连雪纷纷》《油泉子赞歌》等。1959年出版了我的代表作《柴达木手记》。这样，我和大漠，和戈壁，和那些在茫茫荒原上艰苦奋斗的创业者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我钟情他们，喜欢他们，他们太可爱了，是最值得作家们去写的人。他们有火热的情怀，但当婚姻爱情和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往往是，‘你爱我，不爱荒漠不行’；他们也有血肉之躯，但当工作需要的时候，他们从不吝惜自己。这两点很伟大，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他们在荒原戈壁找到了自我，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而我，则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崇高的献身精神。所以，大漠里有我取之不尽的文学矿藏，是我四十年来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虽然工作忙，年龄也大了，但我还要争取时间，寻找机会，去写那些勘探者、创业者们的续篇，此事不完成心不甘。”

是的，这便是作家李若冰的“大漠情结”。1993年8月7日，青海省石油局向他和曾写过《柴达木小唱》的诗人李季颁发了“特殊贡献奖”和荣誉证书。于是，他和老伴、作家贺抒玉又到柴达木走了一趟。这是第五次踏上这块土地了，尽管高寒缺氧，几位老人依然兴致不减，意趣盎然，可谓深情满戈壁，潇洒走一回！

李若冰先生是陕西泾阳县人，从 1938 年在延安参加抗战剧团起，几乎一直工作在文艺战线。建国后长期担任陕西省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历任省作协副主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文物厅厅长等，现任省文联主席。出版的著作除印过三版的《柴达木手记》外，还有《在勘探的道路上》《旅途集》《山·湖·草原》《神泉日出》《爱的渴望》（与贺抒玉合集）《高原语丝》《塔里木书简》和《李若冰散文选》等九种。

（刊于《西安晚报》1994 年 1 月 21 日）



1982 年春，李若冰（中）路遥（左）曹谷溪（右）在陕西省作家协会

## 黄土地上一寿松

见到九十三岁的冯润璋老先生，你会产生历史缩短了的感觉。在西安市第二人民医院一间八人合住的大病室里，白发雪眉的老人正在外孙女的陪同下打点滴。除了耳稍背、眼稍雾、写字时手有点颤外，头脑依然清晰，谈起 20 世纪 20、30 年代“左联”的一些事情，老人声音亮堂，如数家珍。

冯老 1902 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冯家沟村。少时家贫，靠师友的资助和勤工俭学读完小学中学。1924 年秋，在上海大学求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 年秋，他与潘汉年、冯雪峰、沈端先（夏衍）、钱杏村、冯乃超一起，按照党的指示，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 年初，同丁玲、胡也频等受聘任教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1931 年春，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被捕，后以左联成员身份获释回到陕西。次年春和新婚妻子吴碧云一起，赴凤翔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不久即发展了几名新党员，成立了“中共凤翔省立二中支部”，任支部书记。1933 年初，由于陕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省委主要负责人被捕投敌，从而中断了和党的联系。同年再赴上海，在鲁迅先生的关心下，创办《洪荒》月刊和《农村月刊》，发表了他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小说《劈开来》、论文《现代中国农村概论》、诗歌《长安素描》、散文《悼小林多喜二》等。刊物遭查禁后，于 1934 年秋辗转回到陕西。此后几乎一直工作在教育界：在西安乐育中学教过语文，参与创办泾阳仲麓中学，受聘任教于临潼私立泾惠中学和三原工业职业学校。解放后，先后供职于西北军政大学、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室和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编写出版有关工农教育方面的教材多种。1962 年因病退休。

由于吕世民、贺志强、宋建元、刘善继诸君的奔波努力，陕西人民出版社于 1992 年 11 月冯老九十大寿之际，出版了《冯润璋文存》一书。这本书选编了能搜集到的冯老的一些主要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文论及其他。这些作品多以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以陕西关中地区的农村



生活为素材，真切生动地描绘了军阀混战和苛捐杂税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揭露了黑暗势力的凶狠和残暴，抒写了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其《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一文，清楚地回忆了当年的历史事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

冯老的夫人吴碧云女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早年参加共产党，后赴苏联留学，归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不幸在1966年“浩劫”初起时受到冲击，遭毒打惨死于抄家现场。冯老的大女儿献身于解放战争，其他子女工作后远离西安，老人便长期过着孑然一身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嗜茶，不吃辣子，不贪荤腥，爱吃米饭不爱吃面，每天坚持写日记——躺在病床上也一日不落。当年是因患动脉硬化症退休的，休息治疗了两年症状消失。此后身体一直不错。前些日子因感冒咳嗽引起肺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儿子儿媳也都匆匆地赶了回来。一个多星期后，老人竟奇迹般地好转过来，脸色红润了，吃饭正常了，不日即可出院。

1993年8月，陕西文化教育界举行了“冯润璋学术研讨会”。会上，宋建元先生作诗道：“少怀壮志万里行，如花妙笔写苍生；左联筹建劳君力，黄土地上一劲松。”我们也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前辈，致以深深的祝福！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2月9日）



## 对作家路遥的龙文化阐释

中国人有将人间的杰出人物比龙、称龙的习尚，如春秋时的老子，就被孔子比作龙；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都被称作“卧龙”，等等。现在，大家普遍接受了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中华儿女都是“龙的传人”的观念，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比龙、称龙。那么，龙族中的优秀分子，该比作、称作什么龙呢？

以陕西作家路遥为例。

路遥写出了《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路遥卓越的才华。那么，可不可以将路遥称作“才龙”，即“才气茂盛之龙”呢？当然可以。

路遥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的使命感很强，抱负很大，志向高远，具有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不服输、不怕难、不叫苦的品格，这些，从他的履历、《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写作过程，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中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可不可以将路遥称作“雄龙”，即“雄心勃发之龙”呢？当然可以。

路遥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七岁时因家中困难被过继给了居住在另一个县的伯父。少年时代饥寒交迫，成家立业后遭遇婚变。文学上虽取得了很大成就，却因罹患肝病而终告不治，年仅四十二岁。那么，可不可以将路遥称作“悲龙”，即“命运悲怆之龙”呢？当然可以。

以上是从才华、人生态度、命运三个角度说的，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我曾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来概括龙的精神，那么，用这八字精神来考察路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简称。龙当然是容合而成的。路遥其人、其文，包括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也都是容合而成的。别的且不说，就文学观而言，路遥显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苏俄文学的现实主义、柳

青的生活艺术观，等等。为了写《平凡的世界》，路遥读了近百部中外作家的作品和许多知识性的书，翻阅了十年来的地方报纸，因而才有“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的定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将路遥称作“容合龙”。

福生就是造福众生。龙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兴云布雨，给老百姓带来五谷丰收。路遥曾有言：“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他说到做到，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为中国的老百姓贡献出了优质的精神食粮。据此，我们可以将路遥称作“福生龙”。

奋进就是奋发进取。龙的这种精神，体现在龙形象不断演进及龙舟竞渡等民俗事象上。路遥的一生，是奋发进取的一生，也是开拓创新的一生。他说：“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他说他“苦苦追寻一种目标”，“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揭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也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进取的典型。据此，我们可以将路遥称为“奋进龙”。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理解和敬畏的产物，所谓谐天，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这一方面，路遥做得不够好。为什么早晨就非得从中午开始？早晨从早晨开始就写不出好的作品了吗？明知抽烟有害于身体，而且明知自己已患上了肝病，还那样无所顾忌地抽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胸脯隐隐作疼”（路遥原话）。中国有句成语叫“暴殄天物”，意思是任意糟蹋天生之物。人也是天生之物啊！对我们自己这个“天物”，不能容许别人糟蹋，也不能容许我们自己轻视。如果路遥能够爱护自己的身体，尽管可能有某种遗传因素，也不至于那么快就送走了自己。换句话说，如果路遥能珍惜生命，争取多在这个世界上多逗留一些时光，那么，广大读者也许会看到更多、更好的一些署名“路遥”的优秀作品。然而，没有如果，只有遗憾。据此，“谐天龙”这个称号，我们就不能送给路遥了。

（刊于《榆林日报》2008年3月14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感念陈忠实

2015年秋冬，听说陈忠实先生得了不好治的病，住进了西京医院，心中一直惻惻然。过年时一个聚会，认识了练习颜体书法的刘惠州先生，我送其一本《龙情凤韵——庞进诗词选》，说你可将书中我写陈忠实的诗写一下——这首嵌名诗作于2010年12月27日，曰：“百年小说数老陈，白鹿腾原舞忠魂；河岳在胸实堪敬，雄文大卷醒后人。”几天后，刘先生将他写就的五幅作品拍照后用微信发来，我选中一幅，编发在2015年3月2日的西安日报副刊版上。

2016年3月4日下午，我在办公室给陈主席发了一个短信，告知了这件事。两分钟后，手机响了，是陈主席的声音，嘶哑，微弱，缓慢：“庞、进、好、我、当、天、就、看、到、了，谢、谢、你……”我说：“一直想去看你，又怕你不方便。这会儿作家吴树民、张岩也在这儿，他们也问你好！大家都想念你，问你好！你说话不方便，咱不多说了，祝福、祝福啊！……”放下电话，吴、张二位也都很感慨，说老陈看到了，心里肯定高兴，能做的事，人在世时就赶快做……

4月中旬，吴树民发来了他写的《忠实，忠厚实诚的长兄》，说想让病中的忠实兄看后高兴高兴。我摘编了近两千字，以《陈忠实先生的几件事》为题，发表于2016年4月27日西安日报文化随笔版头条位置上。

4月28日下午，吴树民到我办公室取样报，一进门就说：“庞进感谢你啊，你在我的文章那句‘梦中我见到忠实兄’后加了‘康复如初’四个字，这四个字加得好啊！”我说这也是大家的心愿嘛。

2016年4月29日，早上8点刚过，吴树民的电话打来，告知陈忠实不在了，说前天发表的文章忠实兄可能都未看到，我说估计没有看到……

上午到办公室，同事们都为陈忠实的去世而悲伤、惋惜，说起他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两报副刊的情缘、与几代副刊人的交往，不禁两眼发潮、感念不已。

20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我开始读到陈忠实小说。1982年元月，我毕业到临潼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大概就是在那一年，在省上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陈忠实，他从乡下赶来做报告，朴素的衣着、大而亮的眼睛，地道的关中话……讲到一个乡村女老师爱学生，调离时学生们一大早站在老师门前相送细节，至今还刻在脑子里。

1984年3月，我由临潼文化局创作组调到西安日报社，供职于编采岗位，与陈忠实的接触多了起来。他给我讲过他60年代第一次到西安报社送稿“怯生生的”情景，讲他看到当时的女编辑、后来的文艺部主任李炎“美得不敢多看一眼”，讲他与编辑们的交往和友谊……

1993年7月的一天，陈忠实和评论家李星敲开了我的住室门，他们带着刚出版的《白鹿原》和题为《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的评介文章，我自然特别高兴。两天后，这篇文章便在西安晚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与读者见了面。

《白鹿原》获大奖后，陈忠实成为陕西文学的掌门人，两报副刊更离不开他的支持了。新世纪诗歌专版、世园会专版，等等，请陈忠实题字，他没有二话，都是爽快答应，不但很快写好，还让秘书及时送来。2003年，诗人刘文阁要出版诗集《暧昧的高原》，托我请陈忠实题写书名，老陈也是很快写就。

2004年，西安事变浮雕在骊山上落成，策划这件事的骊山书画院的几位领导托我请陈忠实前去观赏并题词。陈忠实仔细地看后，当场挥笔，写下了“骊山一笔，铸就永恒”八个大字。可能觉得写得不是很满意吧，回到西安后，他将这八个字又写了一遍让人送来。

2010年，王愚先生病故，陈忠实在《文艺报》上发表三千七百多字的《王愚：热情率性与悄没声息》，我看到后立即下载、转编，西安日报副刊破例整版发表。文章见报后的当天，陈忠实就打来了电话，说：“王愚去世，有些冷清，你们的反应到位了。”我说王愚老师是著名评论家，也是我们副刊的老作家、好朋友，我们做这些是应该的。

我生在临潼，祖籍在蓝田。听父亲讲，他的姑家、奶妈家，都在白鹿原。1995年春天的一天，我到省作协陈忠实办公室去，见他桌上有笔墨，就请他给父亲写一幅字。老陈铺纸，膏墨，提笔，略加思忖，写下了“注目南原觅白鹿——录拙

作词句庞济民老先生雅正乙亥春月陈忠实于长安”。我将这幅字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很高兴，让人装裱了挂在正屋墙上。

当年5月上旬，蒙加拿大华人作协邀请，陈忠实、评论家王仲生教授，还有我，组成了一个以老陈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温哥华访问。那天下午，在唐人街的中华文化中心，老陈讲《白鹿原》的写作过程，王教授讲《白鹿原》丰富意涵，我介绍了一下陕西作家的创作情况。晚餐后，与加华作协的朋友们到海滨聊天、唱歌。记得老陈先唱了陕北民歌《走西口》，声音浑厚而沧桑，加华作协的朋友们说这是纯正的满是黄土气息的乡音，在温哥华是很难听到的，大家拍手说好，让他再唱，老陈就又唱了《拉手手，亲口口》。这也是我第一次听陈忠实唱歌，还是在海外听到的，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

从1988年起，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龙凤文化研究，这件事也得到了陈忠实的关注、关心、肯定和鼓励。在省作协他的办公室，在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中国小说年会期间，我们曾有过几次深谈，他的一些话我永远记着：“文学路上挤的人太多了，你就给咱开辟一条新路！”2006年3月25日，“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陈忠实到会发言，说：“庞进多年来坚持研究龙和凤的文化，研究出了成果，把我们想像中的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中的东西，用学者的、具体的、条理化的论证，提供给我们，给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方便，其功莫大焉。其研究，可能比研究中国任何一段历史史实都要艰辛一百倍，这是我能想到的，尽管还有不完善、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但现在已达到的成就，和表现出来的默默做学问精神，已经令我非常感动了。”2012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蓝田华胥陵举行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在乡政府的院子里，陈忠实一看到我，就笑着说：“龙王也来了！”我明白，这是陈主席在鼓励我、鞭策我。2013年春天，在西安报业集团的支持下，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注册成立，陈忠实特书“龙飞凤舞”四个大字祝贺……陈忠实去世后，我代表龙凤国际联合会、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向陈忠实献上一个花圈，感念他对龙凤文化事业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并作联曰：“灞原失白鹿魂魄犹在；文苑走马龙精魂永存。——联中用“马龙”词，是因为陈先生生肖属马，而马则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马龙，即兼容了马和龙的姿态、精神之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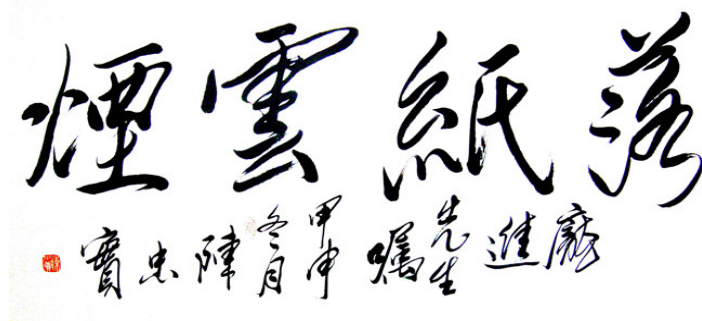
2004年冬天，一次开会见到老陈。我说“主席呀，我个人得收藏你一幅墨宝。”老陈问：“给你写个啥？”我说：“你觉得写啥好就写啥。”几天后，他就让作协的杨毅先生送来了写在四尺整张上的“落纸云烟”。面对墨宝，我不禁感叹：老陈真是大手笔，面对这四个字，任何人都会皱眉凝神，还未必能体味出深意来。

我多次想到，有机会了和陈主席好好聊聊，说说一些感悟，比如，我发现古今中外那些伟大作品，无不有某种大的思想体系支撑着，都是大思想的艺术化。《白鹿原》之所以成功，在于有一个魂，这个魂就是由朱先生、白嘉轩等人物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儒道互补的中华文化精华。再比如，多次听陈主席讲“生命体验”，读了《陈忠实传》（邢小利著）后，才明白陈氏讲的“生命体验”，是自觉、自醒地独立思考的体验，也即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世界、用自己的语言写世界的体验。我还想告诉他，在一次关学论坛上，我发言讲，以使命意识、天下情怀、有为主义、深厚学问、实干功夫为支撑的关学精神，不光体现在张载及其后的学者们身上，也体现在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张艺谋、赵季平、王西京等文学艺术家身上。

陈忠实走了，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话了。这些天，读到了许多悼念陈忠实的文字，其中一句我特别认同：“陈忠实是让人从骨头里喜欢的作家！”

陈忠实不朽！

（2016年5月2日于西安龙凤院；刊于《西安日报》2016年5月4日）



# 呼唤民族精魂 成就一件大事

## ——在陈忠实先生谢世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陈忠实先生去世一年了，我讲两个观点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一.《白鹿原》是一部呼唤民族精魂之作。

民族精魂，指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根本信仰。

中华民族曾经是有精魂的，这便是以儒家为主，道家、佛家为辅的思想体系和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和”等为内容的理念系统。但是，这样的“精魂”，经清末民初“废科举”、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破四旧”、改革开放西潮涌荡等，延续到今天，可以说早已大厦倒塌、风光不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已经“丧精失魂”了。

《白鹿原》反映了中华民族“丧精失魂”的一段历程。书中的朱先生，也即现实中的关学大儒牛兆濂，是中华民族精魂的传扬者、坚守者，白嘉轩则是中华民族精魂的彰显者、践行者。但他们都“无可奈何花落去”。

那么，中华民族还要不要精魂，旧的精魂还能复兴吗？如果不能复兴，新的精魂又在哪里？我觉得，陈忠实用《白鹿原》这部作品，以文学的形式，把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面前。

这些年，我通过研究龙文化，提出了旨在解决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缺失的龙道信仰，就是力图回答《白鹿原》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是对陈忠实先生的一个文化的承接。

二.人来到世上，要成就一件大事。

《礼记·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的这些话语对中国文化人影响很大，陈忠实显然也是受益者、被激励者。进入作家行列后，他立志要啜个“大活”，即写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山西作家李骏虎在《在中国写作



的优势和障碍》一文中谈到：“因为喜爱《白鹿原》而找来陈忠实其他中短篇作品阅读的读者，可能会失望，因为和《白鹿原》相比，他的其他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才气，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作品不过都是在为写《白鹿原》做准备，便会更加肃然起敬。……陈忠实盖了一座文学的大厦，那些中短篇都是这个伟大工程剩下的边角料，他有《白鹿原》这一部世界奇观就足够了。”我认同这样的说法。

是的，人来到世上，是要成就一件大事的，大事之前的许多小事，都不过是在为大事做准备、做铺垫。对陈忠实而言，毕生大事就是写出《白鹿原》。心中生起成就大事的意识，然后尽全力实现之——老陈已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典范。

（2017年4月27日于西安思源学院）



## 圆融：平凹片断

知道找他的人多，我就将两位想通过我认识他的朋友约在一起，去叩贾平凹的门。两位朋友一个是画家，画了一批陕南的山水风物，想请平凹写点赏评文字，发在某画报上；另一位是诗人，要出一个诗集，想让平凹挥挥大笔，写篇序。几天前就在电话上打了招呼，但愿先生今晚“坐”家，没有被什么人拉走。

太好了，人在。客厅里早来了一位熟识的朋友。四个人便坐下来。首先看到的是钉在书桌上方窗棂上的一幅画。画面上部弯弯曲曲一道一道，平凹说那是水。左边一串有鳞的小动物，大概是鱼；右边一串有翅的小动物，多半是鸟。中间泼了墨，黑乎乎的，只留下两枚竖起来的椭圆，一白一红，像猫头鹰的眼睛。平凹说这是一幅把时空融在一起的多维画，天上的云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腾到天上就成了云。水中的鱼飞上天便是鸟，天上的鸟落到水里便是鱼。所以这画没有上下左右之分，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这会儿效果还不好，傍晚的时候，屋里别开灯，夕阳从外面照，味道就全出来了。

说话间，平凹又展开一幅画——画面上坐一个男人，黑色的，双手合起来，嘴角下垂，眼睛看到天上；身前一朵硕大的莲花，红色的。旁边密密麻麻地写着孔子孟子老庄亚里斯多德康德弗洛伊德等等古今中外几十个人的名字。平凹说，你说他参禅也可，悟道也可，烤火也可；这莲花你说它代表啥就是啥，佛也行，道也行，马列主义也行，女人也行。我看这男人画得倒怪像他自己，尤其是苍苍的，除却巫山不是云似的眼睛。画家朋友称赞道：好家伙！全方位象征，这画绝对可以！只是纸不行，改明儿，我给你掬一捆子好纸来！平凹少女似的笑了，说也没颜色，就是墨汁和红水。画家说你兴趣广得很么，平凹一边收画一边说，前几天来了兴，一连画了二十多幅，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这两天又没兴了。

平凹正说着，敲门进来一个小伙儿，是来向他的平凹叔讨教论说文该怎么写的。平凹指着一位朋友说，你把文章让你这个叔看，他在出版社整天看稿子，是

专家。这位朋友没有推辞，接过来看了，指点了几句，说你再让你平凹叔叔看看，平凹说不看了不看了，你一说就对了。小伙说，平凹叔叔那你在走，就走了。



庞进与贾平凹（1998年1月1日，贾府“大堂”）

创作上呢？我接着问。

年初回商洛跑了一圈，回来后写了四个中篇和一些散文。中篇发了两个，一个寄出去了，一个刚写完。都是写土匪的。一说到土匪，平凹旺了神，大吸一口烟道，就说已脱稿的这个吧。题目叫《五魁》。这五魁是一个专为人背媳妇的壮汉，那里的山路走不成车，抬不成轿，啥都得靠背。这次五魁是为财东家的大少爷背媳妇，不少人都嫉妒他，因为这媳妇长得好美。不料半路上竟遭到一伙土匪的抢劫。土匪王本想将这媳妇作压寨夫人的。五魁不能眼看着一颗好白菜让猪拱了，就说这女人的面相不好，是个克星呀等等，总之是骗了土匪，并趁机将女人又背送到财东家。这期间，财东少爷已得知媳妇被抢，在取炸药要和土匪决斗时，却不慎失手炸坏了自己的双腿。背到家的女人便和这残废人成了亲。腿残废了，性欲却强，女人苦不堪言，夜夜惨叫。以至于乞求留在财东家作长工的五魁再次将她背走。一个月黑风高夜，五魁点了财东家的草料场，趁乱将女人背到一个荒避的山洞里。他爱这女人，却被正人君子的观念约束着，只是每天打猎砍柴，供养女人。怕女人寂寞，便买来一条狗给她作伴。不料有次归来，却见女人竟和狗

交在一起。五魁一怒之下，当着女人面，将狗活活打死。女人无地自容，便滚崖而死。五魁失魂落魄后终于大悟，便也拉了杆子，做了个比原来那个土匪更大的土匪，而且一下子取了十一个压寨夫人……

他讲得津津，大家听得有味。而且都说好，认为世上的许多人许多事都可作如是观。在另一部中篇里，我还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了我最近的新发现，平凹继续他的“讲演”。这是我和一个大禅师交谈后悟到的。佛教讲人有八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第八识叫“末那耶识”（应当叫“阿赖耶识”，笔者回来查了一下），相似于我们平常人所说的灵魂一类的东西。每个生命在结束之前都要将自己的末那耶识释放到空中，空中也就有许许多多的末那耶识在纠缠、融合、翻腾、飘移。比如你庞进吧，死了以后，你的末那耶识就升空和别的相同相近的末那耶识融合在一起到处游荡，某时某刻刚好地上某朵梅花要开放，刹那间获得了某种对应，你的末那耶识就下注到梅花里去了。那么，你庞进的再一茬生命便是一朵梅花。要是某家的女人正要生孩子，刚好获得对应，你的生命就以这孩子的生命而得以延续和重现。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尽量将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干好，使自己的末那耶识完善一些，强壮一些，释放得充分一些，获得再次生命后也就更旺盛一些。你看这理论不消极吧？就说窗外那些树吧，那就是一排排生命啊！说不定就有古代那位圣哲贤人以及你的祖先上辈的末那耶识在里面，睁着眼睛，看着你哩。

为了发挥方便，平凹将凳子移到小桌前，用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个圆圈，并在圆心顿了个点，说：这圆心好比宇宙的根本，你称作道呀佛呀绝对真理呀都行，圆周上站着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人，发表着各式各样的言论，佛教讲百万个法门。这些法门都是通向圆心的，只是你是从这条线走，我是从那条线走，而圆心只有一个。问题是能够走到圆心的太少了，大部分人都是刚开始迈步或走到半截就被甩掉了，因为这圆是不停地旋转着的。能走到底的人便是大圣人、大哲人。就说那些要饭吃的、作娼妓的、看相算命耍把戏的，人家也和咱一样，也是这百万法门中的一个法门。说不定人家走得比咱还要好一些，远一些，离圆心近一些，悟得比咱还要透一些哩。这样理解了，你的心境就平和了，超然了。

我插了一句：圆融了。

平凹说：对了，圆融了。

话音刚落，屋里灯忽然灭了，一片漆黑。平凹摸火柴，找蜡烛，又去看保险。

回来后说完了，整个楼都黑了。隔壁屋里的贾夫人说，毕了，电视看不成了，我说都是你说得来，老天惩罚了。

平凹点点头：对，天机不可泄漏。

大家又说笑了几句，就告辞了。

回到单位后，我一边思味着平凹的话，一边构想着我这篇文章的题目。觉得“圆融”很不错。的确，圆融是一种好说难达到的，大彻大悟式的生命感悟，是一种超越了人世间种种凡情俗欲的高妙境界，光亮明透，湛洁穆净……

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愁出不了好作品？

不信，你就读读“圆融”了（或正在走向“圆融”）的贾平凹。

（刊于《军工报》1992年1月25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贾平凹为庞进题写笔名“慧雨”

## 和凹兄下跳棋

贾平凹先生长我几岁，我常以凹兄称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凹兄住在南院门附近的大车家巷，距我住的四府街不远。一次我到 he 家里去，见他书柜上放着一盘弹子跳棋，就说你还喜欢玩这个，他说我是世界冠军哩，我说是吗，他说不信咱试试。于是摆开来，第一盘他输了，第二盘我赢了，第三盘他两道浓眉凝在一起，似乎铆足了劲，结果还是没有取胜。于是，叹口气，说我现在是世界亚军了。

有段时间，凹兄在医学院住院，我去看他。是那层楼最里面的一个单间，我进去的时候他刚打完吊针，手背上还贴着蜻蜓状的胶布条。说了几句闲话后，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盒跳棋。他一看，笑了。于是，打开棋盒，将塑料棋单铺在白床上。依然是三盘，依然是我没输他没赢。末了他说，看来我这个世界亚军翻不了身了。我说在你家下的时候，你最多输到成十步，现在只有五六步的差距了，已经进步多了。说话间，有红男绿女进来，我起身告辞。他指着跳棋说这个，我说放这儿吧，下次再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搬住在西北大学校园里，离我住的地方也就一站多路。有天晚上，我到 he 那里说事，完了要走，他说别急别急，就把那盒跳棋取了出来。于是，棋单、棋子在茶几上摆开，他给我泡上一杯陕青，四目相对一笑。我说咱要不要赌个啥，他说赌个啥，我说输一步十块钱，他支吾着说先下先下。

记得那晚上好像下了五盘。前两盘他都以四五步之差败北。第三盘一开局，他的女友，也就是后来的贾夫人郭梅女士，不看电视来督战了。郭女士优雅地夹起一支香烟，凹兄当然也离不了烟。在团团烟气的熏绕之中，第三盘结束，他输了三步。我用眼神问他还下吗，他说再下再下。第四盘他盯得很紧，郭女士也帮着盯，结果取得明显进步，只差一着。第五盘他步步为营，每一步都和郭女士商量，斟酌再三。中局时进入胶着状态，双方顶在那里。后来还是我朝边上开了一

步，那么，很快就有了结果，我输了一步。

喝了两口茶，我站起身，说结账。凹兄说还真结呀，我说其他账可以不结，这个账要结，留个念性嘛。凹兄就在衣兜里摸呀摸的，摸出了十块钱，递过来。我说这账好像没算对呀，他说够你打的了。大家一笑。

之后，和凹兄再没有下过跳棋。其原因，一是到了 90 年代后期吧，他搬到二环以外去了，距离远了；二是知他写作之外，还忙着其他许多事，不忍心多打扰；还有第三，我也忙，一不留神，就过去了好多年的忙。

（刊于《华商报》2005 年 1 月 27 日、《山西日报》2005 年 2 月 8 日、《太原日报》2005 年 5 月 25 日、《大江晚报》2005 年 6 月 17 日、《海南日报》2006 年 4 月 9 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



庞进与贾平凹（2017 年 4 月 11 日，西安常宁宫）

## 赞赏与尊重：王愚先生

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旬阳了。让我感动的很多，吴建华尤其让我感动。昨天晚上我们聊了一会儿，建华说为建王愚纪念馆，他常常凌晨三点多醒来就睡不着，操心啊。我能理解，做一件事情，在这个社会是不容易的，建华把不容易的事情，做成功了。当然离不开县上领导、方方面面和企业家们的支持，作为建华自己，他的坚持，他的不懈的追求，他的努力工作，他在这一块付出的心血，值得我们尊重，肯定，学习。

昨天晚上9点多了，建华接了一个电话，说肖云儒老师还在扶风，派了一个车去接肖老师。这也令我感动，肖老师那么大的年龄，当时还在宝鸡那边忙活。这是前辈的精神，他和王愚都是我的师长，这些人身上都有这种精神。正因为有建华的努力，有王愚这么一个杰出的评论家，有他们之间的友谊，肖老师才能够那么劳累地从宝鸡连夜赶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一份很深的感动。

我长期做龙凤文化研究，建华关注太极文化，他的书我读过，我们在一起也交流过。我常常用我研究龙凤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方方面面。我想说，太极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龙凤文化，龙凤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太极文化。太极就是我讲的天道，太极图就是最早的龙凤图，太极文化和龙凤文化是互渗互融互动的关系。

我最近想把龙凤文化提升提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龙道文明、龙道信仰。想把龙凤文化从民俗的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信仰文化的层面，写了一些文章，做了一些讲演。龙道由天道、仁道、行道构成。天道来自于道家的道，是作为物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的道，这个道与太极是相契合的。仁道，来自于儒家的仁，仁者爱人的仁，体现大爱的仁，旬阳精神强调大爱，与此是相通的。仁道，上升到哲学层面，是多互主体观。你是主体，我也是主体，大家都是主体，我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他人、尊重社会。行道，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是性命双修、心身共美、知行统一、努力福生之道。龙道把天道、仁道、行道统一起来。用天道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用仁道来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用行道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

仁道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解释，就是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这该是仁道最核心的内涵了。刚才建华讲了，一位旬阳籍企业家，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陕北出差，晚上出门解手，发现厕所里有尿壶，就提了一个给同室住的老人使用。这位军人出身的老人很感动，郑重地给这位企业家敬了一个军礼。这里就体现出我讲的仁道，这位企业家就是利己利人、成己成人，他成全了老先生，也成就了他自己。建华也是这样，他把王愚纪念馆暨旬阳英才纪念馆搞成功了，做成了这么一件好事情，成就了他人，实际上也就成就了他自己。这是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一个很现实、很典型的案例，与我讲的龙凤文化、龙道文明，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对王愚先生，我接触的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接触，因为都在陕西文化界，而我又在媒体工作，他最活跃的时候，文学界的会议上常见的，感觉是一个思维敏捷，说话很有特点，像发连珠炮似的评论家。王愚的经历令我感叹，记得我跟他有一次来旬阳，也是建华邀请的，坐火车参加一个活动，在回西安的路上，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于是就说到文坛上一些事情，谈到他的一些经历。我当时对他有个建议，说你的人生这么坎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受到这么多磨难，应该用你的笔，很真实很真切地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他当时就说，你的提议，对我来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我在想，他那曲折多难的人生历程，如果由他自己很真切地写出来，一定很感人，也可对文学、对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后来我一直在期待，可一直没见他写，不知道为啥没写。

2007年，我主管西安晚报副刊“名人与名城”征文，他参与了，写了一篇《清风峻骨党晴梵》。文章感情饱满，笔法老到，将一位才华过人、风骨凛然、贡献多多的文史大家的形象耸立在读者面前。以往他的来稿，多是比较潦草的手写稿，这次却是整整齐齐的打印稿，足见他对该文的看重。我收到后很快就编发了。后来还推荐该文获了个奖。他去世后，陈忠实先生在《文艺报》发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悼念文章，我看到后，很快就在我主管的西安日报副刊上给转发了。我发的时候没有给老陈打招呼，老陈看到后，给我打电话，说你做了一件好事啊，

王愚去世后西安媒体反应不到位，就你给咱们发了这么一篇。我说这是应当的，我对王愚老师本来就尊重，我管了这个版面，手中还有这个权利，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主管的版面按规矩每期要发三四篇文章，老陈那篇文章比较长，那期就发了那一篇。今天看了展览，觉得应当把这些文章，在北京报纸上发的，在西安报纸上发的，都找到，作为纪念馆的藏品。它们反映了陈忠实先生作为作协主席对王愚的尊重、理解、赞赏、肯定，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在媒体工作的新闻人、副刊人，作为一个文学界王愚先生的后辈，对先生的赞赏和尊重。

（此文为2013年10月20日在王愚的文艺思想暨旬阳精神座谈会上的发言；刊于《太极城》2014年第1期）



## 刘成章先生

最初是从作品认识他的。先看到的是那篇后来被人们广为提说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接着又接二连三地读到了《安塞腰鼓》《米脂赋》《转九曲》等等。这些专写陕北的散文，连同“茂腾腾的后生”“黑甜地睡一觉”“汽车载着三四吨的笑声飞奔”等特色鲜明的句子，使“刘成章”这三个字在我眼前拉镜头似地大了起来。当时就想，作为一个陕西人，陕北是不能不去的，关于陕北的散文也是免不了要写几篇的，但有这个姓刘的先生在前面，咱再写就要多出几身水，情思呀语言呀，都力争有所超越，起码也得追求个别致，否则就干脆别写。

不久就在文学界的会议上见到了他，和我读到的富有张力又灵秀溢然的文字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朝里收的，不飞扬的，尽管坐在省作家协会领导的位于上。陕北腔很地道，却不多说，说也不紧不慢的。如果让我选两个字来形容和概括的话，我就选一个“朴”一个“讷”。再后来就比较熟了，原因一是他喜欢将投《西安晚报》的稿子交我来编发，二是他搬了家，新居和我住的地方近了。隔上些日子，他就带着新写的文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聊。聊文学，也聊文学之外。于是便知道了他平时的写作情况：白天抓得紧，上下午不歇气，尽管还要照看外孙、干些家务。晚上一般不开夜车，读读书，看看电视。花甲之年，依然学会了敲五笔——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还要夹根烟抽着。想想看，这样的“电脑作家”该是不多见吧。

人生事杂，稍不留神，就恍惚了。要干出一番成就，没有一番超人的坚毅和刻苦是不行的。我相信，执着于一，下死工夫，这个人百分之八十是要成功的，刘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要“下功夫打好陕北这眼深井”“要唱好家乡的信天游”，他把自己比作黄土高原上的一只羊，“虽然不像骆驼似的跋涉得那么远，但我也天天奔跑”。他一有机会就到陕北去，及时地仔细地捕捉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形形色色，回来后，便聚精会神地投入写作。从两件事可以看出他专注的

程度：那年延安举行跳伞表演，由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吸引得万人空巷，倾城出动。刘先生却没有去看，因为他正在写东西。还有今年元月那次地震，全西安城的人都惊慌了，纷纷朝院子里跑，而我们的刘先生却丝毫不知，听到院子里乱哄哄的，站起身朝窗外望了一眼，又坐到了电脑前。

和刘先生接触，还有一个感觉是这个人比较正，言谈举止让你能感受到一种天地正气，这也当是刘先生这次荣获以“鲁迅”这个崇高而伟大的名字所命名的文学奖而无愧的地方。不像有的文人或准文人，写文章是一回事，做人又是一回事，时不时地被旧病或时弊左右，打着种种似乎很堂皇的幌子，干一些蝇营狗苟的勾当；或者利用手中的一点儿小权力，为了老鼠尾巴上的一点儿油水，做一些寡廉鲜耻的事情。

几年前，在一次研讨会上，人们充分肯定了刘先生散文的成就和魅力，同时也提出了应当跳出陕北看陕北，语言上也要突破某种模式的意见。这些意见显然已被刘先生吸取，读他近来写的一些文章，发现刘先生的关注点，已不仅仅是陕北了，思维的触角已伸展得很深很远。艺术上也多有变异，融入了自嘲、反喻、调侃等等手法。

在我打这篇文章的时候，刘先生已坐在美利坚合众国西部某座城市的某幢屋子里了——那里生活着他的两个品学兼优的儿子，以及儿媳和小孙孙。上飞机前的晚上，刘先生又到我这儿来坐，我说你这次出国，呆的时间不短，可以把另一个世界好好感受一下，而两种文化一碰撞，火花就出来了。刘先生说他有想法，也带着自己用惯了的“盘”，看能否写出二三十篇文章，半年或者一年后回来，集成一个集子。——说不定刘先生这阵儿正在儿子家的电脑前坐着呢，那一手夹烟，一手敲着键盘的样子……

（刊于《西安晚报》1998年3月18日、《三秦都市报》1998年6月11日；收入《灵树婆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回复刘老师

刘老师您好！高兴地收读了您发自加州的 E-mail。想来您在拟好内容之后，轻轻地一点“发送”，我这边的收件箱里就有了。等一会儿，我将想说的话敲完，一点“回复”，几秒钟吧，您的收件箱里也就有了。这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便捷呀。前些日子读纪念鲁迅的文章，知先生当年由北京来西安，一路车马劳顿，竟蹉跎了七天才到！那会儿好像还没有民航飞机可坐，至于互联网，更是不可想象了。日新月异，月异日新呀，想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脑屏幕，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对话了。

您说您居住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鹿和豺，还两次见到狼。那情景，我想着都觉得有趣。咱们这里您是知道的，动物园之外，要看鹿，大概要到秦岭山的深处去，而豺和狼，你就是到了秦岭深处，怕也难以见到。常见到的是被女士抱着或牵着的小狗，还有拴在路边店门口的可怜巴巴、脏不兮兮、无精打采的猫。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是因古时曾有神奇的白鹿，云彩一样飘过而得名的，可现在呢，白鹿原上不说白鹿了，连一只黑鹿的影子你都看不到了。

一个人在路上好好地走着，忽然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扭回头，并不见那可恶的行凶者。“911”就是这样的事情。记得9月12号早上，我见一位老者，手举一张报纸奔走相告（那报纸的头题是近乎拳头大的“美国被炸”四个黑体字）：“美国被炸了！炸得美，炸得好！”我说：“老者呀，要是你的儿子或女儿在纽约的世贸大厦上班，你还能这么高兴吗？”老者翻了我一眼，说：“我的娃没在美国咯！”我说：“哪你身上总有点人性吧？！”老者再翻我一眼，悻悻地无语而去。此后不久，就是咱们的中秋节。那天晚上，望着从云层里钻出钻进的一圆明月，我想到那几千个一瞬间被粉碎了的家庭，悲潮便涌动在心间：失去亲人是痛苦的，失亲的灾厄突然降临更是让人难以承受的。那些制造灾难的恐怖分子，真是丧尽了天良！

祝贺您的《安塞腰鼓》和《扛椽树》入选中学课本。您这次发来的《如潮虫声》和《墨西哥去来》，也都是情文并茂的好文章，相信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曹孟德的自况，后面再加一句“故土情深，佳作不断”，就可以用到我们的刘老师身上了。有道是“作家靠作品说话”，有了好作品，作家的生命之树就是常青的。

想念您——我们的刘老师！

庞进

2001年10月21日

### 附：刘成章的 E-mail：

庞进先生：

您好！我到美国已匆匆半年，很想念您和诸位朋友。我住在山上，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鹿和豺，还两次见到狼。由于人们不伤害它们，曾有豺在我的面前不远处跳着玩耍。这儿现在天还热，我还穿着短裤。

911后，虽然到处都有些恐慌情绪，但我毕竟整天呆在家中，生活得还算悠闲自在。

几次看过您的龙网。一派兴旺景象，祝贺。

我近时还回不来。

中学课本选了我两篇文章，拟了一消息，寄上。另寄两篇短文，供选用。

在美国有什么事要办，可告我。

刘成章

2001年10月19日

（刊于《炎黄文化报》2002年1月26日）

# 浓郁的色彩 大写的人

## ——刘成章画集序

刘成章先生是从陕西走向文坛、走向世界的。这些年，刘先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美国，可陕西的文友们聚会，大家还是情不自禁地要说到他。一次，文友们讨论起刘先生文章的特点，有说“元气充沛、诗性发达、情感真切”，有说“思维开阔、视角独特、想象奇伟”，有说“内蕴厚重、节奏铿锵、气势超拔”……到我发言时，我说刘先生的文章至少有两点是过人的：一是撕得开，二是色彩浓

“撕得开”是说无拘束、不收敛，尽情畅意地朝开“撕”。如名篇《安塞腰鼓》中的句子：“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声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地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烁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愈捶愈烈！痛苦和欢乐，生活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这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奔突！辐射！翻飞！升华！……”

“色彩浓”是说不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而是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如《扛椽树》中对陕北柳的描绘：“甚至京华柳的那种绿，江南柳的那种绿，灞柳中原柳的那种绿，在这里也可以忽略不计——只用黑。黑还要浓黑。于是，我把我周身的血液变成浓浓的墨汁，满腔满腔地往出泼。泼一柱疙疙瘩瘩的铁的桩子，泼一片铁的定格了的爆炸，泼一股爆炸了的力的冲击……就让我在浓浓的墨汁中饱和上深厚的感情，像豪雨一样，痛畅地泼下它吧……泼下它的奇崛形象，那形象仿佛是黑桩子，黑碑石，黑煤垛，黑旋风，黑爆炸，黑白故事片中的黑脸黑衣传奇英雄，黑得使人过目难忘。这还不够，还应该泼出它黑色躯体中的代代相袭的遗传基因，以及由于这基因才一辈辈地、一年年地、永不歇息地扛着椽，扛着椽

站起啊站起……”



庞进与刘成章（中）夫妇（2013年5月14日，西安）

因了这样的认识，当几年前刘先生开始由作家而兼画家，由敲键盘而兼挥彩笔时，我没有感到奇怪和惊讶，而是觉得这简直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我甚至觉得，刘先生如果留给这个世界的仅仅是篇篇文字，而没有卷卷画作的话，对刘先生而言，是情思才华未能全面地绽放展现；对人类世界来说，则因少了一份不同凡响的创造而殊为可惜。作家韩小蕙有篇写“通才”的文章，说她曾问大画家吴冠中，何种情况下用画表达，何时又必须写文章，吴先生回答说，用画面表达觉得不够时，就用文学。而刘成章刚好相反，是觉得用文学不够时，选择了作画。

于是，刘先生创作的《天地苍茫一根骨》《腾跃过老虎的土地》《隔沟的那朵山丹丹好红好红》《哗啦啦河水东流去》《世间绝响》《美丽尘世》《信天游》《船夫曲》《鹤过》《歌吟》等等一系列画作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我的眼前。这些画作，多取材于给刘先生的生命打下深刻烙印的中国西北黄土地，也无一例外地以色彩浓郁见长。



《天地苍茫一根骨》是我创作的写史圣司马迁的一篇散文，文中有“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的话，刘先生对这样的旨意心领神会，便以相同的题目画了一幅画。画面上，一棵用血红和浓黑两色绘出的巨树屹立于浑茫的山川之间，其凸出的骨干刚强而苍倔，庞大的树冠以黑白黄蓝灰泼洒渲染，好似将风雷一兜而起的滚滚云团。



刘成章画作（2012年）

信天游是流传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坡间的一种民歌形式，它发自劳动人民的心底，具有苍凉、沉郁、宏壮、飘逸等特点，一旦唱起，便荡气回肠，响遏行云。

刘成章笔下的《信天游》，有负重的毛驴，有骑驴的脚夫，皆画得很小；而占据大部分画面的，则是结构成天地交涵、山水相依的红的、黄的、黑的、白的、橙的、蓝的各种不规则的色团。

《世间绝响》是刘先生近期创作的，让我第一眼看到就想鼓掌的佳作。画面上有喷墨泼彩大写意的峰峦、岩壁、树木和云岚，也有细笔色勾勒出的建在山脊上的屋宇，和两山之间的桥梁，以及桥梁上踽踽行走的人。全画构思脱俗，着色大胆，看上去斑斓多姿，有夺目逸神之感。

世间的种种艺术，要说复杂，那真是复杂得很，每一个门类行当，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要说简单，那也可以说简单得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意象。也就是说，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意”和“象”这两个字，都是这两个字的结合、发挥和拓展。

就说绘画吧，笔墨、线条、色彩、构图、章法、材料等，是“象”；思想、情感、趣味、气韵、格调、境界等，是“意”。光有“意”没有“象”，人们就没有可资欣赏、观摩、收藏、传扬的蓝本，也就谈不上艺术；光有“象”没有“意”，那“象”也就不具备欣赏、观摩、收藏、传扬的价值。事实上，任何“象”都有一定的“意”，只是其“意”，有多少、高低、浓淡、深浅之别。那么，优秀的足以传世的艺术佳作，就是那些有“意”有“象”，且将二者结合得特别好、特别妙的作品。

刘成章先生的“象”，以色彩浓郁见长，之所以选择浓郁的色彩，是因为刘先生有强烈的“意”要表达，这“意”，便是由颖敏的悟、深厚的情、智慧的思和超拔的想所构成的，反映着刘成章其人本质力量的“情思综合”。刘先生其画其文，正是其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情思综合”的外表化、艺术化。这样看来，刘先生是通过色彩浓郁的不同凡响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大爱在怀、大愿萦心、大气浩然的中国汉子的形象。

我们处的地球越来越斑斓了，斑斓的世界需要精彩的艺术。

愿刘先生佳作不断。

（2014年9月8日（甲午中秋）于西安龙凤堂）

# 寻找：生命的题目

## ——读《我的夏娃》致程海

程海兄：

你好！

集子读过了。从手法和结构上讲，我觉得最好的是《人之母》，因为你的这种散文诗化的，“橘瓣”式的（或称“蒜瓣”似更形象一些，橘瓣只是大家拱围在一起，蒜瓣是大家围着一根“柱子”在一起。这根“柱子”可以说是由浓郁的“情”和峻拔的“思”浇铸成的“人格”）写法很新颖。给当代文坛上增添了新东西，这就是价值之所在了。

不过，引起我更多思索的还是《我的夏娃》（既是篇名又是书名）。苛刻些说，你的这个中篇从叙述的故事（三角恋爱）到篇章结构（我们常见的壳子）都不怎么新鲜了。读的过程中，我曾暗想：“看你老兄怎样在这老故事的旧壳子里写出新意来！”最后，新意出来了，这便是：“寻找吧！”——放在肯定位置的男主人公“陈”寻找女主人公“景”的“心”；女主人公“景”在挣脱和逃遁中寻找“她自己”；而且，你甚至认为全世界人民都和你一起，“在寻找心”。是的，没错，寻找，的确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生命的题目”。

你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揭示出这样一个题目。这种揭示，无疑是新颖的，然而，同样站在“寻找”这个角度，我依然可以从你的这颗“蛋”里“寻找”些“骨头”出来。

不难看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倾注着你的爱。而我则觉得你的爱太理性了，理智到了冰冷的程度。比如，对另一个重要人物“刘”，你的态度是鲜明的“贬”，对“我”呢，则是鲜明的“褒”。然而从作品中提供的现有的材料来看，“刘”未必能“贬”得下去，“我”也未必能“褒”得起来。

不错，寻找是生命的题目，而寻找本身又是一个具体的、个性化的、流动的过程。人是多种多样的，寻找也就自然是多种多样的；换句话说，有多少人，就应当有多少种寻找。在小说中，“刘”的寻找是主动的、个性化的；而“我”呢，

则是被动的、共性化（或称群性化）的。且不说“刘”的寻找，其内容、其方向、其效应有些什么好与坏，只说他具备主动地选择和周围的人（包括“我”）不同的别致的活法这种精神，就是不那么容易全盘否定的，即使作为一种“参照物”也是有价值的。没有这种“参照”，“我”能显得那么高尚、那么“完善”吗？你可以骂他卑鄙、无耻，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别致。从创造学的角度看，只有别致的东西才算得上创新。而“我”，别致在什么地方呢？“我”的行为，不过是某种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外化。换句话说，面对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我们为什么总要认定自己的活法（也是有史以来很多人的活法）是惟一的呢？大家都依一种活法为活法，不是太单调太乏味了吗？

而主人公“我”渴望得到他的“夏娃”，但当得到的机会来临时，他却没有做“亚当”，而做了一个逃兵。他的逃遁实际上是一种高妙的、冠冕堂皇的“正人君子”式的残酷，残酷的拒绝、扼杀和舍弃了“夏娃”想得到“亚当”的欲望、权利和机会。——当我读到她说一句“你真好”，“我”回一句“你也真好”（多么高妙和谐的情景呀——残酷的“乌托邦”式的情景！）然后安然地睡去时，我不禁笑了，心里说：程海老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蒸馏”（原谅我用这个词）成某种干巴巴的形而上的理念呢？

看来，我得把“虚伪”“伪善”“假惺惺”这些贬义词奉献给你笔下的主人公了。事实上，对“夏娃”伤害的程度，“我”绝不亚于“刘”。“刘”的公式是“我爱你——我要你”，而“我”的公式则是“我爱你——但我不要你”。女主人公自卑人格的形成，除过自身的其他的原因外，与其说是“刘”造成的，还不如说是“我”造成的。正是“我”的“高尚”和“完善”，把一个可爱可怜的女孩儿逼到了墙旮旯。

“我”的劣根性还表现在对情敌的幸灾乐祸上。如果坦荡地承认“我就是恨你，恨你要过我想要的人，就是要痛骂你、嘲笑你”，倒也不失为一个男子汉。问题是“我”在幸灾乐祸别人的同时，还要显示出自己的“高尚”。于是借用因果报应的模式（这模式有人用过了），让“刘”丢这个丢那个——且不说生活中这样的人未必就这么多“丢”，说不定还要“得”还要“升”呢，就是“丢”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也不至于非变作痴呆、跌跌撞撞地行走，两只手在空中乱画，发出猫头鹰式的凄厉的呼号不可吧？（这样处理他，心里是不是觉得舒服

多了？）你通过“我”用威严的审判官的口吻断定：“他得到过权力，得到过金钱，得到过情欲，但是，他永远没有得到过‘人心’。”那么，反过来问：“我”又得到过什么呢？得到过“人心”吗？得到过怎样的“人心”，又是怎样得到的？我不反对拯救别人，但我们也都看到，我们自身说不定还陷在泥潭里；我也不反对对别人的严厉和残酷，问题是我们也得用同样的严厉和残酷对待我们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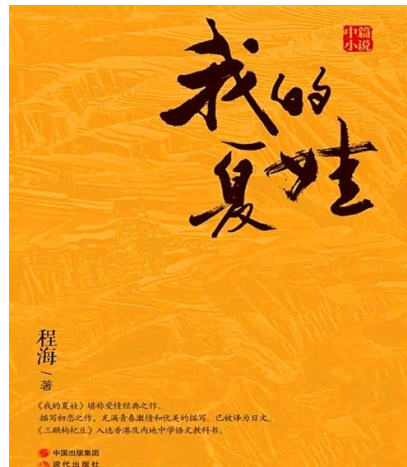
这信该煞尾了。我们说，寻找是生命的题目，写作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寻找的一部分了。用你的话说，就是“唯有写作才能使我们销魂荡魄”“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我们自己”。这部小说，是你老兄的寻找；我读完后写这篇文章，则是我的寻找。感谢你的寻找引发了我的寻找，而我的寻找也或许能为你的寻找提供点参照。

顺颂撰祺

庞 进

1989年10月26日

（刊于《西部批评报》1989年11、12期合刊；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我的夏娃》，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 读《山匪》

《山匪》（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读完了。合上书，觉得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语言，二是民俗。

语言延续着作家孙见喜先生的一贯风格：细致，精到，唯美。如写山里人炮制扁担，“眼见着它成了活物，红了，亮了，透出肉肉的红润”；写坡上的密林“一涌一涌地鼓着树梢子”。从“肉肉的红润”和“一涌一涌”这些富有特色的描写，你便能看出孙先生观察生活的细致和打磨语言的功夫。还有，“二人上轿，飘摇而去，西坠的日头在云中燃得正红。”按说写到“飘摇而去”就可以了，而孙先生却要加上后面一句。而恰恰这一句的增加，把读者带进了一幅画面，这画面当然是很美的。

也许与当了几十年编辑有关，我对语言讲究的作家持有敬意，我觉得从其语言上，不仅可以看出这个人文学修养的深浅，还能看出他对艺术、对事业钟爱的程度。而有些作家，就不大在语言上下功夫：粗糙，夹生，疙里疙瘩，读着读着，你就禁不住把他小看了：连起码的语言关都没过，还当什么作家？在陕西的作家里，孙先生对美文的崇尚和追求是一贯之、风标高擎的，这一点值得我们“见贤思齐”。

民俗描写，在此书中占有不少的篇幅：人物的出场，情节的演进，性格的展现，都有赖于、渗透于民俗事象的描绘。此书中的民俗，具有多、全、细、绝的特点，如写扁担的炮制一节，就让人击掌而叹：精彩！还有黄豆榨油一节，也非未深入了解者不能写出。而书中不时出现的歌谣、花鼓曲儿、哭丧词……且不说对故事的起承转合作用之大小，至少能看出孙先生对故乡民俗之偏好，和在搜集、整理方面下的功夫。民俗有活化石之谓。它们既有物质层面的实物，也有仪轨层面的讲究，更有观念层面的蕴涵。从一地一时之民俗，大约可以看出其地其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所以，我认为，孙先生这部新著，不仅是一部凝注着

作家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它还是一部民国时期商洛山区的民俗集成——对文学爱好者而言，它有欣赏的意义；对民俗研究者而言，它有资料的意义。

（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5月1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庞进与孙见喜（右二）方英文（右一）张孔明（左二）在秦岭天子峪（2013年7月28日）

## 和方英文下象棋

文人常说别人的婆娘，自己的文章，意思是婆娘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不像有的文人那样总说自己的文章多好多好，但我有时会说我的棋好，甚至说在本省文坛能下过我者寥若晨星。说这话基于三点考虑：一来事实上论棋艺，省内文人能胜我者不多；二来我发现在玩乐之事上将自己吹一吹，犯不着王法，倒平添了几分幽默；三来这么一说，常常能招来颇不服气者，这样，棋盘一摆，就有了挑战和卫冕的味道，伴之以口舌鏖战，棋就下得尤有趣味。

著名作家方英文就是总不服气的挑战者之一。有一回，我和他在著名诗人远洲那里开战，自然是我赢得多了，但有一盘我输了，输在一个小卒子上，我一直围追堵截，想吃掉他那个过河卒子，但总归没吃掉。之后相见，他一开口就说庞进你没忘吧？哎呀呀，那个卒子呀，太有意思啦，回味无穷呀！还有一回，开盘前，他说咱赢个啥才好，我说一盘十块钱吧，就请在场的著名评论家杨乐生作裁判。乐生说行，你俩下，我钓鱼，如果你赢庞进一盘，庞进给你十块我也给你十块，如果你输了，你给庞进十块也得给我十块。方满口答应，说小事小事，钱财是世间最小的事。结果呢，方氏那天好像把棋仙得罪了，第一盘输了，说钱先欠着吧；第二盘又输了，还欠着；接下来一输再输，钱就一欠再欠；最后算下来，一共输了十一盘，欠款呢，一直未清算。这样就屡屡复制一个场面：每当我、方杨三人相遇，一说到下棋，乐生就口语诛方，说方英文个球蹬脸，欠人一百一十块，至今赖着不清账。方则没听到似的，环顾左右，优雅地抽烟、品茶，煞有介事地谈论别的什么事情去了。

有趣的是，方先生看到上文后，心有不平，不平则鸣，于是有了下面一段话：“庞进，这位陕西名作家公然撰写一篇文章，大肆诋毁我的棋艺和棋德，我是很愤怒的。但我多少有些雅量，愿意承认一个事实：他的象棋眼目下确实比我好，但他又是以怎样的实战状态获得的呢？有凳子他不坐，就那么站着一直站着，手



托下巴死死地盯着棋盘，就像猫盯着耗子，你想白吃他一个卒是绝不可以的！他在棋阵中，不是下棋，而是比赛谁的神经更能绷紧并且绷的时间更长。把下棋看得重的人，必定把其他东西，诸如名位级别金钱等等，看得很轻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呆子，但却是才子，所谓性情中人也。——我爱我的棋友们。”

之后的 2017 年 1 月 2 日，我与方英文及文友远洲、严文龙，又相约于位于小南门内四府街的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办公室下了半天棋。关于本次下棋，我曾作诗《新年一盘棋》，曰：“方氏发提议，我亦乐此娱。召来张与严，四人围茶几。洗削红苹果，冲泡金骏眉。攻卒当头炮，上马直出车。求赢不怕输，轮番鏖战急。僵持寻妙招，功夫看残局。英文进步快，远洲小得意。云龙闯关隘，我守稳固地。午饭冬阳下，面饺胜宴席。间或聊时事，笑声伴妙语。难得忙中闲，新年一盘棋。”

（刊于《都市》2002 年第 3 期、《喜剧世界》2002 年第 11 期；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2023 年 6 月 5 日补）



庞进（左）与方英文下棋（2017 年 1 月 2 日，西安）

## 宏阔绵延的诗意空间

在认识的文学朋友中，田玉川给人的感觉是很“正”的：身材端正，脸盘周正，鼻梁正中架一副方框眼镜，言谈举止，总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书生形象。不像有些文人或准文人，正经本事没有多少，却学会了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甚至热衷于干一些蝇营狗苟的勾当。田玉川保持着“正直”“正派”“正义”的品格，这种品格渗透于写诗作文，就有一股浩然正气在汹涌蒸腾了。

多年前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曾邀我这个不擅长写诗，也不善于作序的人作了一个序。不料诗集刚面世，就受到了来自文学之外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作的序也成了我的一条莫须有式的“罪状”。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暴露出了一种人世间的滑稽。

现在，他又将要出版的一部诗稿捧来，依然邀我这个不善于作序的人作序。难以推辞的我不具备把稿子随便翻一下，就可以下笔千言的本领，只有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将这些诗作一首一首地读过，细细地咂磨品味，最后便有了“味道真不错”的整体感觉。

从意象的来源上分析，我发现玉川的诗明显地有三个取向：一是生他养他的彬县家乡，二是浩瀚绵长的中国历史，三是纷纭杂陈的社会现实。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家乡”具有“原型”的意义，与生俱来，赶不走，斩不断。故乡家园在诗人作家的笔下，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田玉川的出色在于，走出了许多人总是走不出的“月是故乡明”的窠臼，通过家乡的山水人事，写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他写道，“小山村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岁月和战乱似乎只乱了房屋，“永远乱不了黄土一样台阶鲜明的班辈”。在这个大家族里，有“汉烟袋抽着呛人的威严”的“家长”，有“恨人长大”的“老孩子”，有“一口就把娘那干瘪的乳房咬掉”的“强盗”……于是，父亲，“依然手扶犁杖”，喝着“一黑瓦盆稠糊糊的面汤”；娘则“从褪漆的柜里取出一双布鞋”，“用粗布条，把纯

朴叠了一道又一道”。这样的生存状态就不可变更了吗？诗人的回答不会是肯定的。他那“久久噙在眼眶里的乡情”，已被“一阵海风，轻轻吹落在脚下”，于是便毅然迎向“呼啸而来的，宽阔和透明”。

相比于故园乡土，浩瀚绵延的中国历史，似乎对玉川的诗作影响更大。这要得益于大学四年的历史专业的学习，和毕业后多年所从事的历史课教学，使他具备了比一般诗人要深远敏锐得多的视线穿透力。在这儿，他同样超越了许多人总是超越不了的“我们先阔多啦”式的自我慰藉，顽强地向矿藏的纵深掘进。他写“龙”，透过龙在皇袍被面、门楣牌坊、瓦当塔顶等等上面起舞的表象，看到东方古土所忍受的“扭曲痉挛的痛苦”。写“故宫”，他发现自己“和所有砌成墙的砖一起”，被压在宫殿底喘息，而“所有的黄皮肤”，只要和这里的铜盆轻轻一碰，就会感到“像刀刮骨头一样疼”。写“颐和园石舫”，他恍然大悟，中国为何久久“难以在大海扬帆”，原来是“希望”已久久地“在这人造的湖边搁浅”。

万象纷陈的现世生活是诗人赖以存在的环境，也是其诗作捕猎比兴的对象。田玉川的过人之处在于摒弃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陈词滥调，没有那种撩熏人的香艳气和酸人牙根的甜腻味。他总是剥去表层的花花绿绿，向世人昭示蕴藏在背后的惊人实质。他这样写“商战”：“纽扣密集的子弹，则把塑料的据点射穿；羊毛裹着风沙，就向钢铁的碉堡发起总攻的呐喊……”而“衣服们”“纷纷在街道行走”：“一阵风吼，炸雷滚过高楼”之后，这些“衣服们”，“很多瘫在街口呼救，找不见自己该走的路”；“唯有很少的衣服，领口，有血流”。他认为“麻将”是把命运的输赢，“缩小为圆桌上玩耍的游戏”，聪明智慧，阴谋诡计，竟笑嘻嘻地，“亲密围坐在一起”。

故乡风物，历史烟云，红尘世象，构成了田玉川诗歌创伤的“三维”。这“三维”交融互渗，而非独立孤行。同时，还有一“维”高屋建瓴地贯穿、观照着这“三维”，这便是从积淀和滤汰的长河中跋涉过来的人类当代文明。有了这一“维”，诗人必定要把自己的人文精神、社会理想、价值选择等等，渗透、浸润、流淌于字里行间。这“四维”构造，使田玉川的诗作超越了空泛和平庸，走向深刻和峻拔。比如，写兵马俑的人不少，多是一番称赞加一番感叹，而他，“面对站立的威严”，迎着“胸前砍来千把秦王剑，身后射来万支秦王箭”，竟想大喊一声：“解——散！”面对“城堡”，他思索“我心甘情愿把自己铸成一发轰击城堡的炮弹，

可不知为什么，一发射，我就变成了一块垒城堡的砖”。在困惑和无奈中，他发现，尽管“很多选择禁止通行，很多徘徊亮着绿灯，很多灵魂白昼昏睡不醒”，但依然有很多思想，在“子夜圆睁着眼睛”。诗人坚信：阳光，人和热土，“总在筛选，文明的优良稻谷”，“总在铲除，病毒的条条根须”，“总在开垦，岁月的片片荒芜”，于是，“总有生命的高度纷纷——迎风起舞！”

“四维”是一个宏阔绵延的生命空间，田玉川的诗之舞会越来越高妙，越来越神奇，越来越潇洒，越来越丰赡——年长他几岁的我，总是这么期待着。

（刊于《西安晚报》1997年11月13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田玉川诗的三大意识

## ——序《人的密码》

田玉川将他的诗集书稿《人的断码》拿来让我阅读，并嘱作序。一篇一篇地读下来，我发现其中的三种意识是显明而强烈的——

### 一. 生命意识：向鱼学游泳

人说诗文如其人，写诗就是写人，作诗就是做人。对人的关注和思考是田玉川诗作最主要的主题之一。且看：“人者，/万物之灵也。/告别丛林，/不再与兽群为伍：/昂首挺胸，/傲立于天地之间；/高视阔步，/行走于环宇之内。/虽无峰峦之高大，/却能尽显大山之巍峨；/虽无大地之广博，/却固有宽阔之胸怀；/虽无海洋之深远，/却蕴藏汹涌之激情。”（《人赋》）人是从海上来吗？人早就走出了丛林为何至今不能告别丛林法则？兽性和人性如何转变？猿猴真的是人的祖先吗？龙图腾和狼图腾各象征着什么？天地、人、神、鬼的关系如何？“人乃万物之灵，/万物乃人之用，/天因人而高，/地因人而广，/天地乃人之居所，/人乃天地之精魂。/神乃人之偶像，/仙乃人之梦幻，/鬼乃人之替身，/魔乃人之异类。/千年修行，/能否为人？/万年修行，能否成神？”（《人赋》）

田玉川用诗的形式，从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对人进行了长期全面的思考。“人类如何走过百万年进化之路，/高举火把穿过一个个漫漫长夜，/从一双手传递到一双手再传递到又一双手，/跃上高山跨过江河横渡大海迈上一个个台阶。/每一个起点也是终点还是新的起点，/照亮西方照亮东方照亮每一双目光，/犹如款款春风源源传递着温暖，/犹如灿灿群星把一个个长夜照亮。（《奥运十四行诗》）没有什么能像奥运会那样形象地表现人的进化和本性。“摇身变一尾鱼悠然游入水中，/慢慢爬出海岸已经很久很久了，/悠悠岁月早已把柔软的脊梁淬硬，/留

在其中的水性究竟还有多少？”（《奥运十四行诗》）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乳。“上善若水”。水性与人性相生、相通、相依、相存。“任何一条鱼的游泳技术，/都足够，/足够人一生摹仿和敬慕。”（《向鱼学游泳》）水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

人生的永恒意义是什么？“一生走着一条路，/走不动了就站在街心广场，/十字路口，/以一种不变的成熟与风流，/象征着伟大或不朽。”（《塑像》）这就是人生永恒的意义吗？“无论卒炮车相将士马，/都在一张网里挣扎。”（《象棋》）这样的羁绊和束缚该如何《突围》呢？“一群人周身起火了，/痛苦在滚翻，/灵魂在呼喊，/错乱的挣扎。蹦起来又倒下，/倒下又蹦起来，/音乐的狂风暴雨，/浇不灭彻夜咆哮的欲望。/蛇立的是影子不是眼睛，/龟行的是记忆不是脚步，/随手摘下天庭的蟠桃，/递给舞伴，/屁股上长出的尾巴晶亮晶亮又粗又长。/张开怀抱抓不住，/自己的一句诺言，/渴望被蹂躏的愿望，/腾起熊熊烈焰。”（《迪斯科广场》）这样的放纵，究竟是沉沦，还是升华？“既然方向和速度，已有人驾驶，很多车票就只寻找乐趣和舒适。”（《夜行客车》）这样的状态是一种超脱呢，还是普遍的无奈？“爬上手掌般的花瓣，/睁大看穿黑夜的眼睛，/久久凝视，/凝视岁月出生的一瞬的神圣，/气喘吁吁的灵魂，/瞬间露珠一样晶莹剔透，/连石头也能够塑造出生命开花的永恒。”（《华山日出》）有这样的意志和精神，难道不能创造生命的永恒和辉煌吗？

## 二. 忧患意识：打开故宫九千九百九十九道门

历史感强，是田玉川诗作的显著优势。且看诗集目录：《那些敲石头的人》《龙腾万年》《神的诞生》《帝王本纪》《长城：三千年龙思》《秦砖汉瓦》《玉鼎》《打开故宫九千九百九十九道门》《颐和园石舫》《西安城墙》《平遥古城》《大佛寓言》《楼兰公主》《铜雀台》……几乎都是历史题材，但都不是简单直观地重现，而是将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其所发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联系起来考察，将其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支点和连线进行评述。当然，对历史的研究不只是为了借鉴，更是为了创新；历史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当代进行时。

田玉川学习研究历史用吃“三明治”的方法：即最里层的是所谓正史——官修史书；紧挨着的一层是遗存在土地中的考古成果；最外一层是沉淀于民间的民

风民俗。三者印证即为较真实完整的历史。他写的“软文化丛书”——《面子》《圈子！圈子》《人情潜规则》等就是这种学习和研究的实践。而用诗写史，则是他一贯的锲而不舍的追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是享誉全国的强势学科，田玉川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读于此，能够得到史念海、黄永年等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诲，可谓幸运。如果说，科班学习使他掌握了系统的理论知识，那么，透过历史现象全面反思民族历史和解析民族文化基因，就使他的研究扩展到了“泛历史”领域、触摸到文化之“内核”了。

中国之路过去是怎样走的？现在正在怎样走？未来该怎样走？“亿万双脚，/曾经走在一个头脑里，/怎能不拥挤？”（《中国的路》）“难怪中国，/久久，/久久难以在大海扬帆，/原来希望，/久久，/在这人造的湖边搁浅。”（《颐和园石舫》）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思考过于浮浅和直白不同，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思路的不断开拓，田玉川的诗作从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积聚成熟期。一改80年代频繁在报刊发表诗，经常参加诗会的纯文人生活方式，与生活地由县市向省会和京城迁移，和职业由纯粹的教师向企业宣传主管、报刊总编辑、策划人的跳跃式转型相应，他的诗作也转向以深度和广度见长的专题创作。

用诗写全故宫，用诗写透故宫，是田玉川2000年进京的一大愿望。收入新诗集的由二十首各自独立又互相内在联系的大组诗《打开故宫九千九百九十九道门》是他近些年诗作的代表之一。他经常说：“故宫里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故宫浓缩了历史，也关照着现实。故宫是最大的四合院，故宫外老百姓的四合院只是其形制的缩小而已。”且看田玉川是如何用诗解析故宫的：“这些宫殿中站立着的大红柱子，/不是大兴安岭的松树吗？/叶子早就枯萎了，/根也被砍断，/只留下一副干硬的躯体，/默默地站在这里，/做皇帝陛下，/最后一批忠实的爱卿，/用凝固的静止静止的凝固，/支撑着一片神秘。/阳光，穿不透这厚厚的红墙；/星星，/也迷失了路。/听惯了圣谕，/一点一点也听不到阵阵林涛。/那枝繁叶茂的自豪到哪里去了？/那顶天立地的挺拔到哪里去了？/那遮风挡雨的宽阔到哪里去了？”（《宫门：大红柱子的绿色哪里去了》）这样的悲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怎样才能不会重演呢？“站在午门口大喊一声，/还——我——自——由！/红墙/宫殿/城楼，/瞬间化为乌有。/每一块砖头，/都伸出了紧缩的手；/每一块砖头，/都张开了紧闭的口；/每一块砖头，/都有冷汗涌流；/都有苦泪涌

流：/都有热血涌流；/每一块砖头呀，都在寻找自由之路。”（《午门：还每一块砖头自由》）

### 三. 文化意识：五千年历史是一道菜

田玉川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写过一首名为《中国菜》的短诗，有几十家媒体评介、引用，入选近十种诗选集、诗历等，一些诗朗诵会朗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五千年文明，/经过反复蒸煮炒炖焖炸煎，/依然香气扑鼻色彩鲜艳……但百年屈辱却难以下咽，/已经习惯/习惯消化光荣的胃，/真难以消化苦难。/两根筷子——，/怎能尝出中国的酸辣苦甜咸？！”（《中国菜》）在田玉川看来，我们常说的五千年文明，竟是一道美味的菜，由此可见，他的胃口该有多大？

更难得可贵的是，田玉川的诗作并未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上，更注重继承、创新和升华。“永远打不碎的，/是那不朽的仁；/永远站立不倒的，/是那挺立的灵魂。”（《孔子一夜之间来到天安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历经五千年风雨洗礼依然博大精深，焕发着勃勃生机。

“岁月的流水怎样浇灌，/那属于自己的一块心田，/只要有源泉那怕只有细流涓涓，/无论种什么——，/都会滋养出生机勃勃的圆满。/滋润的目光不怕天旱，/更不会张开一大片一大片，/龟裂的嘴唇呼喊，/绿色的家园，/优胜劣汰的生物链大战正酣。”（《岁月的流水》）每一个人，与时俱生，是否也能与时俱进呢？

阅读田玉川的诗作，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戴着眼镜，背着大书包，沧桑且多少有些苦倔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在旷野里奔走，在闹市中穿巡，在大河边吟哦，在高山上呐喊……烈日暴晒他，冷月寂寞他，啸叫的风掀起了他朴素的衣衫，凛冽的雨打湿了他斑白的鬓角，他痴心如一，乐而不疲，无怨无悔。

诗集取名《人的密码》，这使我想到了人的生存及其价值和意义。祝福三十多年坚持写诗的田玉川，但愿人们通过读《人的密码》懂得更多的人的“密码”！

（2015 年 3 月 3 日于西安龙凤堂。《人的密码》，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版）



## 乔盛：和苦难较劲

供职于京的陕西籍作家乔盛的新著《割不断的故土柔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到我手边已两个多月了，先是读了排在前面的《青阳岭纪事》《五谷百草吟》《黄河唱给长城的歌》等篇章，其间忙忙碌碌事情夹杂，直到这两天国庆节放假，才静下心来，将这部散文集里的五十多篇作品全部读完。读书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能让你读得聚精会神、读得有滋有味的书，一定是有独特魅力的书。这独特的魅力不但吸引着你一字不漏地读下去，还让你时而扼腕，时而唏嘘，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浮想联翩，且禁不住要把其中精妙的文句用笔勾划出来，读给你身边的人听。乔盛的这本书就是这样。

一个月前，初打开乔盛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思绪就舞蹈在我的眼前。现在我合上书，此思绪更像起伏在书的封面上的沙柳，如印如刻，挥之不去。我想，世上大概有两种人，一种人生来就是享福的，或言福比苦大；一种人生来就是吃苦的，或言苦比福大。乔盛显然属于后者。在娘肚里的时候，乔盛的父亲入伍当兵开赴青藏高原，一场战争，脑子被炮弹震坏并由此患上了疯病。转业不久，父母便劳燕分飞了。五岁的乔盛从神木县城回到了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和爷爷相依为命，开始了十年羊倌的生涯。山沟里滚，山道上爬，头上的疥疮久久不愈，身上的衣衫破破烂烂，几回回饿极了，趴在了母山羊的乳头下……成年后，苦难并没有离他而去。乡间，县城，西安，北京，事情都干得挺卖力，却总是有料想不到的变故无端地袭来。回到家乡后，创办《神府开发报》，艰辛备尝，成就不小，却遇上了报刊整顿。一个人再闯北京，供职于《中国人事报》，挤住在办公室里，胃病常常发作，折腾得他吃不下睡不稳，偏偏家庭又生变故，三个孩子都归了他，北京带一个大的，老家放两个小的……

苦难噬杀人，世上有太多的男女被苦难的磨盘碾成了齏粉；苦难也成全人，不少英雄好汉都是苦难这棵树上结的果子。非凡的发苗，多半是为了和苦难较劲。

仅就陕北而言，古代的李自成、张献忠如此；近代的刘志丹、谢子长如此；文艺界的韩起祥、路遥如此；我们的乔盛也如此。结识乔盛已有十四五年，这位同龄人给我的感觉是总是在和苦难搏斗，总是打掉牙和血吞，将苦涩和艰辛化为发奋的力量，一步一步地行进在坎坷的不断求索、矢志创造的路途上。他不是科班出身，文学底子算不上深厚，却硬是凭着一种志向一脉灵气一股钻劲一颗慧心，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马桂仙与牛毛蛋》、长篇小说《黄黑谣》，散文集《黄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和这本《割不断的故土柔情》，以及电视剧《大漠落日圆》等等颇具影响的作品。——其意象也丰富，词语也鲜活，感悟常常是独到的，且总有深切的情愫铮铮琮琮地流淌于字里行间。当年的《神府开发报》是内刊号报纸，从创办之日起就好稿不多，经费艰难，身为总编辑的他一身几任，既作记者上山下矿，采写稿件，又以评论员的身份撰写言论，还不得不赔着笑脸，东奔西跑，四处化缘。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份对开大报还是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秦晋蒙三省区的接壤地带，为当地的经济飞跃文化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以这份报纸为阵地，他提出了建立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新经济战略，可谓西部大开发的先声；并首倡建立“中国人才节”：心意不能说不挚重，目光不能说不深远。

我曾三次去陕北，目睹过乔盛写作、办报和为一家人的生计而奋斗的种种艰难，其情其景，令我由衷地感动。我说乔盛呀，你这四十多年人生是苦难的，也是辉煌的，因为能战胜苦难、升华苦难的人生，都是大写的人生啊。前不久，乔盛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本书之后，他还有一本《记者眼里的世界》要出版，此书将精选这些年来他写的有关人才人事及以记者的目光观察、剖析世间万象的文稿。我说这该又是一部和苦难较劲的作品了。作为读者，我期待着他的新著；作为朋友，我还是希望苦难离他而去，至少不要那么沉重。

（刊于《西安日报》1999年11月16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爱歌

我的朋友乔盛四十岁出头，正处于男性一生中最“精品”的年龄段。

他的经历比较复杂，父亲是进藏的军人，母亲曾是一位教师，两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自由恋爱，却在儿子出生不久离异了。乔盛的童年是在陕北的大山里跟着放羊的爷爷度过的。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安家在县城，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1994 年，乔盛夫妻也因种种原故走上了分手之途。离婚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对于事业上已颇有建树的乔盛来说，折磨和打击是可以想象的。乔盛曾在北京两次学习、工作。1997 年，他第三次进京，在国家人事部主管的报社当编辑，白天上班编报，晚上伏案写作。孤独和寂寞中，乔盛将一篇篇耐人回味的作品奉献给了读者。在北京的新闻行当、作家群里，不会使用电脑的人大概已经不多了。而乔盛，就属于那种对电脑几乎“一窍不通”的“前生带”作家。

乔盛第二次的爱情之火就是因他不会使用电脑而燃烧起来的。他头天夜里用笔写出文稿，第二天早晨上班之前匆匆跑到单位附近的一家打字室去打印。于是，一位打字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写的每篇文章，都被姑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有时，姑娘还冲着乔盛甜甜地一笑，对作品做一番评论。起初，乔盛并没在意，时间久了，他发现这位姑娘不但长相清秀，品格也是纯贞高洁的。作家动情了，他强烈地感受到，姑娘明亮的双眸里也有一种神秘的信息在发射。那种由柔情和求知的欲望汇成的浪涛冲击着乔盛失去家庭温暖的大门。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大胆地邀请姑娘到中央民族乐团观赏一场音乐会。两人之间的爱恋也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姑娘叫石桂红，刚刚二十岁，虽说仅有中学文化程度，文学艺术的细胞却是发达的，对电脑知识的掌握和实际操作也都是精熟的。爱情的力量神奇而强大，任何障碍都挡不住。四十岁与二十岁之间相差的不算短的年龄跨度，被姑娘勇敢地跨越了，她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脉冲赶上了乔盛的生活年轮。两人相爱了。

1999年，乔盛出版了散文集《割不断的故土柔情》和杂文集《一个记者与作家看世界》（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版），受到方方面面的好评，也使石桂红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乔盛的事业就是她的事业。“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她泪光闪闪，扑向了他的怀抱。

今年2月，石桂红从山东老家过完春节后回到北京，毅然决然地与乔盛生活在了一起。她知道他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他从她的爱里汲取着力量和灵气。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她帮他查资料，打稿子，校书稿，照料他的生活，陪护他上医院看病，使他以强健的使命感和饱满的激情完成了《西部大开发》《红山丹》两部共计六十万字作品的写作、整理任务。这段时间，是他们爱情最有意义的精彩篇章。乔盛擅长于写陕北信天游，他把自己与石桂红的爱情用信天游的方式表达出来，常常逗笑得石桂红弯下腰直不起来——

山丹丹开花满洼洼红，想妹妹想得牙根根疼。

白生生的脸蛋软溜溜的手，走着走着想亲亲妹妹的口。

羊羔羔爱吃嫩草草，你看妹妹好不好。

红萝卜钻地一把把深，妹妹就爱哥哥一个人。

树上的鸟儿一对对，咱俩个相好一辈辈……

一个作家与一个农村姑娘的爱情之火，在北京的大院小屋燃烧起来。人们为她们的爱情拍手叫好，等待着吃他们的喜糖。

石桂红对乔盛说：“我是上帝赐给你的宠物，在你的怀里，我很踏实”。乔盛对石桂红说：“我因有了你，年轻了二十岁，得到你，才真正体会到‘爱江山也爱美人’那首歌的真正含义”。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10月19日、《海口晚报》2000年10月22日）

# 烈火烧得太阳红

## ——读乔盛《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

大约在三年前吧，一次愉快地相聚，借着点酒兴，乔盛激情洋溢地告诉我，说他要写一部以陕北红区的创建者之一、老革命白坚为主人公的书，部头比较大，大概得四十万字左右。对他的这个宏伟计划的提出并付入实施，作为深交多年的朋友，我当然是理解的、支持的，而且毫无怀疑地相信，他是能够将这部书写成功的。记得当时我们曾分析过他能写好这部书的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乔盛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对那块土地上的山川景物、历史变迁、革命烽火、民俗风情等等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感悟，这便为他把书写得血肉丰满提供了基础。

第二，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探索和磨炼，乔盛的文学功底已相当深厚，出版有散文集、长篇叙事诗、长篇小说、学术论著等著作十多种，已以独特的风格享誉文坛，这便为他把这部书写得文采焕然提供了保证。

第三，这一条或许更重要，也许是因为生长于陕北这个红色革命大本营的缘故，在我看来，乔盛是一个革命性很强的作家，政治情结，一直在他的心胸中生长着、纠缠着、澎湃着、激扬着。而且，他在基层当过教师，做过共青团干部，创办并主编过地方报纸，又先后供职于国家部委的新闻媒体，撰写、发表过不少人才学、新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论文及论著，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长期的理论修养，使他不仅以作家、记者的身份存在，还自觉、自励地以一个政治观察家、政治谋略家的身份存在。这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又游刃有余地驾驭像《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

还有，第四，谁都知道，写作是一个吃苦的事情，尤其是写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需要一段时间聚精会神、夜以继日地爬格子自不待言，还需要做大量的案头、非案头工作，如查阅相关资料、采访知情人、到主人公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去

考察，等等。好在乔盛成长于异常艰苦的环境，工作后也常常面临重重困难，能吃苦、敢吃苦、善吃苦，与苦难较劲，且以苦为乐、以苦为筏，已成为乔盛性格的组成部分。

乔盛的书稿大约是 2005 年春天完成的。初夏，乔盛出差古城西安，随行带着该书的打印稿，厚厚的一大叠。于是，我便成了这部书的首批读者之一。说实话，这些年，能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一字不拉地由头读到尾的书是很少的，包括一些朋友送我的书。而《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具有这样的魅力，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曾几次击掌赞叹，对我的家人说：乔盛费大神了，把这本书写好了！合上书稿的最后一页，凝神闭目，将阅读感受做一番梳理，起码有三条是很鲜明的：

第一，波澜壮阔的史实画卷。全书从白坚的父亲白文焕参加辛亥革命写起，接下来是主人公白坚在贾拓夫、李子洲等先驱者的引导下，成为一名优良的火种，参与了陕北革命的烽火燎原；然后一个转折，主人公又肩负起特殊使命，奔赴北平，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再下来，参与领导著名的高、蠡、博暴动，与日本侵略者喋血长城；之后，主人公又返回陕北，与刘志丹等红军领袖并肩作战，又一同被极左路线整肃；再之后，以“神特工”的身份，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之后，奉命奔赴抗日前线，岢岚山魂，晋绥烽火，浴血奋斗，艰苦卓绝，直到挺进东北，决战辽东，迎接黎明……写了老一辈的传奇，写了后来者的英勇；写了红区的你死我活，写了白区的险象环生；写了一桩桩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也写了构成这些大事件和这些大事件之间的鲜为人知的小史实。可以这样说，主人公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历程。这个历程黄河般的千回百折、波澜壮阔，已展现和演绎在这部书的页码段落之中。

第二，特色独具的文学描绘。《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属于纪实文学，如果只有“纪实”，没有“文学”，那么，这部书就只完成了它的一半使命，从而使艺术感染力大打了折扣。这个问题，作为优秀作家的乔盛当然很清楚，因而在艺术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其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主人公白坚自然是用力最大、着墨最多，不乏精彩之笔。如写白坚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保定二师执行任务，巧妙地制服和利用两个警察局的“便衣”一节，突出地表现了白坚的大智大勇，其生动传神，令人

拍案。主人公之外，有勇有谋、一身豪气的西北“哥老会”的“龙头老大”白文焕，大胆果敢的白坚夫人石侠，来去飘忽、神秘莫测的女地下党负责人“燕子”，伪装成算命先生的辛亥党人“黄神仙”，满口山西土话的军阀阎锡山，集奸诈、无赖与野蛮于一身的“瘦鬼处长”，等等，都令人过目难忘。二是运用了不少带有浓郁“信天游”味道的语言。如“老黄风从毛乌素沙漠向南卷动着沙尘把天与地压缩成一个黑暗的世界”“风声与野狼嚎叫声中又隐隐从大漠深处传来妇人的啼哭声，混杂的悲壮声中有无数王昭君和孟姜女在古长城的废墟上站起来又跌倒，重复着她们与残暴和压迫抗争的命运”“阴霾与阳光同时遮盖着沸腾滚烫的陕北黄土高原”“青春的血管奔腾着涌动着生命的血浪血涛，伟大理想的朝阳照亮和指引着他前进的里程”，等等，这样的语言有“象”有“意”，以“象”寓“意”、引“意”，鲜活生动，有车轮滚滚，腾腾向前之感，是典型的乔氏风味。

第三，作家情思的艺术投注。《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是纪实性的传记文学。在我看来，所谓传记文学，从一定意义上讲，既是为传主作传，也是为作家自己作传。如果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没有深刻的认知，没有欲罢不能的情感，他就不会劳神费力地去为这个人作传。毫无疑问，乔盛把自己对陕北故土的眷恋、对英雄贤达的崇敬、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关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等等，都倾注在这本书中了。而且，他还以书中人物、事件、景观为载体，表达了自己多年来，对人生、对社会、对战争、对信仰的深沉思考。如对阎锡山、蒋介石骨子里信奉皇权主义的分析，对“书记”二字的阐释；以及“生命要为理想活着，生命建立在为理想的实现不停地奋斗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人生一辈子最闪光有意义的经历也就数‘曲折’的地方最珍贵”等堪称经典的话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打开这部书，在读出生入死、终生奉献的一个革命家的光辉业绩的时候，其实同时也在读一个作家，这个作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呕心沥血、以笔为旗。

（刊于《西安日报》2005年10月21日。《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作家出版社2005年9月版）

# 如画风景任君描

## ——在乔盛《干部论》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在这里讨论乔盛的《干部论》，我听到了很多高见，颇受教益。

我和乔盛相识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那年他到陕西农民报当编辑，同时也搞创作，我则干我的老本行——编辑西安晚报的副刊。于是，他投稿，我编稿，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这朋友一交就是二十多年，交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程度。二十多年来，乔盛所想、所谋、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听取者、见证者、欣赏着，其间一些事情，也可以算是一个参与者。

那么，作为一名杰出的人才，乔盛身上有哪些特点呢？在我看来，用这么四句话可以概括：挑战意识；英雄情结；执着精神；运作能力。

乔盛出生于陕北神木县一个偏僻贫瘠的黄土窝里，打小父母离异，放羊汉爷爷艰难地拉扯着他。有这样一个画面：山坡坡上，一个满身灰土的男孩，趴在母羊的胯下找奶吃。这个男孩就是乔盛。艰苦的环境，玉成了他从小就具有一种向命运挑战的意识。成人后，这种意识始终伴随着乔盛。于是，他由乡村到公社，由公社到县城，由县城到省城，由省城到京城；做广播员，团干部，编辑，报刊创办者，担任社长、总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电视剧、作导演，直到现在写专著，做学者。乔盛的这几十年，可以说是连续不断地、多方出击地向命运挑战的几十年。

陕北是生长英雄、养育英雄、成就英雄的地方。古代有张献忠、李自成，近当代有刘志丹、谢子长，以及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一大批革命家；而乔盛打小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其中不少章节，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一切都给乔盛以深刻的影响。所以，乔盛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结外化、散发开来，就是一种英雄气概：他要追求卓越，他要出类拔萃，他要叱咤风云，他要指点江山，他要激扬文字，他要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要当一个英雄，或者说要做一个人杰，是很不容易的。困难多多，打击多多，挫折多多。据我所知，乔盛有不少想法，有诸多谋划，也付出了许多异于常人的艰辛的努力，结果往往功亏一篑。但乔盛不沮丧、不气馁、不服输，咬牙吞血，接着再来。我每次见他，他都有新的想法，讲起来眉飞色舞，慷慨激昂，让你不由得不受其感染。

乔盛不仅能写，能讲，还有很强的组织、运作能力。有关他的作品首发式、研讨会开过多次了，其中三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有一次我参加了，与会者不光有京城文坛的名流大腕，还有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当时为河北省作协主席，后来成为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会后，央视新闻联播及多家国家级传媒都发了消息。乔盛的这种运作能力，许多作家、学者是不具备的，比如我就常常自叹弗如。前些日我在一个大学讲演时，曾言人要“两活”：站起来活、站出来活。站起来活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告别奴性，站出来活就是说 要尽可能地告别平庸。那么，站出来活，在当今社会，就有一个善于运作的问题，这方面乔盛为我们提供了模板和经验。

所以，我说乔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人才，还是一位优秀的干部。

前些日，乔盛到西安，又给我讲了他的一些新的想法和打算，我为他的精神、毅力所感动。事后，曾写一首嵌名诗，今天，借此机会送给他，也朗诵一下：

松柏杨柳皆为乔，盛意芊芊感朱毛。

愿得四面八方力，如画风景任君描。

前两句：“松柏杨柳皆为乔”，是说松柏杨柳几种树皆为乔木；而乔盛的身上，既有松柏的坚强高标，又有杨柳的适世柔情。“盛意芊芊感朱毛”是说，松柏杨柳的品格曾使朱德和毛泽东感动，朱德有“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句，毛泽东有“杨柳轻扬直向重霄九”“春风杨柳万千条”句。

最后，我想祝福乔盛，也祝福在座的不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心想事成、新年吉祥！

（2010年12月26日于北京国际名人大酒店）

# 乔盛的使命意识

## ——在乔盛《人才论》《干部论》《领导论》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和乔盛是很“铁”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从昔日的满头黑云延续到今天的两鬓挂霜。作为杰出人才，乔盛身上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有很强的使命意识。乔盛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干大事、成大事的，所以从懂事起，他就崇拜那些干大事、成大事的人；成人后，可以说，乔盛没有一天不在培育、滋养、强化干大事、成大事的意识，没有一天不在朝着干大事、成大事的目标而努力、而奋斗。

大家知道，干大事、成大事是不可能不与“政治”发生联系的；或者说，“从政”，是干大事、成大事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是捷径。多年前，乔盛就激情满怀地给我讲，如果让他主持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更大的范围，他会怎样怎样——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憧憬、一串理想了。憧憬和理想不等于现实，事实是，乔盛尽管后来做到了副县长的位置，但离他的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怎么办呢？乔盛换了一个方式，于是便有了《人才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年版）、《干部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年版）、《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年版）这皇皇的“三论”。可以这样说，这“三论”是乔盛“从政”理想的学术化，是以学术的方式“从政”。

乔盛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使命意识？我想至少有三个因素：

一是小时候吃过苦，甚至是吃过大苦。乔盛出生于陕北神木县一个偏僻贫瘠的黄土窝里，打小父母离异，放羊汉爷爷艰难地拉扯他长大。童年、少年时的艰苦生活，往往是一个人发奋的起点和基石，它会激励一个人不断地向命运挑战，即使一次次被打回原点，也要咬牙吞血，向着目标，一次次出发。

二是榜样的力量。陕北是生长领袖、养育领袖、成就领袖的地方。古代有张

献忠、李自成，近当代有刘志丹、谢子长，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家；而乔盛打小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其中不少章节，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一切都给乔盛以深刻的影响。所以，乔盛的身上有浓厚的领袖情结，这领袖情结与使命意识相结合，就成了干大事、成大事的动力。

三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奉行的是积极入世的有为主义。儒家的这些东西，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的血液里、骨髓中。中国的男人，尤其是优秀一点的男人，没有使命感的人大概很少。换句话说，大家都想“平天下”，你在这个行当“平天下”，我在那个领域“平天下”，你以你的方式“平天下”，我以我的做法“平天下”。乔盛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力图在“领导科学”这个领域里“平天下”。

一个人使命意识强与不强，会对其成就大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我看来，乔盛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因素多种，使命意识之强，是主要的一条。作为来自家乡的朋友，我为乔盛强健的使命意识而鼓掌！祝福乔盛！祝福大家！

（2011年9月24日）



乔盛（左）与庞进

# 体现民族精神风貌的“这一个”

## ——读乔盛《杨家城》有感

读完乔盛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家城》（中国文联出版社 2023 年 8 月版）的感觉，可用“历史的画卷、英雄的赞歌”十个字来概括。该书以四十万字的篇幅，以“历史史实+文学想象”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展现了五代十国末期至北宋初期，发生在古麟州（今陕北神木）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着力塑造了杨宏信、杨重贵（杨业）、杨重训、张平贵、郭玉方、佘赛花等一批英雄人物，歌颂了他们在王朝更迭、战火绵延的“乱世”年代，挺身而出、敢于担当、忠勇奉献、救民于水火的精神风貌。

杨宏信是该书中排在第一位的英雄人物。这位“男一号”的事迹，史志中记载得并不多，在清朝道光年间编修的《神木县志》中，相关介绍只有二十几个字：“杨信，太原人，一名宏信，仕北汉为麟州刺史。保障边城，屡著功绩。”而到了乔盛笔下，杨宏信的事迹就曲折、丰富、可感可叹、可歌可泣起来。《杨家城》全书共十二章，从第一章“杨重贵探山”到第八章“忠魂的绝唱”，杨宏信都是“活灵活现”的主要角色。

小说中，杨宏信不再是《神木县志》中记的“太原人”，而是麟州南乡拥有上千亩山地、二百多亩水浇地、二百只羊、十多头牛驴骡马，及杨氏家族住了一百多年的窑洞院的“土豪”。这位“土豪”，于天下大乱、群雄混战、刀兵四起、民不聊生之际，毅然卖掉全部田地家产，带领两个儿子和全家，及投靠、追随而来的族众乡勇，搬迁至古麟州城。其时的麟州城因屡经兵燹、土匪散兵恃强劫弱、居民多弃家逃难而混乱无主。杨宏信进城后，不仅招兵买马，收编各路被逼为匪的英雄好汉，训练、建立起一支强悍善战，以保境安民、时刻准备为天下太平奉献力量为使命的“杨家军”，还安抚民众、购田种粮、办校兴学、设市励商、修路造林，甚至开设考场，遴选县官……成为夙夜图治、勤政有为、造福一方，受

到百姓拥戴的名副其实的“麟州王”。

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在言及“匪”时，常有“占山为王”“据水为寨”“劫富济贫”“打家劫舍”等说辞。于是，我们注意到，历史上凡是“占山为王”“据水为寨”者，或因活下去需要资源而不得不去“劫”，却因沾了这个“劫”字，多多少少有了伤人、祸生、害一方的“匪气”。《杨家城》中杨宏信，的确也属于“占山为王”——麟州城建在山顶上，但他没有“劫富济贫”“打家劫舍”，而是在天下混乱、百姓流离之时，大义凛然、勇敢无畏地站起来、站出来，举起“保境安民”的大旗，竭力尽能、躬身笃行地让一方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因而，杨宏信是与“匪”有云泥之别的英雄，其身上散发的，是体现、昭彰中华民族“奋进、福生”的精神内核，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

也因此，我们感谢将作家与学者兼于一身的乔盛，为中国的文学画廊，也为广大读者，塑造、奉献出一个不同以往的，堪称“这一个”的典型形象。

（2023年8月3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朝后看：诗人的勇气与锐目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活在历史中。几千年几万年地走下来了，我们的脉管里，流动着先人们的血，我们的骨骼里，承积着先人们的髓。未来怎么样？还没有活，不知道。而现在，也就是眼前当今耳目下，一刹那便成为过去，永不复返的过去。因此，我们的所谓感受，实际上都是对过去、对历史的回味。

意识到这一点是一回事，意识到之后，主动地回溯历史、打捞历史是另一回事。朝后看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任何一种过去，都不会是鲜花盛开莲荷盈盈晴空万里。它有太多的荒漠荆棘，太多的难言之隐，太多的苦情悲泪。它不比向前看，前面的事情由于没有经历，可以由着你想象、憧憬、编织、描绘，因而往往是美妙的、轻松的。

刘文阁具有这样的勇气。读他的诗集，无论是 1993 年出版的《进程》、1996 年出版的《与菊同行》，还是现在的这本《面对古典》，你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勇气的冲击力。“萧萧易水”“剑殇”“残钟”“伤松”“遗址”“陈情表”……不忙欣赏内容，只要读一读这些古香悠然的题目，就不难了解诗人的智慧之锄挖到了哪里。

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人书写的。书写者的局限好恶，常常把历史涂抹得部分地甚至大部分地失去了本色。好比看一个人的履历表，你能说它不是一个人的历史吗？但你怎么能从这份履历表上看到这个人的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丰富奇谲的感情经历呢？所以，朝后看不光需要勇气，还需要一双锐目，能够撩开那些云遮雾罩，去透示一份本真；能够划开宏阔深淼的水域，去侦察和打捞那些隐没在礁石丛中的奇珍异贝。

刘文阁具有这样的锐目，尽管这双锐目还可以磨砺得更犀利、更颖锐。“生命，诗一样短 / 最后一行上 / 那女子站出来”这是一首写虞姬，这位楚国的“最后一枝花朵”的诗，“翩翩起舞，把 / 湍流咆哮的乌江 / 握成了一把剑 / 就沿着剑锋上路 / 寒光闪过 / 头颅永远在波涛之上 / 和英雄一样高”。简约的句

子，写出了一位旷世美女的娇柔和刚烈，发掘出了这位女子身上的大美，弘扬着一种需要人们仰视的崇高。他写李白，在肃杀的冬天到来时，乘一叶扁舟，载着“锐利的才华”，“穿过飞涨的渭水 / 驶出了大唐 / 只是将那只靴子 / 仍留在唐诗版图的中心”；写柳宗元，这根“优质的骨头”，“无论插在永州 / 或更南端的柳州 / 都会生长出 / 比天子更壮丽的华冠”；写秦桧，已“乘坐着他的豪华马车”在南宋的伤口上消失，于是发出疑问：“一块黑铁，熔铸 / 长夜和血泪 / 这跪伏唾液之下的躯壳 / 和秦桧有什么关系？”这些诗句，都是很见功底的、新颖别致的，是一种深刻而艺术的别致。

诗人的锐目需要岁月的磨炼，需要艺术的滋养，更需要时代精神的淬蘸。朝后看，是当代人朝后看；朝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因此，所谓历史，无疑是当代人眼中的历史，是用文明之灯观照了的历史，是未来的历史。刘文阁显然意识到了这一层。在《初抵深圳》中，诗人看到：“两小时的路程 / 穿越唐宋元明清……激情的城市 / 血以一百码的时速 / 昼夜奔流 / 酒店五光十色”。于是，“青铜甲骨的文字 / 渐渐沉淀 / 黄河长江渐渐竖起”，诗人“站在这城市 / 滔滔两千年的顶端 / 超越的欲望 / 从星座间阵阵袭来”……

我和文阁已有十多年的交往，血与火的考验熔铸着我们的友谊。那年，受我的影响，血气方刚、头脑清醒的我们参与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我蒙难，也祸累得他离开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走得更近了。在我的感觉中，文阁是一个诚信厚重之人，是一个不断地走过自己，从而具备大聪明的人，是一个秉赋正气、追求崇高、“让骨头燃烧”的人。如他诗中所言，这根“淬了火的骨头”，“可以折断 / 迸射金属的全部响亮 / 却再也无法打制 / 钻戒或灿灿项圈 / 可以历经曲折 / 却再难弯曲下来”，尽管“低矮的门楣那么多”！

做这样的诗人是不容易的，甚至是苦涩的，孤寂的，最后也很可能像逐日的夸父那样“道渴而死”的。然而，在现今如此浮嚣的世间，还有做这番追求的诗人，还有穿透古今，志趣高远的诗篇问世，而且，这样的诗人还能“与我同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刊于《西安晚报》1997年10月20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梦中家园》引发的思考

《梦中家园》是作家王盛华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部力作，其重要意义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讨论、总结、阐述。在我看来，起码有两条是需要指出的，即“立此存照”和“引发思考”。

言其“立此存照”，是说该书具有民间档案的意义，它真实、生动地记录、反映了以王盛华家族为中心的一群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路历程和心路历程。当然，它不仅是一个家族一群人的生路历程和心路历程，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的生路历程和心路历程。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国人是如何从那个历史时期活过来的，其心灵又经历了怎么样的苦痛和煎熬。

言其“引发思考”，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这个文本的字里行间，有许多足以引起有心者做进一步探究的“思考生发点”。

比如，为什么要给王盛华的生身父亲李言让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李言让为什么要任劳任怨、努力“表现”，力求早点摘掉“帽子”？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里，“任你根红苗壮，若亲属中有一个人是专政的对象，戴着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同样也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别想在人前扬眉吐气”？

比如，当王盛华在办理调动遭遇“卡壳”时，曾悲愤地发问：“为啥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比如，受尽磨难的“父亲”临死前提醒、告诫子孙：“诗书养身，切莫从政！”而“母亲”在观看省文联采风团的下乡演出时，被“搀到前排中间，和省、市领导坐在了一起……这是令我特别感动的事，对母亲也是最大的荣耀……是她一生中最高的政治礼遇”。事后，母亲逢人就高兴地说，“我这辈子没白活”，“也算在人前风光了一回”。

王盛华在书中把父亲和家族成员遭受的苦难归究到“极左路线肆虐”，那么：为什么“极左路线”会肆虐？这个“极左路线”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怎样的联系？



答案可能有多种。若从文化基础的角度考察，儒家伦理是需要审视的。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华文化大厦的中坚支撑，儒家伦理深入人心，对中国人的情感发育——以至于我们大家至今还活在人情的包围、羁绊、温暖、幸福中，对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可谓功莫大焉。然而，儒家伦理的自控力往往不足以阻挡滑向“伦理至上”“伦理过度”境地的自动力。其上下尊卑之分，为专制强权种下了基因，也为所谓的“极左路线”提供了可能。中国社会的宝塔型结构是符合儒家伦理的，由低向高，一层一层，越往上尊严度越高，越往下尊严度越低。于是，“学而优则仕”“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人”，成为主流价值取向。所谓“革命”，所谓“运动”，也多以剥夺人的尊严为目的、为手段。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尊严，肆意剥夺另一群人的尊严，好像只有剥夺了另一群人的尊严，这群人才能保持尊严或有更大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王盛华的生父之所以被戴上“帽子”，就是他不幸成为被剥夺尊严的一群人中的一员；王盛华的母亲之所以改嫁，也是为了让儿子，也让自己，从被剥夺尊严的一群人中逃离，从而多少能获得一些尊严。

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家一方面回顾、反思过去，祈愿家族的、民族的悲剧不再重演；一方面对当今道德滑坡、信仰缺失、贪腐成风等等社会现状忧心忡忡。于是，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呼声日渐强烈。近年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将“龙道信仰”作为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主体性信仰的观点。“龙道信仰”提出要对“伦理至上”“伦理过度”，保持足够的警惕和防范。强调传承儒家的“爱己爱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强调要像尊重自身一样尊重他人。

我想，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理念，如果能被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所树立，所秉持，所实践，那么，中华民族的“失魂”状态将会大大改善，诸多“社会病”会得到有效的医治，王盛华笔下所呈现的悲剧将不至于重演——这或许也是隐含在《梦中家园》书中的殷切呼唤。

（2013年5月31日于西安慧雨庐；2013年6月1日在《梦中家园》研讨会上发言）

# 一木三枝 蔚出林表

## ——多重身份的邢德朝

认识邢德朝已有几十年光景了。在我的心目中，德朝是一个有多重身份的文化人。

邢德朝是一个诗人、作家。作为诗人，德朝三十多年前开始写诗，现已有六七百首之多，结集出版了《年轮》《钟鼓楼诗情》《关中》等。作为作家，德朝写了数百篇散文，结集出版了《穆柯寨话语》《穆柯寨记忆》《朋友是座山》《但愿人长久》等。

在我看来，人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更应该是审美存在。区分一个人精神存在的高下，就看这个人能否进入审美存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若缺乏审美的能力，或者审美的能力不高妙、不精致、不特异，这个诗人，这个作家，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诗人、好的作家。德朝的诗是审美的。他写《爆竹》：“爆竹的回音中/童年已在成熟/我的脑海/装满浓浓的烟花/烟花，紧紧地贴在我的脸庞/像是童年时候贴近妈妈的怀抱/童年的嬉闹在印象中/是唱不完的歌谣……”他写《父亲》：“儿时，父亲/是一座高大的塔/层层叠叠着/伟岸、神秘和豁达……/当我刚刚学语呀呀/他就常把我举过头顶/眺望那远处的景色/我笑了，他也笑了/笑声越过村头的堤坝……”读这样的诗，我们会进入一个画面、一个场景，感悟到一种质朴而淳厚的亲情。这画面、这场景、这亲情，当然是审美的。德朝的散文多以故乡的山川风物、史迹人事为描绘、抒发对象，如收入《穆柯寨话语》的诸多篇章，包括经我手编发在《西安日报》上的《老窑洞》《石头坡·龙泉·降龙木》等。这些散文以质朴、淳厚见长，同样是审美的。

邢德朝还是一个编辑家、出版家。德朝的编辑、出版事业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先是租了西安西郊一个旧楼的几间房。我去过他那里，楼道和房间里堆满了杂志、文稿，留下了拥挤、灰暗、杂乱的印象。那时候，他的坐骑是

一辆自行车。后来，换成了一辆摩托车。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朱雀门内古城墙下的一个面馆约见，他就是骑着摩托车，风尘仆仆赶来的。再后来，进入 21 世纪以后，德朝就“鸟枪换炮”了，坐骑变成汽车，办公室、编辑部等也都搬到了西安高新区新建的写字楼上，还有一个书画展厅，宽敞，明亮，气派——这当然可看做是对他几十年勤奋努力的一个肯定。

经德朝编辑、主编、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有《陕西文化人》《中国西部文化大特写》《陕西文化人写真集》《陕西文化人书法作品精选》《中国西部诗歌选集》《陕西诗歌选集》，以及《厚德载物》《高山流水》《穆柯寨》《艺坛》《陕西金石书画交流》等。这些图书、杂志、报纸，将陕西乃至中国西部，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企业文化等领域做出突出、较大贡献者几乎都收录在册，总字数超过了几千万。尤其是近期出版的《金石文典》丛书，收集了当代德艺双馨的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美术家及学者近三百人的诗歌、散文、纪实、评论等作品。其规模之大、起点之高、工艺之精、印刷之美，为近年来所少见。

人说当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德朝几十年来乐此而不疲。我也做了几十年的编辑，对德朝为何要做这些事能够理而解之。人活在世上，四大关系是必须面对的：人和天，即人和自然界的的关系；人和人，即和社会的关系；人和己，即人和自己身心的关系；人和神，即人和超验的关系。处理人和人，即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尊人”“美人”“利人”，在“尊人”“美人”“利人”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和人生快慰。所以，德朝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对自己都是一种功德，一种令人感叹、赞赏的功德。

邢德朝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出生于 1962 年的他身兼陕西新海潮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陕西金石书画院院长，长安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教授，穆柯寨书院院长，《穆柯寨》《艺坛》《陕西金石书画交流》主编等多种职务。几十年来，由他策划、组织、实施的论坛、研讨会、座谈会、朗诵会、音乐会、书画展，以及参观、考察、交流、采风、文艺演出等等文化活动，总共有多少次，怕连德朝自己都是一个说不清的数字，光我参与过的，就有十多次。

作为行中人，我个人对文化活动的基本感觉是：不可太少，不可太多。太少则缺乏交流和激励，太多则使有限的时间碎片化，影响人生大项目的完成。而且，我深知筹备、举办活动的不易，需要人脉，需要资金，需要谋划，需要交涉，需

要智慧，需要投入，甚至要见不想见的人，要说不想说的话。但德朝却将这样的事做得如鱼得水、如虎生风、如龙乘云，风生水起、风起云涌、风云际会，成果多多、效应佳佳、影响广远，实在值得点一串大赞。

我这几十年，主要精力都投到了龙凤文化研究上，但也有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面世。作为乡党和文友，德朝对我的诗文很是看重。他不但在其主编的刊物、报纸上将我的诗歌和散文，连页、整版地配照片刊出，还在多种场合讲，“刊发庞进诗文的报纸发出半月时间内，各地多有来电话谈论庞进诗文的朋友，有人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打得手机发烫”；“庞进用深情和峻思结构成精神的宝塔，其诗歌创作感怀深、意境远、有激情、耐回味……展现出西部风的大气、大度……”“人们过去只知道散文作家庞进、龙凤文化研究专家庞进，现在，人们更应该知道诗人庞进……”等等。

2016年入冬的一天，德朝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他建议开一次我的文学作品研讨会。于是，有了于2017年到来之前，在西安文理学院召开的“庞进文学作品研讨会”。会上，各位专家、文友对我的诗文创作，以及龙凤文化研究，做了充分的肯定、褒赞和鼓励，使我的花甲之年有了一个特别丰厚的纪念。写到这里，我要由衷地说一句：感谢德朝，我的好兄弟！

（2018年5月28日于西安龙凤堂）



邢德朝主编的《金石文典》

# 情之美抒与思之妙达

## ——序黄伟兴《怦然心动》

伟兴将他的散文和小说集成一集，取名《怦然心动》，发给我，嘱我作序。这些作品，我以前大多看过，这次又细细地读了一遍。他的小说，我以为是很不错的，如果将中国的小说创作以万葱千茏的植物园为喻的话，伟兴的小说正像生长在家乡土地上的石榴。是的，是一株石榴，虽不高大，也不粗壮，却有心血染红的花朵，和一枚枚颗粒晶莹、富有营养的果实。——集中已有李炳银先生的精到评介，我这里就不饶舌了，只说说他的散文吧。

在我看来，好的散文至少有两条标准：“情之美抒”和“思之妙达”。说散文是抒发感情的，没错；说散文是表达思想的，也没错。但是，如果其感情之抒发，没有做到推心置腹般真切、水到渠成般自然、恰到好处般适度，那感觉就不美了，就像你面前一个人，突然笑了，眉抖须颤腮邦子抽；突然又哭了，涕泗滂沱双肩耸动，让你惊诧莫名，差不多要一跑了之了。同样，如果其思想之表达，或根本没有入木三分般深刻，和超凡脱俗般颖悟——这样的文章缺乏穿透力和震撼力，可谓之“庸文”，不读也罢；或不能将入木三分的深刻和超凡脱俗的颖悟寓于鲜活、灵动、独到的文字之中，那感觉就不妙了，就不如直接去读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史哲著述了。

伟兴的散文是够标准的。他写母亲对儿子的爱：“我”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下地归来的母亲，“看见发蔫儿的我之后总会把她温热的嘴唇贴在我的额颅上”，然后，“一句话不说，背上我匆匆赶往几里路外的大队医疗站”。如果遇到半夜医疗站没有医生的情况，母亲就“把我抱在怀里，摇着，祈求着我的高烧赶快退去。”写自己因高烧产生了幻觉，“笑着把指头指向映照着煤油灯影的墙上说，妈，跳舞哩，穿红衣服的小人人跳舞哩。我的带笑的胡话让母亲极度恐惧，唯心的母亲以为小鬼来缠我了，于是急忙下炕，急忙从灶火抱来一捆麦秸，在脚地燃起熊熊

的火苗替我驱鬼……”他写自己曾是一个挑食的孩子，“我的挑食曾让母亲把盘子把碗在案板上弄出了很大的声响，也曾让母亲指着我的鼻子骂：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娃，小着你有妈哩，看长大了，娶个媳妇还会不会像妈这样伺候你？但骂归骂，骂过之后，母亲依然会想法子让我吃饱的。当我开始把母亲为我单做的‘小灶’香香地往嘴里刨时，母亲坐在我旁边开心地笑了，笑着说：都是小时候闹的，那时，没啥好吃的，硬是把肚子饿小了……”（《母亲的名字叫修针》）他写父亲的辛劳和耿直，“童年的父亲右手扶犁，左手高扬着牛鞭。在关中东部广袤的原野上，父亲的汗珠和泪珠一道在新翻的土地上滋滋作响”。写自己与哥哥及在省城工作的叔父，曾为给父亲落实政策而努力奔走，但终未成功，因为当有些事情需要父亲亲自去走时，“父亲却怎么都忍受不了热脸蹭人家冷屁股的尴尬，而个别还在位上的‘左先生’们的冷言冷语，更是让父亲的心灵遭受了炼狱般的折磨。最后一次，当父亲把我们给买的東西没有送出，事情当然也没有办成时，我们说：不行，不送是不行的。父亲躁了，说：我宁愿不平反，我也不去用热脸蹭人家的冷屁股了！”（《纪念父亲》）写一家人对一只猫的感情：刚上高速公路，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告知“点点因难产而死”的电话，“妻子呜咽的声音让我看见了一张珠泪滚滚的脸”；他写是自己给点点找了一位猫先生，让其再次怀孕。“或许，是我实在忍受不了点点不分黑白昼夜的声声嚎叫，实在忍受不了点点以那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呼唤爱情；也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点点就是猫中的朱丽叶、祝英台吧？是的，作为一只被宠着的猫，点点是漂漂亮亮的，是干干净净的，是肥肥胖胖的，是养尊处优的，可对点点来说，养尊处优又能怎么样呢？没有了爱情的养尊处优，生活该是多么的寡淡无味啊……”（《永不养猫》）这些例段，足以说明，伟兴的“抒情”，是真切、自然、生动、感人的。

与“情之美抒”相比，“思之妙达”更有难度，对作者的素养，或者说学养要求更高。这是因为，“情”，甚或“真情”，是人人都会有的，问题只在于会抒不会抒，抒得美不美；而“思”，尤其是“深思”“精思”“新思”，就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了。这也就是说，得先有“思”，然后才能谈得上“妙达”。伟兴显然是一位有“思”者。我如果说，走到读者面前的，是一位总在思考的黄伟兴，相信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我如果说，走到读者面前的，是一位善于把自己的思考艺术地表达出来的黄伟兴，相信大家也会认同。且看：“上学时，学校的墙上写着，

按时到校，但能够让老师表扬的学生，却常常就是那早到的学生；恋爱时约会，掌握主动的一方（往往是女性），也会有意无意地迟到那么半个小时，让小伙子在约会的地点傻等，以此考验对方的真诚；参加工作后，如有会议，必是大家端端正正地坐在下边，静候着姗姗来迟的领导，甚至，在领导登台时，再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正是因为这种“对提前到和提前量的过分鼓励”“才使得我们的时间观念有了较多的弹性，而少了必要的刚性。”（《时间观念》）。再看：“背不知在何时有点弯了，妻就说我不够挺拔，女儿说我像个老汉，就连单位里的领导、同志，也笑我的形象阻碍了我的仕途。我却笑了，给妻子和女儿说，牛的背也是弯着的，而且弯得比我厉害，但牛却比我有用得多，活着，耕田挤奶，死了，那肉也比猪肉卖得好；给领导和同志说，没有形象了好，没有仕途了更好，省得人骂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人际拾零》）在自嘲式的幽默中奇峰突起，若没有对社会现状的深入洞察而不能得。到乡下一位朋友家做客，听到村巷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呼唤九十多岁的母亲回家吃饭，便放下酒杯，来到村巷，亲眼观察了“一个老人搀扶着另一个老人从东边走来”，看到“阳光照在两个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漾在老人脸上的那笑，那如菊花绽放一样的锦绣的笑”，于是，写到：“朋友，你想过没有呢？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娘还健在，这可是多大的福分啊。站在自家的门前，走在窄迫的村巷，放大了声音呼唤娘亲，让一种并不动听的声音在整个小村的上空回荡，那放大的了，何止是声音啊，那久久地在小村上空回荡的，又怎么不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呢？”（《呼唤》）一个偶然进入视野的情景，引发了一段对幸福的思考，而对这段思考的表述，又是“水到渠成般自然、恰到好处般适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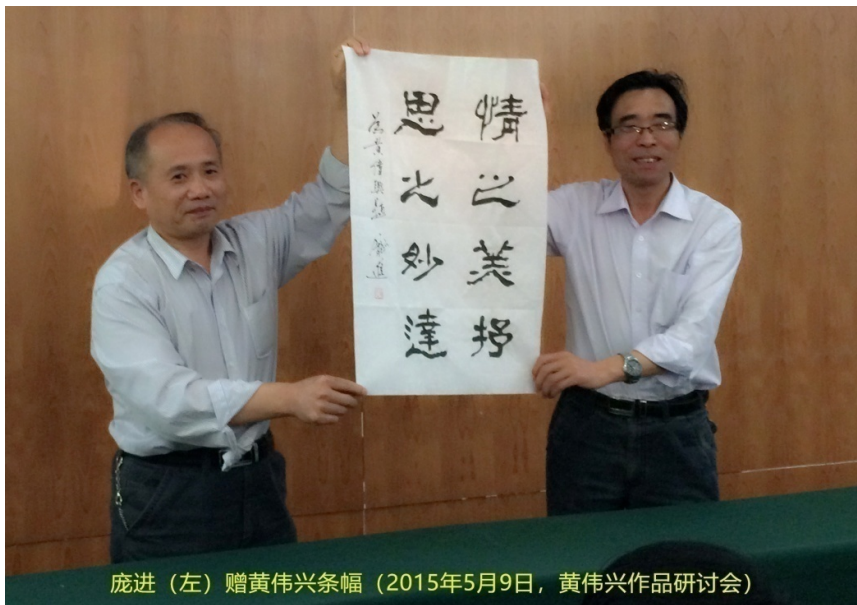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初，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被分配到临潼文化局写作组工作；不久，伟兴从师范院校毕业，到临潼城区一所学校当老师，业余时间喜欢写作。相同的爱好使我们相识。后来我调入西安日报社编副刊，伟兴便每有新作就寄给我。从编辑的角度看，伟兴的文章是让人喜欢的，你不必做大的修改，甚至只字不动就可以编发。好像在讲台上没有站多长时间，伟兴就成了一名在教育管理部门上班的公务员。工作琐碎繁忙，但他对文学的热情不减，业余时间大都扑在了上面，散文、随笔、诗歌，短篇、中篇、长篇……我曾想，如果给伟兴换一个环境，比如到作协当一名专业作家，或到省城，甚至京城的一个报社杂志社工作，

伟兴出的成果可能会更多，影响面也会更大。因为他是具备成大气候的资质的，缺的只是环境和机遇。

2002年年初，为了写作一本名为《大悟骊山》的书，我回临潼采访。伟兴搞了一辆小面包车，由他的一位熟人驾驶着，陪着我东至铁炉乡，西至坑儒谷，北到古栎阳。2007年年底，我到临潼参加张东江先生的诗歌研讨会，会毕，我提出想去看望一下写作《高巷史话》《栎阳史话》，却已病危的文化乡贤田焕新先生，伟兴和剧作家周满强欣然做陪。这一次是伟兴自己开车了。我们来到田先生的家中，在其病榻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就如何让田先生的成果引起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进行策划，之后经过几多努力，我们策划的一部分终于在田先生去世前得以实现……还有几次，我因事回临潼，伟兴约来满强等文友，或茶社，或宾馆，或饭铺，大家开怀一叙，世界万象，民间疮痍，个人遭际，笔下波澜，常常是谪到半夜三更还意犹未尽。人生总有让你每每回味起来，都感到温馨、感到美好的场面，坦诚的、没有或少有顾忌的交谈便是这样的场面。

看好伟兴，祝福伟兴，期待伟兴！

（2008年6月29日于西安慧雨庐；《怦然心动》，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庞进（左）赠黄伟兴条幅（2015年5月9日，黄伟兴作品研讨会）



# 赤子情怀

婴儿从母亲腹中降生的时候，全身的肤色是通红通红的，因而被称作赤子。赤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吃的第一口食物是母亲的奶水，因而赤子和母亲的感情是天然的，你在世上或许能找到不爱赤子的母亲，但你找不到不爱母亲的赤子。从婴儿到幼儿到少年，你当然不能只吃母亲的奶水，你还要喝水，还要吃米吃面吃菜，这水这米这面这菜，都来自你和家人赖以生那块被称作家乡的土地。于是，家乡就和母亲同一，对家乡的感情也就是赤子对母亲的感情。

这样的感情因与生俱来、伴你成长而深厚，悠久，冲不淡、打不散。它表现在家乡的山原、河流、街巷、场院常常会出现在你的梦中，家乡的每一缕色彩都牵引着你的目光，家乡的每一个声音都震动着你的耳膜，家乡的每一个变化和进步都兴奋着、鼓舞着你的神经。你总是希望家乡的山长绿、水长清，家乡的父老乡亲能够告别贫困远离灾难，过上富足平安的好日子；你也总希望尽你的可能，为家乡的富裕昌盛贡献你的智慧和才情。

吴建华就是这样的赤子。陕南安康的旬阳县是他的家乡，他的骨头和秦岭巴山长在一起，他的血脉和汉江旬河流在一起。八年前，从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不久的吴建华，就写出了一部《太极岛始光》，将奋斗在旬阳山水间的才杰名流的业绩风采跃然纸上；之后，他主编了一份图文并茂的大型综合性季刊《灵岩》，期期都有推介、颂扬旬阳的内容；最近，伴着新世纪钟声，他又推出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西部崛起大趋势——来自旬阳县的报告》。这不是一般性的报告文学，而是以整个西部的开发为背景，以全国、全球的经济发展为参照，全方位、高视点、多角度描写旬阳人艰苦创业的煌煌传记。为了写这部大传，建华一年多来没有节假日，别的不说，光收集、整理过的资料就有一百多斤。

旬阳在古时曾是楚的领地。楚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屈原。屈原是才华绝代的大诗人，也是一个热爱家乡的赤子。他眷恋着家乡的山水草木，念念不忘家乡的盛衰安危，“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何日夜而忘之”，“虽九死其犹未悔”！

在这一点上，吴建华同屈老先生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屈先生对家乡的热爱非但没有得到重视和赞赏，反受到把持朝政者残酷无情的迫害和打击。最后不得不怀石沉江，以死明志。建华就不一样了，书记县长们支持又关怀，乡亲们关怀又爱戴，在旬阳人民的心目中，吴建华是不可多得的才子，是熊猫一样的宝贝。——这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作家的幸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踏上旬阳的土地。建华和他的文友们带我看文庙、登灵岩寺，给我讲割生漆、叉老鳖、打草绳，以及葫芦城风水的故事，还用旬阳出的烟熏我，用旬阳产的酒醉我。这次我又来到了旬阳，相会了这么多为一方富裕努力奋斗的朋友，很高兴，尽管我不会喝酒，也愿为吴建华一醉，为在座诸位的赤子情怀一醉！

（刊于《旬阳报》2001年6月11日、《灵岩》2001年第2期、《安康日报》2001年7月18日、《西安日报》2001年7月26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旬阳县太极城俯瞰（贺晓 摄）

# 吴建华与太极城：一放眼一辈子

## ——在《中华太极城传》研讨会上的发言

### 1. 《中华太极城传》堪称旬阳县的“资治通鉴”

读《中华太极城传》，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宋代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当然，体例有所不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中华太极城传》是汇萃体，但从“资治”，即提供治世、施政参考的角度看，两者有相通可比之处。《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华太极城传》是“荟萃人文，有资于治县”。

《中华太极城传》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理论基点高”——太极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高超文化、玄妙文化，《中华太极城传》以“太极文化”贯通全书，这个理论基点就很高了。

二是“人文资料全”——全书围绕着太极城，兼取、统摄天、地、人、儒、道、释、古、今、外、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资料，一书在手，旬阳文化，文化旬阳，一目了然。

三是“方案可操作”——该书不光有关于太极城的理论探索，还有建设太极城的实施方案。这些方案是从旬阳的实际出发的，是接地气的，其中有些已经化为现实。

由以上分析，可以有一个评价：《中华太极城传》堪称旬阳县的“资治通鉴”。

### 2. 吴建华是一位文史哲兼修且成就喜人的通才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赤子情怀》的文章，文中说吴建华是一位热爱家乡的赤子，他的骨头和秦巴山长在一起，他的血脉和汉江旬河流在一起，他眷恋着家乡

的山水草木，念念不忘家乡的盛衰安危，为了家乡的文明富强，他奋斗得竭诚而执着。几十年来，建华为家乡捧出了一系列著作，也干成了好多桩事业，这些著作和事业，使建华的赤子形象突出而鲜明。

建华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当一名作家，于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剧本无所不写，而且多有让人叫好的篇章。他感情真挚朴实、文笔灵动优美，可以说既有天分又很勤奋，于是，在我的心目中，也相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建华都是一个好作家的形象。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建华不仅是一位好作家了，他还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学者，一名研究太极文化且成就喜人的专家。作家以形象思维为擅长。学者、专家则以抽象思维为擅长。两者如果结合得好，其著作文章，就既高屋建瓴、深刻独步，又文采飞扬，让读者喜闻乐见。于是，国学、哲学、宗教、民俗、环境、建筑，各种学科都跑到建华的书房和脑子里去了。

这样，如今的吴建华，就成了一名文史哲兼修的合作家与专家于一体的通才。

### 3. 道、太极、龙是“一本二象三说”的大智慧

太是大的意思，极是极点的意思，太极可理解为最大、最终极、最根本的东西。对最终极、最根本的东西，西方基督教信仰者称其为上帝，中国人称其为太极、道。上帝往往被人格化，并被赋予全知、全能、全善的定位。人格化的上帝常常被追问其来源，即上帝从何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定位则要对世间的灾难负责。太极、道则是对本来的、自有的万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的概括和命名，不具有人格，也不会为世间的灾难负责。相比之下，还是中国人的理解更到位、更深刻，表述得也更科学、更智慧。

《易经》言：“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德经》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两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之语有相似之处。前句中的“两仪”和后句中的“二”，一般都解释为阴阳。在人们的认知中，阴代表暗淡、消极、退守、柔弱、雌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物象，阳代表光明、积极、进取、刚强、雄健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物象。其

实，阴阳还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些，凡是形成并存、对应、互动的力量或趋势，都可以称为阴阳。

太极图表现的就是阴阳的关系。在《中华太极城传》中，吴建华认同明赐东的观点，将太极图的起源，追溯至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其实，中华先民对阴阳的认识和反映还要更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吉县柿子滩发现了两幅古岩画，其中一幅由鹿头鱼尾等元素组合而成。鹿在陆地上跑，可代表阳；鱼在水中游，可代表阴。鹿头鱼尾组合也就是阴阳的组合。此岩画断代在公元前 8000 年左右，即距今约一万年。也就是说，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就有了阴阳的观念且以图案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由于山西吉县柿子滩鹿头鱼尾岩画符合龙的“多元容合”创造规律，故我将其称为“萌龙”，即初始的出于萌芽状态的龙。

太极图和龙表现的都是阴阳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太极图可谓有形象但相对抽象的龙，龙可谓更具象、更活跃、更生动的太极，两者的本质，或者说所体现的核心内涵，是作为万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的“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道、太极、龙是“一本二象三说”的大智慧。

最后，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建华是 1988 年，在一次登高望远中发现家乡县城像太极图，于是将“金线吊葫芦”的“葫芦城”升华为“太极城”，从而引发、建构起一个文化体系的；而我也是在 1988 年，由西北大学韩养民教授的一句话，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的。那是在一个婚宴上，当时主编《中国风俗丛书》的韩先生说：“庞进，你能不能给咱写一本《龙的习俗》，作为丛书的一种？”1988 年是农历的戊辰龙年。之后，我多次说我做龙文化研究是“一句话一辈子”。相比照，建华的情形，就可以说是“一放眼一辈子”。因此，我这次发言的题目，就叫“吴建华与太极城：一放眼一辈子”。

（2014 年 8 月 17 日）

# 象美意邃 养眼润心

## ——范超散文品读

“五一”黄金周，许多人都携家带口、天上飞地上跑地游山玩水去了。我不愿领受那买票之难、等车之烦和旅途之劳顿，就静悄悄地呆在家里。时间相对宽松，正好读一读，想一想，将要写的几篇文章写出来。青年作家范超的书稿发过来已有些日子了，忙三岔四地一直未捞得着看，现在就可以从容地打开来欣赏了。这是一部散文集，共一百一十二篇。我花了三天多时间，从首篇《爱戴眼镜》读起，一篇一篇，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直到末篇《坐车》的最后一个字。读完后我揉揉眼睛，回味再三，感觉这几天时间，何尝不是一次美好的旅游呢？是的，是一次象美意邃、养眼润心、收获多多的“旅游”！而刚过而立之年，戴着一副明亮眼镜的、儒儒雅雅的三秦才子范超，正好做了高级“导游”。

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这些地方因范超的出色描绘而凸显魅力。远些的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瀚海栏杆百丈冰”“孤蓬万里黄沙路”的宁夏高原，如“听见了翻云覆雨的历史那沧桑的吟唱声：龙舟凤辇无觅处，碧水依然日夜流”的洛阳龙门；稍远的如“黄河水黄红如肉，是一扇一扇向前滚动的肉，被抛向一个巨釜里，回锅后抛出，再向前涌动”的壶口，如“会让人联想起那些个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火热的青春以及战天斗地的岁月”的延安；近些的如“花开花谢，云树郁苍苍；潮起潮落，池水旧地方”的华清池，如“四面学子莘莘，赶考应试博功名；八方人杰济济，摩拳擦掌展雄才”的大雁塔，如“徜徉画卷间，心与上代齐跳跃，俯首皆叹中华精湛技艺；沉湎宫殿中，气与古人同呼吸，扬眉尽颂民族壮丽瑰宝”的碑林，如“三秦恢弘青史照，千载风云眼底收”陕西历史博物馆……

当然，要说印象最深的地方，还要数“导游”范超的故乡——咸阳市礼泉县的一个普通的村庄。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生来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需要把自己团结在一起”的《平头麦子》，看到了“抖动着腰身，俨然一群舞者”

“发型也很迷人，一绺绺的辫子朝天冲着，碎花点点，风姿绰约，你走遍所有的美容美发厅都没有见过”的《窈窕玉米》，看到了“洁白成雪的形象”的《素面棉花》，看到了土生土长的，“现在怀着未来的身孕，压着过去的负担，等候着被你和你的城市吃掉”的《考验红薯》；也看到了“意味深长的牛哞声是品不尽的陈年酒，太阳如一捧纯甜可口的红草莓，炊烟永远伸不直腰身”的《老家》，看到了“面瓮还在，面不在了，揭开来是一股陈年的气息；锅台还在，锅不在了，膛里还有未燃尽的柴草”的渐行渐远的《被遗弃在乡间的房子》。还有那“我们走别了曾经，我们却从此再也走不回从前了”的《乡村小学小事》，那“已多少有些生锈了，被煤灰和土头土脸的所谓草们覆盖着”的《乡村火车站》，那“像一帘幽梦，环绕着乡村时，使乡村显得无限温柔”的《水渠里的流年》……

我们见到了许多名人和非名人。在范超的导引下，我们向“不让妻子近身，也不回家吃饭，只允母亲摇铃送食，终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造字英雄苍颉表达了敬意，对“生前寂寞，死后凋零”“事业有成却不走运”的汉将军李广流露了同情，给“家园的桑树在苦苦等他回来，他终于没能回来，桑椹便哭红了眼睛”的三国蜀相诸葛亮献了盘鲜果，为“在通往家乡的路上，她被整个唐朝挂在了梨树上”的贵妃杨玉环上了炷清香……我们谒见了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走自己的路，而付出双目失明、腿部骨折的代价依然不悔的吴宓先生，触摸到了他那颗藏在屋檐下的“伤痕累累的心”；我们也拜访了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名世的路遥先生，听到了他那“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的喃喃自语，了解到“那种撕魂裂魄的境界”，何以“孤独得很，无法倾诉，更无法伪造，只有自己默默地吞咽、凝聚、爆发，而一旦爆发的时候，就会尽现其辉煌”……

当然，性格鲜明、事迹感人，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范超的那几位亲人。那“像一个侠”，身怀“钉锅”和“打花”的绝技，“用双腿走了半个中国”，为解放军“探敌营”遭匪军追捕，将日本产的自行车“弄回了村”，让村人首开眼界，在那些荒凉的年份，将两个儿子相继送进大学的“我爷爷”；那在拉长工期间投奔红军，当号手时急中生智往号孔里撒尿以解冰冻，革命胜利后有官不做重操农具，“文革”挨斗时挺着腰板高喊“毛主席万岁”，妻子死于难产后，独自把儿子拉扯成人，后又将其送到前线，儿子牺牲后还“感谢领导的栽培，感谢党”的“七

爷”；那将下乡知青留下的眼镜架上鼻梁，“硬是把自己戴成了近视”，出嫁后男人摔碎眼镜，又“借钱按原样配了一副”，男人因车祸瘫在炕上后，靠勤劳和卖血维持生计、供给儿女读书，却被儿子说成“我们村卖馍的”的“难场了一世”的“芳姑”……我们多处见到范超的母亲，这位母亲使我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天下许许多多的慈善、勤劳、辛苦的母亲。你看，她少女时代“就壮胆举起针管，开始尝试为母亲打青链霉素”，于是被做教书先生的外爷送到医院学习，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她有求必应，半夜有人叫打针也去，却从来不收一分钱”；“在繁忙的农耕之余，用她的体温表、听诊器、针管等不厌其烦的为乡亲们看一些伤风感冒、皮外伤等普通病”；她“勤快异常”“把庄稼务得比谁都好”“每早大家还在熟睡，她已去地里了”；她手脚利索厨艺精湛，“家族里遇事，常被抽去帮厨”；她纺线织布，缝补浆洗，“总是会一丝不苟地让我们的日子充满温暖”。“青烟蓬蓬，暮色四合，村庄被像饺子馅般慢慢包起来，我仿佛看见当年的母亲，正从灶房里出来，用围裙拍拍身上的柴屑，走到门口喊我：超娃子，回来吃饭啦！”如此场景情境，既属范超所经历，也为我们大家所经历，每每回味，都会让我们感念不已！

范超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嗜读如痴，善思巧悟，笔耕不懈，求索不已，这便使他具备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所需要具备的一切。其观察之细致，写人状物之传神，再再可见。如写乡间的“麦客”，“带着深窝短沿的草帽，穿着黄、黑、灰色粗上衣补丁裤，光脚蹬着沾满泥土的布鞋，迈着惊人般相似的步伐，在我前面急匆匆地走着，如一群朝圣者，带着对麦子的宗教般的虔诚。偶有交警喝斥或汽车驶来，他们便如笨拙的企鹅显得慌乱无主。累了，他们就势选块空地置放好化纤袋子，像倦飞的麻雀，横七竖八地坐下抑或躺倒。有的擦拭着藏刃镰刀，有的解开背囊咬着干锅盔，喝生凉水、抽劣质烟，惶然而热切的目光打量着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如写城里的“小姐”，“她们放荡形骸不堪憔悴，她们在黄昏时出现；她们当然都眼大肚皮小，肚皮小源于口小，那轻捏竹筷的是不是兰花指；那将面条儿挑起老高的姿态是不是小小的动词；那放入口中的是不是个含混的谜语，都已无关古朴典雅了，她们吃完后就消隐了，她们往往很晚才回来，她们有点像房东老太太，不说话则已，一张口就问：你的钱还没给呢！”

巧妙的比喻和拟人手法的多用，使范超的文字呈现出多智多彩、活灵活现的



特色。如写“学校里有美丽的园子，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送来一些散碎‘金子’，我藏在里面写诗。我并没有诗出个什么，篮球场上蹦跳的人在我眼中滚成一锅突突冒泡的水，风看我听得费劲，会冒失地拽过来一把灌入耳中”。如写“胖胖的雪赖在地上，厚厚的不肯走”，写“牛马吃草，粪里有草籽花籽，风吹过春野时，牛粪会扑踏扑踏冒出一朵花来，像谁家的小媳妇儿高傲至极”。范超在报社工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又是在读研究生，涉取之广、汲记之多，自然会流露于字里行间。如写小时饭菜之简单，“就那么几种地里产的东西，可是养人，像土豆，营养价值就极高”时，就不忘加上“自18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一代代的精英都是吃土豆长大的，甚至在整个欧洲文明史上土豆都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一句。幽默的运用对范超而言，已娴熟到顺手拈来皆贴然的地步；而其幽默，也因其知识性、思辨性、调侃性而具“范氏”特色。如写求学时捉虱，“……至某夜又被咬醒，陡然起身，摁亮手电，见一大肚透红家伙缩头狂奔，截住退路，将满腔义愤平生力气聚于大拇指，闭眼切齿间，只听‘轰’的一声，惊醒舍友慌问何事。我还未擦干溅到脸上的血痕，却见那已成空皮囊的家伙晃晃悠悠从血污中爬起来，朝我冷笑道：‘你以为挤死了我吧，你其实只是挤掉了你的血。’全室同仁们闻之，愕然良久，这尤物站在历史的暗角，竟给我们上了最深刻的一课。”如写洗澡，“下池时，人慢慢将身体续入水中，恰似一片茶叶舒展于热水，茅塞开合熨贴得恰到好处，泡酥后上来一搓一卷，任水冲去——联想起中山先生‘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训喻，确有一种摧枯拉朽般的痛快；淋浴时，站在喷头下，状态一丝不苟，搓澡巾如吕布的方天画戟上下翻飞，嘴里默诵着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搓得差不多了，隔着山鸣谷应的声音去看周围，既像欣赏柯利姆特关于人生的那些油画，童年、青年、老年的就那么一瞬闪过去了，遂倍觉人生疏忽，像现在伸手随便就可以弹掉的一粒水珠。”这些话语，让你能读到如林语堂老先生论“上乘的幽默”时说的那种“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

我曾言，无论文学还是艺术，说复杂就复杂，砖头厚的书拉一火车也难以尽述；说简单也简单，用两个字就能说清楚：“意象”。“意”是你要表达的思想、精神、情感、境界，等等；“象”是你所选择的语句、结构、色彩、旋律，等等。有“意”无“象”，谈不上文学也谈不上艺术；有“象”无“意”或少“意”，作

品就缺乏感染力、震撼力和穿透力。古今中外的所谓佳作，都是些既有深刻的“意”，又有美妙的“象”，且将“意”和“象”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东西。以此论观之，范超的散文堪称象也美来意也邃，不存在“意”大于“象”，或“象”大于“意”，以及“意”“象”不粘连、两张皮的问题。上面对范超散文的评述，尽管谈不上全面，却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何况在他的作品中，你也能时不时地读到诸如“生命中若失去了本质，我们就很难做一个厚道的人”“那种可以制作、包装出来的隆重和美好，都是给别人看的，其中必然掺杂着虚假”之类的颇耐人寻味的句子。当然，“意象”的锻造是没有止境的，新奇美妙的“象”，和深刻隽永的“意”，对作家艺术家而言，既是终生的追求，也是毕生的功课。以此看来，尚有很大的空间摆在年龄尚轻的范超的前面，相信他能够填之以创造的辉煌——范超具备着不让大家期望落空的智慧、勤奋和实力！

（2006年5月5日于西安慧雨庐；收入《范超散文》，新华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 诗文的档次

## ——在陈嘉瑞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诗文是有档次的。人们常用“上档次”或“不上档次”来评价入眼的诗歌散文。嘉瑞的作品是上档次的。因何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在我看来，高档次的诗文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文字通畅精当。“通畅”是对写作者起码的要求。如果多有错字病句，看得人别别扭扭，那这个作者，就还在诗文的大门之外。“精当”是对作者进一步的要求，名词、动词、形容词、标点符号，主、谓、宾、补、定、状，叙述、描写、引用、议论，等等，都精确、精准、适当。通畅精当做到了，就可以说诗文中档次了。

二，情感真切美抒。诗文是要抒情的，所抒之情要求真切，如果抒的是虚情假情，那就类同于市场上的假烟假酒假药了。“美抒”是说即使是真切之情，也要抒发得美。美有柔美、幽美、凄美、壮美等等，因时空人事而异。这一条把握到位了，诗文就更上档次、有品位了。

三，思想峻高妙达。诗文的境界、份量、穿透力、震撼力在于是否有思想，尤其是峻高独到的思想。一些诗歌散文，读后没什么感觉，原因就在于没有或少有思想蕴含，或所写到的，前人已写过了。写不到位是因为想不到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上绝顶，要经过“十八盘”，因而思想要峻高、要独到，是比较难的，是要花气力的。阅读要广博，了解要全面，精神库存要更新。许多写诗作文之人，终其一生都突破不了。举个例子，中国的许多作家、文化人，都受鲁迅、胡适等“五四”精英的影响，持西方价值观，现在叫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都是好东西，但普世价值持有者的偏颇，或者说“想得美”，在于想使这些价值普世，而这些价值根本普不了世，永远普不了世。因为，人是复杂的，永远存在着向善向恶两种趋向。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施

于恶人，无异于与给虎狼吃红烧肉、给魔鬼灌人参汤。当然，即使有峻高独到的思想，表达上还要讲艺术，努力做到生动、有趣、巧妙、绝妙，若直而白之，那就是论文而非诗文了。

嘉瑞的文章，文字通畅精当做到了，情感真切美抒也做到了，因而是上档次的，有品位的。至于思想峻高妙达，能看出嘉瑞已认识到了，也有一定的追求，但努力的空间还很大。期待嘉瑞在这个层面上能有所突破，写出让人拍案叫绝、眼睛一亮再亮的作品。

（2017年10月15日于西安）



庞进（左）与陈嘉瑞（2019年3月3日，西安）

# 把天堂带回家

## ——刘爱玲的故事

### 1. 铜钱大的雪片

那是三十五年前的腊月二十七，一个很冷很冷的日子，一大早，“铜钱大的雪片”（刘爱玲的父亲这么形容）便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王益区王益村山岭上那孔破旧的窑洞里，一个瘦小的女婴出世了，她甚至没有等到父亲去请的接生婆的到来。初临人间的刘爱玲脐带未断地躺在母亲身边，间隔一会儿哭一下，没有衣被，同母异父的姐姐便将一张麻纸盖在她的身上，并隔会儿揭开看看，看她是否还活着。

刘爱玲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第一次睁开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残疾的、严酷的世界。母亲的右手掌朝外翻，那是早年生病无钱医治落下的；随母亲来到她家的姐姐也是一条腿不方便……当然，更残酷的事情发生在她三岁半的时候，先是发烧，被当作感冒治，接着七八天昏迷不醒，没文化的母亲几乎是放弃了对女儿的治疗，而爱玲的父亲，就在这几天，被拉到几十里开外的地方参加什么学习班！当他得到消息赶回家时，一切都晚了。这位四十五岁才成家的汉子抱起下肢细软的女儿，痛哭失声：“娃呀，你这辈子都完了呀！”

这句话是值得品味的，它既表达了一个父亲因未能保护爱女健康成长的痛心疾首，也反映了一个正常人对残疾人的价值定位。这样的定位是残酷的，它在观念上已把残疾人从健康人世界里剥离了出去。持如此观念者当然不只刘爱玲父亲一个人，其社会背景是广泛、深厚而强大的。刘爱玲后来所做的一切，都可视作对这种观念的抵抗和反击。

接下来是四处奔走、多方求医，其坎坷的过程，不必详述了，但有两是需要提及的：父亲的尽力和小爱玲的坚韧。听说用山顶上的石头与什么草熬的水洗

可以治小儿麻痹，父亲就到山上去挖，一笼一笼地朝回背；听说还可用刚出锅的热酒糟蒸，就一板车一板车地朝家里拉；哪里有治此病的医生，就背着爱玲到哪里去。而爱玲呢，当数不清的银针一遍一遍地扎进身体里的时候，当手术刀一寸一寸地划过肌肤的时候，她总是咬紧牙关，咬得嘴唇流血……

## 2. 活下来才有梦

上学当然是美好的，得到这份美好，对于条件好的适龄儿童，不会有多大困难，而对刘爱玲，就意味着备尝艰辛了。刘爱玲永远感念住在一个村的张国荣老师，是张老师每天放学后到她家来教她，使六岁的她在炕沿上读完了自己的小学一年级。也是这位张老师，在第二年的秋天，把她背进了二年级的课堂。

课程对聪颖的刘爱玲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上那远在操场边的厕所，她常常为上不了厕所而流泪。除此之外，刘爱玲认为自己那段时间还算是快乐的。张老师母女每天放学之后，轮流背她回家，直到校园里的学雷锋小组为她做了一辆小推车。而那辆小车的后面，总有陌生的手臂伸过来。她积极参加班集体的各种活动，她门门功课全优，她渴望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大学，而且把学上到北京去！

美好的憧憬没有维持多久，一场灾难便降临了。1977年5月的一天，在粮油公司上班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投机倒把犯”，理由是他在家里偷偷地养猪、卖猪——那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给爱玲治病啊，制造灾难的人哪里顾及这些！抄家，游街，万人大会批斗，逮捕，入狱……三年后，冤案得到平反，却因在狱中患脑血栓而全身瘫痪，卧床长达十年，丧失了工作和养家的能力。

刘爱玲一家人的生计可想而知：六口人，四个残疾，要治病，要上学，要吃饭，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服刑期间中断，去世后又告终止。那段时间，去蔬菜公司捡拾菜根菜叶，去垃圾场捡拾大字报、草帘子、煤核等等，成了她和弟弟功课之外的功课，这些被人丢弃的东西，是他们桌上的菜肴、炉中的燃料。盖破败的棉絮，穿破烂的衣衫，冻疮年年光临伤残的病腿；电灯因交不起电费而停用，煤油灯也常常断顿，刘爱玲不得不利用锅灶前那一闪一闪的亮光来写她的作

业……

世间难得公平啊，有人福气大，春暖花开平常事；有人苦难多，冰川雪河度不完。对刘爱玲而言，苦难不仅像身之皮肉，不可剔除地贯穿了她整个的童年、少年，而且像一个不速之客，频频地光顾她的青年直到今天。怀孕期间，不但妊娠反应强烈，还得上甲亢，整夜整夜泪流不止；瘦小的儿子生下来后，严重营养不良，发高烧，出疹子，患疝气……丈夫外出打工，为了点血汗钱几乎是拼命；在家管孩子的她，常常是借了东家欠西家，吃了上顿愁下顿，那年雪天，家中断粮，仅靠几只冻成冰疙瘩的苹果维系生存……

2002年11月16日上午，我在陕西省和铜川市残疾人联合会几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住在山岭上的刘爱玲的家。这是租住村人的一间屋子，大概有十五六个平米吧，室内除了我们还会提到的那个小圆桌外，尚有木沙发、茶几、写字桌等几件还算像样的家具——都是铜川市残联搬新址后退下来的物什，他们全给刘爱玲送来了。

坐在冬日的还算灿烂的阳光下，看一眼已抬放在院子一边的那个破烂不堪的沙发，因甲亢依然戴着茶色镜的刘爱玲告诉我，她许许多多的日子，其实都在生存层面挣扎，卖菜、摆水果摊、卖米线、做临时工、到外省异乡寻找生机……进货守摊，上山下坡，长途跋涉，求人看脸，对一个肢残者而言，该付出多少辛苦？“只有活下来，才有梦啊！”刘爱玲说，“也想到过死，可我死了，儿子怎么办？亲人怎么办？还有，你死了，也不过死了个平平常常的弱者，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当陷入苦难的时候，我就想张海迪唱过的那首《生活是多么美好》，我告诫自己不能放弃，失望到尽头就是希望的开始。”我说，这就是坚强了，世上有许多人缺乏这种精神，他们被贫穷吞噬、被苦难打倒了。

### 3. 生命中的那抹绿

那天下午，在铜川市残联的协助下，我约了几位残障人士座谈，想听听他们心中的刘爱玲。几位都知道刘爱玲的事迹，有的已看过《把天堂带回家》——“看得两股眼泪”，他们说。除了对刘爱玲表示敬佩外，他们还特别敬佩刘爱玲的爱人何柯，其中一位颤巍巍地站起来，把手伸向在座的何柯，说：“你是世间最佳

大的人!”

这样的从残疾人口中说出的赞语，意义是非凡的。一个事实是，应邀的几位除刘爱玲之外，凡成了家的，配偶都是残疾人。刘爱玲在遇到何柯之前，家人给她找的对象是一个精神障碍者，并逼他订婚。刘爱玲并不嫌弃对方的痴傻，而是觉得这种“拉郎配”太无视残疾人追求美好爱情的权利了。于是，她以逃走来抗争。之后不久，穿着绿军装的可以说是一表人材的何柯就微笑着向她走来了。

关于他们的爱情，在一篇题为《生命中的那抹绿》的散文中，刘爱玲写道：

……那是一封陌生的来信，娟秀的字迹让人怀疑出自一位军营男孩之手。那年参天的古树盘根错节，虬髯的枝节上吊着陈年的皂角，映着来年的新绿，蝉鸣在它稠密的枝叶间叫出一派世外的热烈，于散漫的心绪中读那些纤秀的句子，就有了些许的干净与心跳，就有了那些红叶上的诗句，末了一点似有似无的签名。但在一个残疾人的世界里，一位英姿飒爽的军人与一身患重残的女孩，这该是一幅怎样强烈对比着的画卷！我终不能相信梦会成真，然而又是如此迫切地渴望着我的站立。许多次唇枪舌剑之后，我诘问：站起又能如何？他以一位军人的果敢回答：站为我妻！……

是的，颇有些传奇色彩，是共同喜爱的文学，充当着红娘的角色：她的作品在一家报刊发表，他偶然读到了，就给她写信。来来往往的鸿雁传书，没有爱的字眼，却有心的接近。忽然有一天，接近午夜的时候，风尘仆仆的何柯站到了刘家的门前。在打开门看见他的刹那间，她摔倒了，他赶忙放下行李去扶她，她却坚决地推开了他的手，自己站了起来。“我心里本来就没有觉得她是个残疾人，而在那一刻，这样的看法就更坚定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不善言辞的何柯这样说。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吧，刘爱玲就收到了何柯让她去云南部队驻地结婚的电报。

他们的结合在许多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何柯在部队是卫生员，在家中是长子，远在四川乡下的父母自然竭力反对，并以断绝亲情来威胁，就连他的连队领导，也劝他再三考虑。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何柯没有犹豫。婚后不久，何柯放弃了来年报考军校和退役后回老家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地随刘爱玲来到了铜



川。起初的日子可以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然而，他们终归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手拉着手，心暖着心地走过了生命旅程中的那段沼泽地。

曾看到这样一细节：采访结束后，刘爱玲从沙发上站起，何柯也随之站起，一转身，两个人的手就在刘爱玲的身后握在一起，那么自然，那么温馨，不用暗示，也没有言语。望着他们手握手、肩并肩地走向大门口的背影，我一下子感动不已……

#### 4. 把天堂带回家

我是在接受中国残联写一篇刘爱玲的报告文学的邀请后，从陕西省残联得到《把天堂带回家》这本书的。多年来的编辑生涯和阅读经验，使我的目光变得非常挑剔，我没有料到这本书能如此强烈地吸引住我。当我花了两天时间，一字一句地读完后，我禁不住连声赞叹：一本好书、一本好书啊！

是的，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家人看，推荐给朋友们看。我觉得，刘爱玲的这本书，不仅是写给残疾人的，也是写给我们大家的，写给全社会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读了这本书，都会得到一份深刻的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启迪。

这当然是一部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作品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直面苦难、自强不息的主人公“吴小雪”，坚韧、固执又通达的“父亲”，爱恨交错、反复无常的“母亲”，做事欠善、常以施虐为乐的“姐姐”，忠诚、内向、腼腆的“爱人”，以及粗放的“公公”、可怜的“弟弟”……这些人物形象，放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画廊中，也是不多见的、熠熠生辉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曾感叹作者的灵气和艺术功力。是的，刘爱玲的文学之路，是从小弟捡回的烟盒的里面、旧报纸的边角、用过的作业本的背面开始的。其后有过做医生、做文员、做电台主持人等等理想，也付出过艰辛的努力，但最终还是皈依了文学。“多少次想放弃，多少次都不能放弃。”刘爱玲说。我说：“文学有时候像毒品，吸上瘾了就戒不掉了。写作苦，不写更苦。同时呢，文学还如上帝手中的一根神奇的魔杖，能把有限的生命点化到无限的时空里去。”刘爱玲很有同感地点点头，说就是的。

1985年，有赖于朋友的资助，高中毕业的刘爱玲参加了一个文学函授班的学习；1986年，《作家生活报》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小路》；1988年，她的小说《荣誉》进入《鸭绿江文学函授学员优秀作品选》；1999年，她的诗作获《星星》诗刊“跨世纪诗歌慧眼奖”；这期间，《陕西工人报》《铜川日报》《当代青年》《文苑》《铜川文学》等报刊，也开始发表她的署名“雨雁”的作品；2001年7月，她参加了“陕西省第四届残疾人文艺汇演”，以一篇声情并茂的散文朗诵，荣获一等奖；在2002年铜川市春节晚会和之后的“两会”上，她的出色表演，使许多人热泪盈眶；她在电台自播自己的作品，在市里的“金果旅游招商周”上做宣传……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在家中那个小小的圆桌上，河水般卷起了澎湃的浪花……

谈到这些，刘爱玲深情地感谢她的丈夫、各级领导和方方面面的朋友们。丈夫何柯是恒久如一的支持者和第一位读者。他用打工挣来的钱为她买稿纸、买墨水、买营养品，给她的作品提中肯的意见，在她不出成绩的时候给她打气、鼓劲。铜川市政府和省市残联的领导关心支持她的生活和创作，多次上门慰问，赠送轮椅、书报杂志，过年前夕，将慰问金、米、面、油等等送到家中，市残联还免费为她进行微机打字培训，二十二万字的长篇脱稿后，加班加点地为其打印，并积极筹措资金，联系出版……

《把天堂带回家》出版后，文学评论界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新时期文学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以血泪的文字歌吟生命、以严酷的真实塑造人物、以挚热的情怀拥抱未来；它反映了残疾人的生活，提示了他们的心理世界，将生活的严峻、人性的复杂和生命力的顽强跃然纸上；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从中能读到中国历史的曲折进程，领略当时当地的民风民情。

刘爱玲成功了。一次次掌声为她响起，一束束鲜花向她走来，省市诸多媒体都报道了她的事迹，她光荣地成为铜川市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团市委、市文联和市残联六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向刘爱玲同志学习的决定》，她还被省残联推荐，成为出席第三次全国自强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的代表。

面对这一切，刘爱玲显得很沉静，她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我还应该努力地去，做出新的成绩，以回报社会。”

## 5. 又见雪花纷飞

2002年11月18日，是个星期一，也是我在铜川采访的最后一天。一早起来，窗外就扬扬洒洒地下起了雪花，枝头屋顶，一片洁白。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啊，人的精神为之一润。

上午9点，我和省市残联的同志一起，冒雪赶到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参加该馆欢迎刘爱玲的大会。在市残联的领导介绍过刘爱玲的事迹后，我说：“三十五年前的那个下雪天，刘爱玲来到了人世，一个顽强的生命开始了她的艰难奋斗的历程；巧的是，今天又是个下雪天，刘爱玲正式参加工作，来这里上班，这又是一个开始，相信刘爱玲能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新的开始……”馆长接过我的话头，说：“瑞雪纷纷，好兆头啊！”

下午，在铜川工作的老同学要我留下“墨宝”再走，于是便到一个书画家那里去写字。展纸提笔，在给市残联的同志写了“雪中送炭”之后，我给刘爱玲写了一幅“鸿朗高畅”——这四个字出自东汉文学家王充的《论衡》，“鸿”者，大雁也，相信刘爱玲这只从雨雪中飞出的大雁，会迎着阳光，鸣唱得更高远、更畅亮。

补记：2003年6月，刘爱玲当选陕西省自强模范；同年9月，当选全国自强模范。

（首刊于《西安晚报》2002年12月16日；再刊于2003年第3期《三月风》杂志；收入《自强之歌——自强模范助残先进优秀通讯报告文学选》，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版）

## 与延鸿飞一起《回家》

这些年来，能让我逐字逐句、通篇读完的书是不多的。其原因，一是自个的忙，时间像上帝手中的螺丝，总是个紧；二是书的吸引力不够，不好看。一般情况是，先读开头的一两页，若有庸琐、夹生、疙里疙瘩的感觉，后面的就顶多翻一翻，不再细读了。心里说，你的文字不够精到，反映出你做事不够认真，功力也不到位，那么，我还有必要花时间来读你吗？

二十八万字的《回家》，是我花了几天时间，一字一句读完的。合上书的最后一页，我便给延鸿飞打了电话，说你这本书写好了，也出好了，看得出来，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你都是用足心思、精打细磨了的。其思想和艺术，也都达到了你想达到的高度，而这样的高度，不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能达到的。鸿飞说他写这本书，对自己有三个要求，一是对得起这一把年龄，二是对得“作家”这个称号，三是对得起读者。我说你的认真，我从字里行间已领略了，认真做事的人，是让人心生敬意的，尤其在如今这样的年头。

全书辑录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最让我看好的，或者说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写亲情，尤其是写母亲的篇章。鸿飞的母亲是平凡的，却是伟大的。说其平凡，是说她像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杨树或者柳树，几乎是随处可见，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母亲中的一位。说其伟大，是说在年轻的丈夫因一场塌窑事故不幸去世后，她没有畏缩、没有逃遁、没有倒下，而是以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不算大，却也不算小的、突然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孝敬老人，抚养儿女，操持家务，下地出工……几十年的辛劳和苦楚，任你用怎样的语言都难以尽述。而其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撑天熬地、无我奉献的精神，是足以令天地恸、神灵泣的！

当质朴情深的一串串文字从眼前跳过的时候，我想到了三个人：我的外婆、母亲和我自己。外婆和鸿飞的母亲相似，也是年轻轻的就没有了丈夫，守着寡、含辛茹苦地将舅父和母亲拉扯大。所以，读到母亲在坟前哭诉——“晴天浑天老

蓝天，杀人的老天不睁眼”时，我觉得我的外婆肯定也这么悲苦、这么凄怆地哭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的母亲和鸿飞的母亲，年龄相仿，性格接近，待人处事，有许多相同之处：一样地刻苦自己，一样地关心他人。所以，在读到母亲忙碌于灶前，缝补于灯下，为儿女操心、奔波、高兴、流泪的文字时，我觉得鸿飞写的也是我的母亲。当看到回家后的鸿飞为母亲修门、修水龙头、修煤气灶，以及说笑话让母亲高兴的段落时，我又是多么地羡慕年龄稍长于我的鸿飞！——有一位健在的可以让儿女克尽孝道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已作古多年了——老人家是患脑溢血去世的，走得很急，使我们做儿女的，除锥心之痛久留心头之外，还永远地失去了孝敬的机会。母亲走后，我到处讲“当下孝”，即想到了就赶快去做，否则往往后悔莫及。说到这儿，鸿飞还是幸福的。

鸿飞不仅是一个“当下孝”的孝子，还是一位难得的好丈夫。《回家》中多篇写及他和爱妻的故事。不说他们生活中的相濡以沫、甘苦与共了，也不说他们事业上的相互支持、彼此激励了，只说面对爱妻因身体原因没有生育这件事，鸿飞的非一般的品质就显示了出来。这里，若用“理解”“宽容”“大度”“大气”等词汇来说事，似乎都还不到位。我觉得，一个男人的优秀，不一定在于他干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在于他能够坦然、豁然地担当起一份不请自来的、异乎寻常的责任。

这本书的名字，是再朴素不过的。仔细想想，一个人一生，和你最亲近的人，也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往往是在一个“家”中。回家的实质，是提醒对亲情的珍重。尽管亲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没有或丧失亲情的人生绝对是畸型的、可悲的。对中华文明而言，亲情具有“原型”的意义，是有别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根本”。

（刊于《西部艺术》2005年第12期、《大江晚报》2006年5月23日、《今传媒》2006年第6期；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回家》，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版）

# 作家的情怀

## ——序姜华《太极城笔记》

2007年6月，二十多位京陕作家聚会陕南旬阳太极城。任职于旬阳县文化局的姜华先生一见我，就说有重要的事要对我讲，原来是请我为他的即将付梓的作品集“写个序”。我想说我不擅长为人写序，已经婉拒过好几个人了，但见他那是那样的郑重和诚恳，就没有说出口。随后，姜华将他的文稿发到了我的邮箱里。

要给人写序，起码的功课是把要序的作品通读一遍，这样的工作我是到了国外探亲时，才抽出时间完成的。

姜华的这些作品，按其主要描述对象，可做写人、写事、写景之分。

写人的相对多些，又可分为写他人、写家人、写自己。

写他人者比较成功，一些人物让人读后不能忘怀。如走出山窝，走向城市，发财致富又回报家乡的二龙；冲破世俗，矢志追求爱情自由的翠翠；为救人而被屋梁塌成残疾的大林；一心要为群众办点实事的挂职干部张清，等等。当然，最感人的还要数写乡邮员张欣的《永远的怀念》。——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进入中小学生的课本，只是题目还可以改得更好些。

写家人者不算多，主要写了多难而坚强的父亲，和贤惠却是“左撇子”的媳妇。前者写得沉重，使人联想到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和许许多多具有山一样脊梁、水一样柔肠的中国父亲。后者写得恢谐，使人可以想象，作者在家庭中一定是一位责任感强又有情趣的好丈夫。

写自己者有若干篇，反映了作者的经历、嗜好和一些性格特点。如少时爱看电影，从事写作后喜欢逛书摊、读报纸，后来又痴迷上观看足球比赛，等等。尤其是《皮鞋的故事》，让人看到了作者的吃苦、果敢，和对新潮的向往和敏感。这几条实际上也是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具备的素质。另外，作者在行文中发出的一些感慨也很有意思，如谈自己舞文弄墨，“艰难十几载，使一些幼稚的文字变成

六十余家中央、省、地报刊的铅字，也浪得了一些文学会员、主席之类的虚名。多年来由于把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创作上，结果搞得灵不灵、呆不呆……”其实，灵和呆都是相对而言，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太呆了当然不好，但灵过头了，也未必是好事。最好的状况是该灵的时候灵，该呆的时候呆。

在写事的篇章中，作者既有歌颂也有批判。歌颂如《马达声声》，通过对一台打麦机谁先使用的描述，赞扬了竹山村村长立柱的“高风亮节”。批判如《愚昧的故事》，写了秦岭山中某村委会主任成为某邪教教徒，使亲生女儿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某对夫妇为传“香火”而“借种”而导致人命案、某农村小知识分子成为招摇撞骗的“半仙”等三件事，剖析了产生的根源，表达了对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亿万农民的“质量担忧”，和对农村、农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切呼唤。

在文集中，写景的文字占了不少篇幅。这景，有旬阳县境内的景，如太极城、南羊山、汉江；有旬阳县之外的景，如云南、北京、宁陕等省市县的景观。在这些篇幅中，作者文字朴素、优美且灵动，绘声绘色，亦情亦理，在状物摹态中，传达出对家乡山水赤子般的热爱——即使写外地景观，也时不时地要与旬阳的山水联系起来。当然，也少不了民俗风情的交融。

旬阳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二十年内，我曾三次到旬阳，总的感觉是：旬阳的景令人向往，旬阳的歌引人入胜，旬阳的酒让人怯阵，旬阳的人，尤其是作家们，差不多都兼有秦楚两地人的特点：既真诚厚朴又聪明灵秀——姜华就是这样的作家。

祝福姜华，也祝福旬阳的作家们！

（2007年7月15日于加拿大温哥华。《太极城笔记》，作家出版社2008年3月版）

## 他们——写给安康的文学朋友

他们是一群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或女子汉。

他们灼热，像奔突的岩浆；他们顽强，是死不了的还阳草；他们豪放，豪放得嘴巴一张，巴山秦岭就跳迪斯科似地蹦出来；也多情，见了松，见了竹，见了山猫野狸都要揽在文字里亲两口；也温柔，像暖气片，像鸭绒服，眼角常常挂着相思泪，细细的、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是压缩了的汉江。

他们好客。见面就见茶，一大杯呱呱叫的“陕青”，喝得你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吃饭必吃酒，西凤、汾酒、三粮液——保不准还会掂出一瓶茅台来，麻雀战、车轮战、攻坚战，不把你灌得人仰马翻绝不罢休。

他们胆大得很，悬崖上斜几株桑，他们就趴上去摘桑椹；汉江水深流急，他们“咕冬”一声跳下去，手里就有了几条鱼。心自然也是细的了：隔山隔水，给朋友寄一包新应市的茶；远足归来，给小女儿带一只叫的蝓蝓，买一包巧克力豆。

他们爱“谰”，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海阔天空，古今中外。间或，就轰炸给某人一个外号，让你哭笑不得。他们会唱歌，山腰里，河水边，常常会听到他们咿咿呀呀的“爬山调”。他们肚子里装满了悲欢离合、稀奇古怪、酸甜苦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只要你愿意撑起耳朵，他们就会一古脑儿地掏给你。

他们走过崎岖的路，淌过汗，流过血，伤过骨，他们不在乎。揣一颗赤烫的心，睁一双聪慧的眼，迈着坚实而沉重的步，千里浩歌，他们憋着劲朝前走。

走过汉水，走过秦岭，走出地平线，走向灿烂美丽的星空——

（刊于《安康日报》1987年8月2日）



## 淳朴诚厚说德安

《渡口的风景》（南方出版社 2001 年版）是刘德安先生的新作，厚厚的一本。封面饰以灰色的泥石纹，隐隐地有一艘船儿在水面上航行，满张着帆，冲起一朵硕大的浪花。我是将这本书端详、摩挲了一阵才打开来看的——这几乎是我的一个嗜好，读书先读皮。我觉得书的封皮好比于人的脸面，显示着内里的诸多信息。于是，从这个封面上，我读出了淳朴与诚厚的感觉，待把全书一篇一篇地阅读完，这样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文如其人”的说法，是大致不错的。言其“大致”，是说对一些例外者而言，其文未必如其人，或其人未必如其文。德安先生不属于“例外”。说来是 1984 年的事了。那年《西安晚报》要由小报扩成大报，需要招一批人，我们都是应招者。那是面试后的一天，走出报社大门的我，被站在斜对面屋檐下的三个人叫住了，他们知道我已先被借调来上班了，就问我一些报社的情况。三个人中的一个就是德安，稳稳的，壮壮的，甚至憨憨的，却是默默地站在那儿，别人问，他听。这是第一次相识了，留下的印象便是淳朴与诚厚，尽管未说什么话。

之后不久，我们便成了同事。虽说是同事，因部门不同，也就见面打个招呼，各忙各的事了。人和人的关系是变化的。几番寒来暑往，我和德安便由同事升变成文友。这之间的转捩点是他的爱情传奇的发生——海南岛的一位女教师寄来一篇稿件，敬业的德安认真地看了，回了一封信，女教师再写一封，德安又认真地回了一封，一封一封又一封……鸿来千山，雁去万水，结果是，德安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古城挥手告别，毅然决然地把家安在了椰树飘香、海涛拍岸之处。

传奇的爱情不但导致了美满的姻缘，还玉成了一个作家。德安调到海口晚报后，编起了副刊，这就和我干的工作同一了；在编副刊之余还勤奋地搞起了写作，这就使我们的共同更多了。德安的文章首次结集是在 1996 年，而且一次就出了两本：散文集《活个好心情》和文论集《艺文漫笔》。两本书寄来后，我还没有

来得及细看，就被到我这里来的一位业余作者借走了，而且属刘备借荆州的性质。后来那业余作者对我讲，这两本书写得好，对他的写作有指导意义，他已将其作为自己的“案头书”了。于是，只好打电话报告德安，德安便又寄过来一套。然而，当我为写这篇文章，想再次翻阅它们时，书架上却怎么也找不到，想必是又被谁拿去做“案头书”了。

我觉得，无论做人还是作文，淳朴与诚厚都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不易达到的境界，尤其在浮华风行、虚伪茂盛的当今。就做人而言，德安不像有些人那样，把人之为人的根本丢弃了，倒把一些非人的东西顶在头上、捧在怀里，他坚守着自己的本真，珍贵着自己的珍贵。就作文而言，无论是艺术性散文还是夹叙夹议类随笔，他都是写自己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花里呼哨，不云遮雾罩，不涩僻险怪，不骄情夸饰。你读他的文章，好似淳朴诚厚的德安就坐在你的面前，一句一段地讲着他的故事，有板有眼地谈着他的见解。

德安讲写作是他“在变幻无常的社会生活中，拒绝平庸的精神之路”，“能用美丽的汉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人生的幸事”。这样的感受是真切的，大凡称得上一个作家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是啊，淳朴诚厚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是不构成矛盾的，美丽的天宫仙女，钟情淳朴的牛郎；高耸入云的精神之树，生长在诚厚的大地上；而一部作品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常常是那些最淳朴、最诚厚的段落啊。

（刊于《西安日报》2002年5月20日）



# 美助深情笔作旗

## ——在医斯美资助作家白忠德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首先，为白忠德点赞。二十多年来，我眼见着白忠德由写一篇篇豆腐块的业余作者，成长为以秦岭生态为主要描写对象，推出一部部著作，获得冰心散文奖，影响越来越大的优秀作家。我们为白忠德的勤奋、取得的成就、为他成为陕西70后作家的翘楚而高兴，而点赞！

其次，为支持、资助白忠德的创美集团、医斯美公司而点赞。在陕西，支持文学事业的企业有；但一下子拿出五百万，直接资助某位作家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空前的。医斯美公司是主营生物技术的企业，刚才参观时看到介绍，说人的寿命理论上可达一百五十岁。一百五十岁也是个有限的数字啊，而文学的寿命与人类的寿命相同。屈原、司马迁的诗文已活了两千多年，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文已活了一千多年，它们还会久远地活下去、精彩地活下去。山水滋养着人文，人文升华着山水。

我为这次活动作了一首嵌名诗：“白玉琢成和氏璧，忠诚厚朴写传奇。德心仁念秦山事，美助深情笔作旗。”和氏璧的前身是一块白色的璞玉，是经过一番雕琢才成为宝玉，后被做成传国玉玺的。忠，是说白忠德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他脚下的这块土地；诚，是说白忠德总是真诚地面对家乡父老，面对文学，面对读者；厚朴，是说白忠德为人厚道、质朴。德心仁念不用多解释了。美，有三指：一指壮美、优美的秦岭山水生态；二指丰美的秦岭人文和大美的中华文化；三指支持、资助白忠德的美创集团、医斯美公司。深情，是说白忠德对秦岭、对文学一往情深。相信白忠德能够不负众望，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美的足以扛鼎举旗的大作品。

（2019年6月29日）

## 壮美的原野

2002年的“五一”长假，我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和几位同学一起，策划组织了“陕西师大政教系七七级毕业二十年同学大聚会”，二是通读了梦野的书稿《和梦想一起长大》，并为之作序。

我们的聚会是5月5日结束的，那天雨下得不小，潇潇的雨声中，我和昔日的同学们握手告别，同样在潇潇的雨声中，我打开了梦野留给我的书稿。这里用得上香港凤凰台阮次山先生常说的那句话：“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当我一页一页地阅读梦野的时候，三天来同学们聚会的情景，和那一副副额头留痕、鬓角挂霜的形象，还都没有从眼前退去。于是就想，今天，我面对的是一个如此这般的梦野，二十年后，梦野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梦野呢？比照我的那些毕业后发生了许多异变的同学们，真可谓既能说来，又有些说不来。言其能说来，是说今天的梦野，以自己的不凡的创作实绩，已可无愧地站在青年作家的行列，再有二十年的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影响更大的作家，当在情理之中。言其说不来，是说如果梦野在种种压力下，就此罢笔，改弦更张，去做其他什么事，那么，二十年后，世上或许能找到一个叫梦野的什么“长”、什么“总”，却找不到一个从“陕北之北”走出来的名叫梦野的作家了。

梦野是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资质的，这你从他的作品中就能读出来。文学是艺术的一部分。艺术这玩意，有如美丽的凤凰，天分和勤奋是两扇翅膀，缺一翼都飞不起来。常见一些人，天分不错，稍试笔墨，字里行间就飘逸着灵气，但灵气却没有蔚然成云，以至于渐渐地文坛上不见了踪迹。也有一些人，很勤、很苦，三更灯火，五更鸡鸣，写的东西能装几麻袋，却因悟性之锥钝颓拙笨而总不能脱颖。梦野两个方面都不存在问题，他的天分是高的，感觉细腻而敏锐，感情丰富而深沉，想象和思考富有张力。窑院里流泪滴血的生命树，窗台上演绎着

深刻爱情的一对蝴蝶，街场上被人践踏的草坪，以及饥饿的童年，感伤的初恋，求学的坎坷，写作的甘苦，人世间太多的苍凉和无奈……都化作他笔下云霞锦缎般的文字。而且，懒字是和梦野无缘的，他属于刻而苦之、勤而奋之的那一类。

再者，我之所以用凤凰来比艺术，还因为凤凰有集香木而自焚，然后从烈火中再生，即人们常说的“凤凰涅槃”的品格。这样的品格对作家而言应当说是很重要的，作家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涅槃”的过程。诚然，要自集香木，自燃烈火，自己跳到火里面去，烧掉旧我，烧出新我，对作家而言是很不容易的，但惟有这样的“涅槃”，作家才能不断地走过自己，走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天地。这一点，我愿意与梦野，也与天下的所有作家共勉。

我曾经三次去梦野的家乡神木县，窟野河的浑水，二郎山的众神，大柳塔的精煤，红碱淖的鲤鱼，毛乌素沙漠的黄沙……感觉到这块地方既是粗犷厚重的，也是神异奇妙的。七八百年前，这里因长出三株神松而得名；七八百年后，这里的煤田横空出世，无论储量还是品位，都让世界震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要出人才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交汇，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秦晋蒙三省区的民俗风情在这里融通，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怎么会不出人才呢？

和梦野相识，是我第三次去神木吧，记得那天下长途车不久，我们就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聊了好长时间，说陕北，说生存，说写作，说如何做人。几天后，他又陪我到了榆林，我们转了榆林老城，看了普惠泉的桃花水，走访了他读过的学校，吃了几回羊肉臊子饸饹面，末了，他送我登上了飞往西安的班机。那次，也就是那次，我感受到了梦野对友人，当然也是对文学的一片赤诚。

那飞机是从塞北高原起飞的，从舷窗望下去，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由北向南，呈现着递进的、层次感很强的由黄到绿的地貌。于是就想到了水土保持、荒漠绿化、山川秀美，也想到了陕北人走出陕北、陕西人走出陕西、中国人走出中国的问题。啊，我不禁感慨了，梦野，梦野，这真是一片梦的原野呢！这原野前面，若有了辽阔、深邃、丰饶、富丽等定语，那才叫壮美！

（刊于《西安日报》2002年6月10日、《榆林日报》2002年12月7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洹上：阡陌走韵弹拨声

## ——序韩传栋散文集《阡陌心田》

在西京的报业里任职，便能有机会熟识各地的作者，由熟识而欣赏，由欣赏而交情者，韩传栋是其中的一个。闻韩传栋欲结文集，叫做《阡陌心田》，听来就觉得这个书名很有韵味，眼前便浮现出一片绿茵茵的田野来。虽然未与传栋谋过面，但知他是个豪旷的北人，居邺下，隐市中，喜文墨，写作多年，今结集是为幸事，又是他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要说些话，表达一下祝贺之意。

传栋的文字，细读之后，会令人有深刻的印象而久久回甘，面对他的文字，就如面对海潮，面对钱塘，这源于他取材的宏阔，虽居一城之隅，心存天地之大，这是为文的修行，目力的通达。他站在古雅的安阳，与妇好对话，与岳飞同叹，与板桥吟霜，与慰亭辩论，陶冶历史，藏否人物，体现的是对道德、思想、情操的敬畏与坚守，一派学人精神。这是他的高贵处。不独于此，他站在安阳这块土地上，这土地生他养他，他爱他恨，情景入心，酝酿而发酵，就有了生发的欲望和向上的境界。与春相遇的好色，与天同浴的好德，与海共听的好道，颦笑之间，流露文采形胜，衔接人间烟火，文字便活鲜鲜地有了叶的青翠、花的芬芳，和花以外的诱人的果实。这是他的性情处。传栋还有一些文章，让你不仅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学功底，还能领略到自然科学方面的储备和能力，两者交合，成就了启人心智的佳构。这是他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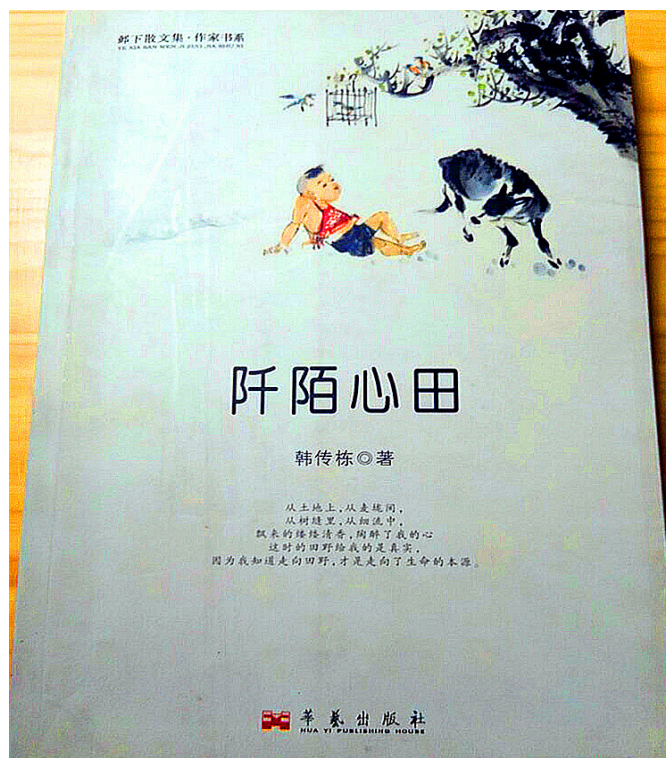
散文是最好写又最不易写好的文体，一个作家的功力大小，读其散文就能判断其大概。阅完书稿，我发现，传栋是一个对文字保持着敬畏的作家，这能让他既不拘泥而喷薄，又相当认真而谨细。这是他的不堕。如果一个读者，能静下心来读读韩传栋，就会发现，这位作家，秉持高扬的是道德之旗，倡导向往的是理想之境，身体力行的是大正之道。他把这些称之为“朝圣”。我理解，这是心灵的朝圣。人啊，是应该在低处生活，在高处思想。因此，他律己甚严，一切污浊

似乎都不能见于他的双眸，严肃地工作，严肃地学习，严肃地承担着自己的那一份人生责任。这是他的不惰。这在当代是值得为文者尊敬的。清正的文字后必然有一座清正的心房，这座心房里有一盏不熄的明灯，其圣洁的光芒使作者的前途畅亮，阡陌生辉。

韩传栋是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能够这样，守着文学，守着自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文学在过去，曾经神圣而伟大；今天，她依然神圣而伟大。但她好像不怎么喜欢热闹，或者说和招摇过市的热闹相比，她更喜欢孤灯杯茶的安静；她不大情愿为利欲熏心者锦上添花，却更喜欢为灵犀相通者雪中送炭。以韩传栋的高贵、性情与智慧，以他的不堕与不惰，相信会有更美妙的篇章，书就洩上阡陌，泽惠万千读者。

是为序。

（2007年初冬于西安慧雨庐。《阡陌心田》，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



## 感叹张之沪

之沪是我的同事，都是 1984 年进报社的那一批。十多年前，一场莫名的病，把在人们印象中身体不错的之沪害得难以下楼，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今年 8 月初，在加拿大休探亲假的我，从网上看到配着照片发表的《病榻上写出 50 万字长篇，张之沪〈道北名门〉聚焦西安道北》的消息，眼睛不禁一亮。于是就在我主编的《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版上全文带图地做了转载。数日后回到西安，在院子里碰到之沪夫人，表达了祝贺作品出版之意，说：“让之沪发一个邮箱给我，我把那期《今日西安》专版的 pdf 版发给他。”当晚接到之沪电话，言出版社给的样书很少，手头已经无存……第二天上午，之沪又电话于我，说已让夫人到钟楼书店专门买了一本……当天，案头就有了这本题着“庞进年兄批评”、签着名、盖着红印的《道北名门》（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于是，就放下手头的事情，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几天的阅读，使我感慨良多，篇幅关系，只谈两点。

第一，《道北名门》是真正的文学，之沪已实现了由新闻到文学的转变，昔日的媒体人已成为今天的小说家。

开读之前，我有怀疑：之沪到报社后，一直跑体育口，写的都是运动员及各种赛事的消息、通讯，没有见他发表什么文学作品，一直在副刊部供职的我，印象中就没有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或者小说。那么，他这本书会不会像有些外行人写的那种东拉西扯不靠谱的东西呢？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毕竟是两回事啊。读起来以后才发现，我多虑了：这本书不但是文学，而且是很不错的文学。且不说故事情节之抓人、人物性格之鲜明，也不说运用反讽的手法，所达到的“苦中乐”“含泪笑”“戴枷舞”的效果，仅就语言而言，就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编发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不少人还浪得了一定的名气，但其语言，实在不敢恭维——



的、地、得不分，句子成分不全，词汇搭配失当，疙里疙瘩地缠绕出一串串病句……每每看到这样的作品，我都忍不住要念叨一句：“基本功不到位！”

之沪的作品没有这样的问题。在《道北名门》中，我既读到了用得恰到好处的俗语、俚语、歇后语，如“黄叶落，青叶掉，阴司路上无老少”，如“瓷锤闷种，啞馍一笼”，如“猪尿脬打人——不疼臊得慌”；也读到了耐人寻味的雅词、美句、歌赋，如“雪虐风饕”“负暄闲话”“因言入彀被祸”“异苔同岑，相见恨晚”；如“草色青青，灞柳如滴”“骤然一阵阴风刮过，寒彻肌骨，再睁眼，已无影无踪，只剩下冷月寂寂，春花寞寞……”如“魂兮魂兮，切勿奔南，南有峻岭，山魃狡黠；魂兮魂兮，切勿往北，大河奔流，水怪潜伏；魂兮魂兮，切勿向西，西部荒原，豺狼出没；魂兮魂兮，努力向东，东望西京，是吾故居……”如果说上述俗语、俚语、歇后语，一些作家还能掌握并运用的话，那如举的雅词、美句、歌赋，一些作家，尤其是陕西一些作家，就不一定能掌握并写出了。比如这个“彀”字，你能读其音、知其意吗？还有这个“异苔同岑”，你能知道典出哪里吗？文学走到今天，学养已成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素质。不重视学养，常以一点点小聪明而沾沾自得、夸夸于世，这样的作家是难成大气象的。所以我说，从《道北名门》中，能看出之沪的学养，一个当代作家的学养。

第二，《道北名门》展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且牵涉到收藏、文物、鉴宝等专门领域，之沪了解之深、之细、之精，堪称专门家。

道北，指的是陇海铁路西安段之北，那是战乱年代河南人西逃至陕西的落脚之地。秦地、豫人、铁道边，种种因素，构成了与西安、与关中其他地域有别的道北风情、道北文化。籍于成长于道北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之沪将道北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酸辣苦甜全方位地、艺术地、淋漓尽致地展现于笔下，那一个个以各种方式与命运抗争，却总被浪涛淹没的人生令人感喟不已，那字里行间所透出的渗骨入髓的悲凉着实令人唏嘘！

书中多处写到了与文物有关的人事，如有“贼爷”之称的翟某古墓得宝、最后因盗墓而被捂死于墓中，如有“金一眼”之称的“鉴宝专家”对“明画”和“官窑瓷器”的鉴定，尤其是后者，品相、年代、款式、造假经过，等等，分析得鞭

辟入里、头头是道。于是不禁感叹：不容易啊不简单，这个患病在榻、下楼困难的张之沪，已然成了一位对古墓、古画、古瓷等有独到研究的专家！

（刊于《西安日报》2011年9月5日）



# 巴漠有大气象

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了巴漠的《黑石村往事》，总体的感觉是六个字：巴漠有大气象。

我讲的“大气象”之“大”，是大作品的“大”，也是大作家的“大”。大作家以大作品为支撑、由大作品所成就，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巴漠的大气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框架结构大而不乱。《黑石村往事》的故事脉络，以黑石村为中心展开，辐射到里正乡、频德县、关中、陕北，乃至整个国家。人物众多、故事复杂、时空开阔。巴漠一章章从容写来，将那一段跌宕起伏、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演绎那段历史的各种人物，生动、鲜明地跃然纸上，让人过目难忘。读的过程中，多少有些“散”“杂”的感觉，读完后回味，却是浑然一体。这说明，巴漠已具备了驾驭重大题材、以自恰的方式结构长篇巨制的能力。

二、表现手法多而出新。就叙述而言，《黑石村往事》以顺叙为主，间以倒叙、插叙、分叙、补叙，皆自然、贴切；就描写而言，《黑石村往事》里的人、景、物、民俗；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等等，皆生动、准确，不乏神来之笔、精彩段落，如第二章中对“小宋皇帝”登基、出征的叙述，如第三章中，对白马“滚雪”和母黑驴的心理描写，就有让人拍案叫绝的魅力。过去读过一些的写动物心理的文字，觉得都没有巴漠写得充分、到位、精妙，新颖。这说明，对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巴漠已经熟练掌握且能得心应手、妙笔生花地予以运用。

三、再现史实烛照古今。写历史故事，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现实主义”，即要尊重历史、再现历史，不能歪曲历史。只有坚持“现实主义”，才能避免概念化、脸谱化。《黑石村往事》中的人物，如惠天禄，如蒋根喜，看得出，都有人物原型，作者尊重原型的本来面目，使他们成为文学画廊中的“这一个”，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当然，现实主义不是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不是视频录像，作家

必须对那段历史、那段现实有思想的烛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作品都是既讲述了伟大的故事、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又艺术地体现着某种大思想的作品。从《黑石村往事》中，能看到巴漠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富平是一块神奇、丰厚的土地，这样的土地上当然会腾龙起凤，产生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作家。

相信已呈现出大气象的巴漠会再接再厉，我们祝福并期待着。

（2016年6月5日。《黑石村往事》，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



# 漂亮就是刚刚好

## ——在何红雨新书《女人就是要活得漂亮》分享会上的发言

何红雨这本新书还未赏读，但她的其他作品，我以前读过不少。我做副刊编辑的时候，编发过她的作品。总体感觉，如她的散文集《独美》简介所言：清新、细腻、唯美。我曾多次给一些作者题写“情以美抒，思当妙达”八个字，我觉得何红雨做到了。读她的文章时，我曾感慨：这样的文章，我这样的男人写不来，只有女性，或者说只有像何红雨这样的既有追求，又有灵性的女作家才能写出来。

搞文学艺术若要成功，天分和勤奋两只翅膀都要扇起来。何红雨两方面都发挥得很好，因而读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当然，上升、拓展的空间，还是有的。

《女人就是要活得漂亮》，这个书名起得好，耐人琢磨。什么是漂亮？外在美是漂亮，内在美也是漂亮，外在、内在都美更漂亮。某件事做得好，人们会说：“干得漂亮！”儒家思想的精髓可用“仁”“礼”“和”等来概括，但我更倾向于“中”。“中”的意思是恰当、合适、刚刚好。所以，可以说，活得漂亮就是活得既不过分，也不不及，刚刚好。写文章也一样，写景、抒情、阐思、结构、用词、铺排，等等，达到恰当、合适、刚刚好就是漂亮。

何红雨的文章已经漂亮了，相信她会继续努力，写出更漂亮的作品，活出更漂亮的人生。

（2019年4月24日下午于NONGCOFFEE书吧。《女人就是要活得漂亮》，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版）

## 奔突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读山石《世纪流浪》

山石的真名叫张井，认识他已经好多年了。起初是他把一些诗作拿来让我看，我便从字里行阅读出了这个小伙子的不一般，那鲜活灵动之气给人的感觉就像行走在春雨过后的田野。随后，他又隔三岔五地拿来一沓一沓摄影作品，题材没有离开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或手持拦羊铲、满脸沟壑的老者，或穿着花袄袄、一身稚气的娃娃；或沙丘上孤零零的一棵树，或黄河岸边一间兀立崖颠的石头房……从画面上，你能看到山石对生命、生存的思考，其捕捉的时机、角度以及光线的处理等等也都是独到的、审美的。这便使我在欣赏诗人山石的同时，也欣赏到了作为摄影家的山石。

对生长于陕北的作家、艺术家，我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这便是觉得他们身上都纽盘、鼓荡、生发着一个“李自成情结”，即闯天下、打天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情结。这固然与那个地面上曾产生过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风云一时的古代农民起义英雄有关；也与现代以来，那里曾是“闹红”的摇篮，产生过刘志丹、谢子长这样的革命家，后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又以那里为根据地，最终将“革命”搞成功有关；当然，更切实的是，那里地域相对偏僻，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民众的生活相对艰难，尤其是那些无煤、无油、无天然气的地方。对年轻人，尤其是那些通过上学读书，对外界有所了解，“眼睛睁开了”的年轻人而言，要将他们固定在那块贫瘠而荒凉的黄土高坡上，常年累月地过那种苦焦而单调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于是，走出去，走向城市、走向大城市，小则改变命运，过一种体面的、优裕的生活，大则登台入阁，成将作相，成就一番呼风唤雨、轰轰烈烈的事业，就不仅成为一代一代陕北后生的理想，也已然外化成了他们的行为走向。于是，就文坛而言，就有了柳青、路遥、刘成章、乔盛……和我们的山石。

山石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来到省城西安的。十多年来，他在这个有名的“四方城”里，当记者，办报纸，做广告，出挂历，策划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后来又读硕士，签约某中央新闻机构……当然也恋爱，也结婚，也生子：总之是家已成，业已立，或基本已立。现在，谁也不会将英俊斯文的山石不看作城里人了。然而，有趣的是，我在通读他新出的诗集《世纪流浪》时，发现其中大部分篇章都是写农村的，或者说基本上都是写他的陕北老家的。在写家乡的山水树木、风光人物时，他的笔下充满了感情，赞美和怀恋由衷而生。且看：“风吹草动 / 谷穗一片金黄”；“枣子在梢头灿若星火”；“谷物豆秧很是受活 / 老槐开来开去 / 土话冒着热气儿 / 婶子们从民歌里走出 / 豆角摘得满满”；“榆林的豆腐桃花水 / 陕北的小调最有味”。他也写城市，但他笔下的城市，是一些怎样的意象呢？是“吐蕊的头发五彩的睫毛 / 街上贴满鬼钱一样的广告”；是“叫嚣的车辆 / 僵死的楼群”；是“舞女们浓妆艳抹 / 深入筒出城墙的拐角 / 形同文物的老人 / 袖笼了双手 / 紧宿着头颅”；连“城市的阳光”，也“沾满油烟味 / 稀稀拉拉 / 挂满法式梧桐的枝桠”。他也写到了自己，写他由“吹口琴的穷孩子”“背吉他的乡村教师”，如何变成“唱民歌的都市浪人”“戴面具的都市白领”。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无奈、惶惑、自嘲、调侃和似乎是源自本能地抗拒。他说自己是“游牧民族的骑手 / 游弋在城市的边缘”；“多少次独自徘徊 / 多少次苦苦挣扎 / 多少次刻骨的疼痛 / 多少次艰难的抉择”，但还是“抓不住城市的手 / 摸不着城市的脸”。于是，“每次走过城市的门洞，都以陕北民歌与之对抗”。——难怪山石的陕北民歌唱得那么好，不亚于那些在荧屏上唱来唱去的红歌手。而他对陕北的毛驴也更是情有独钟，在一次聚会上，他曾即席朗诵自己创作的《毛驴礼赞》，听得众人耳乍目瞳，不禁拍手叫绝。

读山石的诗集，给我一个感觉：人在省城，心系陕北，或者说表面上是城市人，思想深处依然留恋着乡村。这样的状态当然不仅仅是山石，路遥、刘成章等人也是如此，他们的代表作写的都是陕北。这便反映出一个矛盾，即“李自成情结”与“乡土原型”的冲突。“李自成情结”和“城市情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因为“闯天下、打天下”的目标实现地一般不在乡土家园，而在城市，尤其在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而“乡土原型”则是与生俱来的——对祖上大多是农民的中国人来讲，此原型具有基因的性质。这样的冲突，或可称

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冲突。若从人性的根子上说，是热闹、便捷、炫烂、丰富多元的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与僻静、悠缓、简单、古朴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各适合着人性的某一面，而它们又不能同时同地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或实现。

有矛盾就有戏剧性，冲突之处正好是诗人作家们的情感才华显露迸射之处。这一点，山石的诗作，以及路遥、刘成章等人的作品都已提供着证明。所以，我说他“奔突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否还要继续提供证明，得看山石是否能走过自己，即是否能够从更高的层位上来把握和审视所谓的“世纪流浪”。

（2006年4月14日于西安慧雨庐；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6月9日。）



陕北风光（蓝风 摄）



## 渴望崇高

我这里已有王君先生的五本书了：《王君感言录》《王君乱弹》《王君钢笔书法》和长篇小说《妈妈》《商海》。看书前介绍，他还出版有《幽窗小品》《野岛诗词》等著作，之外，听说《箫音》等两部长篇也完成或接近完成了。这些著述加起来，字数超过了百万。这就令人感叹了：一个在浪涛汹涌的商海里扑腾的企业家，竟然对文学创作感兴趣，几近于痴迷且著作叠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他？

起初，我曾怀疑这些作品是否出自王君之手，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弄潮儿”浮出水面，有了成就和名气，也有了比较丰裕的金钱，于是雇请“枪手”为自己写传著书的情形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待将王氏作品流览一番之后，我的怀疑打消了：这是人家王君自己写的！因为语言是他的，行文风格是他的，从中彰显出来的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的认识、对生命的体验也是王君式的。且看：

巍巍白华山下，滔滔黄河岸上，忽然间卷起了阵阵不息的东南祥风，吹得那白华山北麓青波荡漾，绿海涌潮，把个万物生灵生机一股脑朝正北推去。那黄河浑龙，昂首翘项，瞪眼吹须，喷吐着龙腮滤后的圣液，直冲正南洒去，同那南来的万物灵机相融，直对着这一马平川、万载沉睡的巨狮击去，惊得个巨狮伸颈提足，咧牙舞舌，抖毛摇须地吼叫一声，惊雷般地击打在人们的心上。于是，他们借助着白华山灵气，黄河龙赐圣液，开始重振河山，重建家园。一忽儿涌出了众多个雄略奇士、将才贤君，把个不小的古城掀得似火山喷浆般热闹。看样子，这座破旧的古都市要来个天翻地覆不可！

这是《商海》的开场白。你当然可以从这段文字中挑出词句上的瑕疵，但你还是要为作者的气概、笔势和想象力而刮目，而且，你大约能够从中看出作者行

事做人的风采。再看：

思想往往在伤痕上萌发。

人性的弱点是近小人而远君子。

贪官的体内有头狼，吃别人的同时，也吃着贪官的心肝。

私有制企业的员工就像蚂蚁，尽可能去搬运大于自身体重五倍以上的物体；而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尽可能不去搬即使小于自身体重三公之一的东西。

请不要把读书人全当作学者，他们中间相当部分人只是在扮演一头骆驼，只是搬运而已。

这些别致而锐敏的感言，当然是王君式的既有生活体验又善于思考，且具备一定的文学创造才能的人方可写出。

此前，王君的名字听说已有多年，知道他是陕西周至人，早年坎坷，多有磨难，后来研制出一种治肝病的药，成为此行当的专家，接着便组建炎黄企业集团，出任总裁。听说是听说，也参观过他在楼观台建造的药王宫，握过一个手，合过一个影，但一直没有进一步的交往。2001年4月，有“文坛基辛格”之称的周明先生回陕参加祭祀黄陵的活动，大家相聚于金花饭店。王君开着他的凯迪拉克来，一身合体的藏蓝西装，一口纯正、利索的关中话，言谈举止，给人一个精明睿智又坦荡实在的印象。他说他读过我的不少散文随笔，对我的龙文化研究也很有兴趣，平时除了工作、写作，还爱听人唱秦腔。之后不久，便得到了他的赠书。

记得那天在东门外老孙家吃完泡馍出来，站在平敞的广场中间，熟识王君的青年评论家李彬这样说及王君的写作：“简直入了迷，不嫖，不赌，一有空余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哗哗啦啦地写开了，而且越写劲越大，尽管文学功底差一点。”

我说这叫渴望崇高。

现在，我面对一摞印制精美的王氏著作，“渴望崇高”这四个字依然在眼前闪耀。是的，人活在世上，首先要解决的是活下去的问题，活下去的问题解决了之后，面临的的就是活得好的问题。活下去的问题可以通过物质的手段解决，活得好的问题仅有物质就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精神参与。于是，崇高就凸显出来了。

崇高意味着拥有物质而摆脱物质，身陷俗世而超越俗世，它像出泥之荷一般清丽，它像松矗峰巅一般峻爽，它像云上阳光一般澄亮，它像星旋宇野一般悠达，它能使人的精神穿云破雾，使人的品质去芜汰杂，进入一个高新妙绝的境界。

对拥有一个“朝阳企业”的总裁而言，活得好的物质部分可以说差不多已达到马克思讲的“极大丰富”了，以王君的聪明，显然是意识到了光有“极大丰富”是不行的，还必须渴望崇高，奔向崇高，否则，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王君，就会被俗滔滚滚的汪洋大海冲击得晕头晕脑，甚至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于是，他拿起了文学之笔，一写而不可收。为什么呢？因为崇高的路径有许多条，文学才是最迷人的也是最见效的一种啊。

（刊于《炎黄文化报》2001年6月8日）



## 也谈鹏鸣

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出席这个“鹏鸣诗歌作品座谈会”，现在主持人点名发言，我就从两个层面谈谈吧。

第一个层面是肯定鹏鸣。肯定鹏鸣什么呢？首先是他的勤奋。世上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天才？大概是有的吧，只是很稀见，凤毛麟角罢了。常见的是不笨不傻的聪明人，这样的人不说多如牛毛吧，总可以说比比皆是，不信你站在钟楼上扔一百顶“聪明帽”，接住并戴在头上的没有八九十，也有六七十。那么为何有的人一生碌碌，或废在半途，有的人成就不断终臻辉煌受人敬仰呢？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勤奋与否。和勤相对的是懒，和奋相对的是颓。就说写作吧，今日写今日有，今日不写今日无。你把个“乏味无聊没意思”挂在嘴边，抱一副“游戏人生”的态度，整天食睡之外，就是玩耍，昏昏沉沉，浑浑噩噩，怎么会有创造呢？怎么会有好作品呢？“一生之计在于勤”“业精于勤荒于嬉”，千古金谚，万古真理。以此来看，鹏鸣的价值就出来了：诗歌写了两万多首，发表了上万首，出版著作十几部——最近出的这两本大家都看到了，印得很精美，厚得像砖头，这么大的创作量，内容质量另当别论，勤奋二字，鹏鸣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是他的痴情。一个由关中土窑洞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一个由起初在水泥袋子写诗的文学少年走到今天的艺术殿堂，纵使有几多缺点和不足，鹏鸣对诗歌、对艺术的痴情还是令人感慨的——这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作中读出来。而对诗歌、对艺术的痴情，无疑是对家国、对父老、对有情之人的挚爱为根基的，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积极的值得肯定的生活态度。古人有言：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一个人长期不懈地倾注精力于某项事业，且具备足够的悟性，如果不入邪门，这个人极有可能成一番大器的。好比举一个聚光镜在太阳下，那光点迟早是要把什么灼热或点燃，从而照亮一方的。

第二个层面是希望鹏鸣。希望鹏鸣在两个关系上费些神，思考思考。

一个关系是多与少，对文学创作而言，也就是量与质了。这是一对矛盾。没有一定的量，就谈不上质。但是，光有量的积累，缺少质的飞跃，就好比许多块砖都平面地铺着，没有垒筑成一道墙，或一座塔。《全唐诗》收唐人诗作近五万首，流传下来的是《唐诗三百首》。这三百首中常被人们诵读的也就几十首，对一般人而言，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十首就算不错了。当代诗人也一样，我们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记住了北岛，由《致橡树》记住了舒婷，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记住了顾城。希望有那么一天，普天下的人都在传诵着一首诗甚或两句诗，问这诗是谁写的？回答是“鹏鸣！”

第二个关系是虚与实的关系。画家作画讲究“虚实相生”，这个“生”，换成生命、生存的“生”，也是讲得通的。如果把物质生活视为“实”的话，精神生活就是“虚”了。“虚”是一个洞，多姿多彩的，无穷无尽的，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创造，宗教信仰，以及我所关注的龙呀凤呀等等，都是洞中的“仙”。没有“实”，人类无以活；只有“实”，没有“虚”，就还是动物的活。“虚”来源于“实”，升华着“实”，滋润着“实”。对作诗而言，越“虚”越艺术；对做人而言，“虚”得越多，离本真越远。这里面的“窍”和“度”，不见得人人都能琢磨得透、把握得好。初见《鹏鸣抒情诗选》，看到介绍文字中的“文学家”“思想家”“外交家”以及“泰戈尔第二”等等，我笑了。我想，这位鹏鸣，是不是把作诗的艺术之“虚”用来自我评价了。后来，我不笑了，因为我进一步想，如果说鹏鸣把自己的五分成就说成十分、十一分的话，我们有没有把五分说成六分、七分、八分的情形呢？或问，当你听到种种溢美之词的时候，当一顶顶华丽的高帽子落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是不是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呢？说到这里，我希望鹏鸣，同时也是提醒自己：水过百度即成汽，火烧过了饭就糊了，对“虚”，我们当有足够的警惕。

愿鹏鸣“扬弃”已往，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刊于《西安日报》2000年7月11日）

# 一本好书

常年累月和书打交道，眼睛已历练得很挑剔了。一本书到我手里，无非三种境遇：先看前几页，如果吸引不住，后边的一般就不看了，顶多翻翻而已。这是第一种。如果从前到后吸引了我，让我能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这书就该是有价值的一本好书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情形是，不但吸引我认真地读了第一遍，还吸引我仔细地读了第二遍，那么这本书，差不多就是精品了。

《起诉自己》对于我，属于第二种情形。我是中秋节的晚上得到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晚，我们驱车几十公里，到咸阳市渭河南岸一个叫钓台的地方，喝茶，聊天，看那一圆明月从云堆里钻出来，又藏进去；再溜出来，再隐进去。间插着听唱歌，看表演。待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躺到床上，把《起诉自己》拿起来，想翻翻再睡。不料不看则已，一看竟放不下手，一直看到三点左右。第二天早上醒来，又靠在床上看了一阵。起床后，洗漱毕，又坐到桌前看。接下来两天，出门等车时看，坐车时看，回到家里继续看。直看到最后一个字，才长舒一口气，叹道：不错不错，一本好书！

合上书，我问：这本书凭什么让我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

首先，书中描述的，不仅是一个叫李君安的中学教师下海经商的故事，也不仅是“一部家族企业的兴亡记”，它写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如今当前眼目下的真实状况，是活生生的“现在进行时”。作者吴晏喙是被生存危机推到改革前沿的，他的体验是经济大潮中一个弄潮儿的体验，是鱼对水、鹰对天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和为了写作而去“深入”生活的体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有了这样的体验，作品便同现实“不隔”。比如，作者写到了一些政府职能人员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腐败劣迹，这些劣迹，不仅使李氏的事业毁于一旦，也使我们把一个社会的症结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事实是，你若不设身处地地和这些人打交道，你就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也难得写细、写活、写得入木三分。

其次，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若没有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艺术化的语言，要抓住人是很难的。《起诉自己》的主人公，由做专门购销鞋类库存货尾的“破烂王”起步，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成为资产达千万的“李总”；而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因一场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的灾祸临身而全盘崩溃。这样的故事，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当然也是诱人的。在故事的推展中，我们读到了不少感人的细节。如大虎因偷拿公司三万块钱而被开除，除夕夜当着寡妇母亲的面，大虎向“李总”认错。此前“李总”曾让公司成员思考“人跟猪究竟有何区别”的问题，于是，跪在地上的大虎，以泪洗面地说他“把问题想明白咧”：“我以前是猪我不是人，我以后要当人我不当猪！”这时的“李总”，则让大虎把这话对着乃父的遗像连说三遍！……至于语言，也是不错的，简洁，明快，生活化，巧用方言土语，读起来像河水在流，而且颇有味道。

《起诉自己》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我在阅读的时候，这些人物就有说有笑、有哭有闹地活在我的眼前。以李氏四兄弟为例：老大“官”念严重，瞧不起生意人，自视甚高，却不善于与时俱变，于是官位屡降，终成为一名“整天上访告状”的“精神不正常”者。老二大概读了不少传统小说，脑子里满是“打天下”“坐江山”“光耀门宗”之类的东西，同时又不乏农民式的狡猾、自嘲和幽默。作者对此人着墨不算多，却特别出彩，其言其行，常搏人会心一笑。老三即主人公李君安了，聪明、智慧、胆略、魄力、吃苦和勤奋，都兼备一身，却难脱书生气，甚至有点儿“神经兮兮”，是一个悲剧性的“情绪化强人”的形象。至于叫安义的那个老四，就是胆大、脸厚、特别自私却又比较聪明的“白眼狼”的典型了。

人们在评价某本书的时候，常常使用“品位”一词。“有品位”是褒，“没品位”是贬。如果将“品位”理解为作品达到的思想高度的话，那么，我想说，《起诉自己》是有品位的，而且，品位不低。书中的不少场面，是围绕“蓝皮书”和“红皮书”展开的。“蓝皮书”是李氏公司的规章制度，“红皮书”是以“要做生意先做人”为精髓的“李氏精神”。显然，这“蓝”与“红”的象征意义是深刻而严峻的。一个企业也好，一个社会也好，没有“蓝”不行，光有“蓝”亦不行。那么，“蓝”与“红”以怎样的内容、怎样的形式、怎样的比例结合，才是“最佳配置”呢？不错，主人公是秉持着“李氏精神”下海的，在商海扑腾的同时，

他也时时注意自己的人格精神的完善。然而，现实冲决了他的道德壁垒，他不得不向腐败者行贿，不得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后来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对“李氏精神”的莫大嘲讽。那么，做生意的同时，还要不要做人？也就是说，面对万象汹涌的市场经济，人何以为人？《起诉自己》展示了作家以亲身经历为模本的艰辛探索，这样的探索自然会引起我们的思索，而这两“索”，正是一部作品到达高品位的基本条件。

（刊于《西安日报》2001年10月14日、《三秦都市报》2001年10月17日、《西安工人报》2001年10月25日。《起诉自己》，长虹出版公司2001年版）





## 赤子之歌

还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冯赤先生将他的文集呈送予我，请我作一篇序。文集已打印、装订成书的样子，分作两册，虽说简单，却也是清爽齐整的，可见他对自己心血成果的珍爱和做事之细。我觉得这其实已可称作出版物了，只是少一个所谓的书号而已。

说实话，我对作序是不擅长的，以往也婉拒过一些朋友的美意，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才情和影响与朋友们的期待尚有一些距离，只怕拙笔笨言并不能为人家的锦绣文字增色几多。然而，当我接住冯先生的书稿，并面对着那质朴、赤诚的目光的时候，便明白这篇序是非写不可了。一来冯先生是临潼人，写了不少骊山方圆的景物人事，我呢，出生于临潼，骊山上下的许许多多也都化入了我的作品：这便使我们有了乡党和同道两层关系，这两层关系都是值得珍重的。还有，多年来，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岗位上，我阅读过不少冯先生的来稿，这些源源不断的稿件，使一个勤奋、刻苦、执着地献身于文学的形象显现在我的面前。对这样的形象我一直是关注且心生敬意的，因为，在物欲横流的当今，这样的形象实在是少见。

转眼间就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每年金秋，我都能吃到家乡的亲友们送来的珍珠玛瑙般的石榴和彤红玲珑的火晶柿子，这是一份温润着乡情的甘甜啊！今年，在我依然有福享受这份甘甜的时候，我打开了冯先生的书稿，一篇篇、一页页地读了起来。《临潼故事》《临潼风情》《走出凤凰原》《我这一辈子》……早上站在阳台读，晚上靠着床头读，工作间隙抽空读，一直读到最后一页。读得时而点头，时而感慨，一些使我觉得最能体现作者特色风采的地方，便用红笔划了出来，如：“我的富有是我以满腔热忱关注着的骊山文化。……我肯选择那种默默无闻的小景小点，如白鹿观、洪庆沟、黄巢堡、韩峪沟、坑儒谷、八角琉璃井、汉露台……写这些景点，更可以享受较大的写作自由，率性为之，不亦快哉。”

这些的确是冯先生独到的地方——除了上面列举的之外，尚有收入文集集中的《骊山石钥匙》《卖盐郎焦令》《相桥镇与寇准》等篇章，都是以往鲜见人涉列的题材。我也写了不少有关骊山文化的文字，大概也能算得上一个“骊山通”了，但和冯先生比，许多地方竟没有写到。这说明冯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细心人，因了他的有心和细心，读者就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骊山，而不仅仅只看到兵马俑和华清池了。

当然，让我更看好的还是冯先生写自己家世人生的篇章。读这些篇章，如作者所言，你能在“字里行间倾听到一种最朴素、最真切、最执着同时也是最温暖的人性的声音”。“父亲佝偻的背影是我航船的桅杆，父亲的苍茧是点燃我前行的太阳。……那一年，我要远走他乡，去异地做事，父亲用剧烈颤抖的双手托出毕生的豪言壮语：你行！”面对家中穷困的状况，“我上学心退了，但母亲深知不识字痛苦，她鼓励、劝说我：日子再难过，学非上不可！”这是他笔下的父亲和母亲。“我爱你，但我不敢爱你，因为我清贫如水。”“只要真爱，喝口清水也是甜的。”这是写他和爱人相恋时的几句堪称经典的对话。还有，年幼时的童趣和病患、求学期的艰辛与勤苦、青壮年时的受挫与奋发、步入花甲之年的通达与感喟，当然还有相伴终生的五彩斑斓的文学梦幻……

尤其让我感慨的有两点：一是在他还处于盛年的时候，就毅然地辞去了局长的官衔，专事创作，“决心要出几本书”，要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我的不同流俗的情感世界”，要“整天如春蚕吐丝般喷涌着文思”，使“一篇篇丝绸般精美的华章接二连三地登上三秦大地的报刊上”。这是一次人生坐标上的重新定位，也是对自己命运走向的一次抉择。在当今之中国，在官和不在官是大不一样的，舍弃一顶乌纱等于舍弃了许多利益。二是他的创作心态，“本色做人，率真为文”“常常在笔与纸的惆怅中怡然自得”。“每当一稿杀青，明知于世无大补，却心安意泰，风卷云舒”；而“每见拙作刊诸于报端，心情之愉快，与神仙相近无几矣”。他的这种心态，我是赞赏和认同的。文坛本是一个名利场，一点名都不求，一点利都不要，是不可能的。但淡看名利，把追求“情之裸美”和“思之妙达”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作为旨中之主，却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合上冯赤先生的书稿，我想到了“赤子”这两个字。何谓赤子？天然率真如婴儿，心地澄明如婴儿，爱心炽热、爱意绵绵如婴儿者是矣！以此来看，冯赤先

生是可以进入赤子行列的。他爱父母、爱家乡、爱妻儿、爱文学……爱得率真澄明，爱得如痴如醉，自爱得绵绵无尽，爱得自得其乐。

于是我想说，他的这部文集，其实是一支“赤子之歌”，尽管这支歌还可以唱得更圆润、更高妙、更壮阔。

（刊于《作家报》2003年3月27日、《文化艺术报》2003年9月3日）



临潼芷阳湖

## 情深、文朴、哲绪飞 ——王忠义诗集《心语》序

我出生于临潼栌阳镇，上大学前在临潼读书、下乡，大学毕业后又在临潼工作了两年多，临潼籍的文化人都视我为乡党，而我对乡党们写的作品也总是投以关注的目光。

和王忠义先生结识，缘于他的诗作。几年前，他到西安市政协任职，工作之余，爱好并坚持作诗。我陆续收到、编发过他的一些诗作。现在，他将自己多年来成就的作品收做一集，发来让我阅读并作序，使我有了对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全面了解的机会。

先说忠义先生其人，集子中的《六十抒怀》透露出不少信息——

出身农家：“祖籍河南，父辈来陕；颠沛流离，家境贫寒；兄妹六人，生计维艰；父扛长工，母纺棉线；省吃俭用，零钱积攒；供儿念书，播下企盼；盖房制家，成儿姻缘……”妻子是他的同学：“吾妻同窗，求学关山；聪慧贤淑，心底良善；侍奉父母，乡邻夸赞；含辛茹苦，育儿有三；教书育人，桃李满园；助夫从政，廉洁把关……”

特别好学：“学生时代，遭遇内乱；关心‘大事’，‘革命’串连；荒废年华，学疏才浅；有幸从教，手不释卷；教学相长，刻苦钻研；从政历程，学无间断；学中长进，自我锤炼；持之以恒，养成习惯；终生坚持，受益匪浅。”

做人做事，诚如其名：“为人之子，孝敬为先；为人之父，教育儿男；为人之夫，责任承担；为人之友，侠义肝胆；为党工作，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诚信达观；忠厚仁义，广结善缘；知恩图报，当为涌泉；无义之财，拒腐不沾；生活检点，身正影端。……明确目标，坚定信念；勤奋为径，高山勇攀；辛苦作舟，定达彼岸；认真细致，谨慎周全；科学决策，善解疑难；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尽心尽力，倾注血汗；有志事成，业绩彰显。”

那么，诗作如何呢？赏读下来，有三点感受比较深刻——

一是情深。忠义先生写父亲，写母亲，写老家门前的绒花树，写汶川、玉树大地震，写西安最美女孩，写好友小晋……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挚、深切、打动人心的情感。如《难忘那个冬天》，写他上小学的时候，三九严寒，脚被冻烂，疼痛难忍，行动不便，耽误学习，焦虑不安。“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间；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娘用人力车拉着我，到七八里路外的地方，请医生给我把脚看；一路上，娘那瘦小的身躯，拉着车子艰难向前；寒风撩动着她的剪发，额头上渗出粒粒细汗；嘴里还不停地对我说：这个先生看得好，脚好了快去把书念。看着娘费力的样子，听着娘喘气说出的话言；不知是脚疼，还是心酸；只觉得我心里发颤；娘真好！娘就是温暖！！娘就是靠山！！！长大了我也要让你坐人力车，拉娘到集市上转一转……”四十七年后，作者将儿时的诺言化为现实，他不但“让娘坐汽车看祖国的美景河山”，还“陪娘回老家，实现故地重游的心愿”，并且给行走不便的老娘买了轮椅，“推上娘感受春光满园……”娘疼爱儿，儿孝敬娘，娘拉车给儿看脚，儿让娘坐汽车看景，几个细节展现的是母子深情。

二是文朴。忠义先生的诗作文字朴素，没有华丽的辞藻，也少作娇柔的修饰，常用生活中的语言。如《家是自己的天》，写“一位农民工回家过年的心路历程”：“刚进入腊月，就屈指计算；快回家了，再过二十天就是大年；在家未觉家温暖；出门才知在外难；快回家了，那微微颤动的心，每天晚上都会悄悄回到那温馨的港湾；想家的感觉真好！闭目便陶醉，历历浮眼前；进门有妈叫，热饭桌上端……快回家了，每天盼着发工钱；要给娘买包德懋恭的点心，给翠花买条城里女人用的披肩；再给儿子买个双挎肩的书包，我自己嘛，就还是这身老打扮；要攒钱准备盖新房，过两年还要给娘买棺板。真的要回家了！终于熬到了这一天；昨晚激动难入睡，天不亮就赶到了火车站；买票队伍如长龙，广场上黑压压人群一片；心急天冷雪花飘，跺脚裹袄驱严寒；心想只要能上车，站在门口也情愿；平素不会说文话，这时想起一个词——归心似箭！”回到家后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母亲拉住我的手，端详了一遍又一遍”；“翠花不作声，忙把饭菜端；不住打量我，两眼泪花含”；“儿子一进门，扑到我跟前；问我去哪，现在才回还……”此情此景，使这位农民工兄弟，不禁“心激动，手发颤，两行热泪挂腮边；走南闯北去打拼，酸辣苦甜都尝遍；世态炎凉多感受，只有家，才是自己的天！”谁说

诗言得华丽？谁说写诗非得用典？谁说家常话不能入诗？看看“进门有妈叫，热饭桌上端”，再读读“翠花不作声，忙把饭菜端”，还有“我自己嘛，就还是这身老打扮”，朴素，直白，但很有味道！

三是有哲理。忠义先生好学习，好学习的人一般都好思考，面对生活万象，好思考的人常常会有独到的发现。把这些独到的发现写到诗里，这诗就有了哲理性。如《情人节随想》：“有情何必要过节，过节未必真有情；玫瑰只是花一束，布衣淡饭情义重。”如《虚荣》：“用漂亮的脸谱，掩饰丑陋的面容；用炫彩的光环，满足自欺欺人的心灵；把独木说成森林，把瞬间说成永恒；把湖泊里漂荡的一叶小舟，说成是巨轮在大海里航行……”这些诗句，给人以回味、以启迪、以参照、以警惕。相信写这些诗句的时候，作者的脑海里，不仅有形象的感性的思维在活跃，还有抽象的理性的思维在飞扬。

忠义先生长期供职于行政岗位，作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学养，一个人的境界，既可以表现在他的主业上，也可以表现在他的业余爱好上，而在业余爱好上，往往表现得更直接、更充分。业余爱好五花八门了，比如书画，比如收藏，比如歌唱，比如垂钓，比如赌博……而作诗，似乎更有韵致些，也更费神些，遣词造句，琢磨推敲，“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没有热情、专注和毅力，往往坚持不下来。忠义先生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了成绩。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愿忠义先生再接再厉，桑榆非晚，扶摇可接，骊骐腾骧，彩霞漫天。

是为序。

（刊于《西安日报》2013年7月11日。《心语》，西安出版社2013年版）

# 生命的体验、书写与歌唱

## ——序朱金华《石尚斋散记》

我将手头忙着的事情放下来，开始阅读朱金华留下的厚厚的一沓题为《石尚斋散记》的书稿。做了几十年编辑，养成了看稿子就想改错别字且眼睛特别尖的习惯，而这部书稿的错别字是很少的。在我的经验里，由一篇文章的错别字多少，就能大体了解此文作者的写作功力如何。错别字多，说明其功底尚差，而且对文字敬重得不够。在我看来，对文字，尤其是对来自于大自然，有生命、有灵性的中国汉字，是需要特别敬重的。作为一个行走在中华大地上的书写者，如果对汉字没有起码的敬重，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或书法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朱金华是敬重文字的，这让我心生好感。

于是，我随着朱金华流畅、跳跃的文字，到故乡的荒地里拾地软，到商南的滔河中捡奇石，到镇街的餐馆里寻杂烩汤，到凤冠山下拜谒四皓墓，到闯王寨吊英雄赏楹联；也随着朱金华放眼的视野、涉远的脚步，出商山、游关中、越潼关，到法门寺拜佛祖，到壶口看瀑布，到兰州夜走中山桥，到辽宁激情葫芦岛，到武当礼敬真武帝，到贵州苗寨吃腊肉、喝米酒，到南京中山陵领略钟山风雨体会“天下为公”；当然，也免不了去电影院里观看《袁隆平》《钱学森》，到师友居处说书道、论杂志、吟诗文、言根雕……

书稿含纪实、抒情、言志、游记、评论等等，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语言是灵动多姿的，丰富多彩、灵动多姿的篇章中，写民俗、写亲情、写自我的段落尤其令我看好。

且看“包谷酒”：“寒冬腊月，家家户户沤酒糟，架天锅烧起了包谷酒。门前路过，被热情的山民拉扯进土屋疙瘩火炉旁，在流淌的酒糟里接一茶缸冒着热气的包谷酒，那醇香，那绵甜足可让人心醉，一缸下肚，浑身燥热，有些语无伦次起来。”（《那湾河水》）包谷酒我是喝过的，那味道，你在市面上销售的任何名酒

里是喝不到的。朱金华的描写，使我产生了争取哪天随金华进商洛山，如此这般地喝一回包谷酒的念头。

再看“担担面”：“一根面条长丈余，盘在大海碗里，经过两只瓷碗，一只碗里盛酱油葱花蒜泥，一只装着米醋香菜。吃家坐在方桌尽头，一吸面条，那根长面便摇摇摆摆经两个碗里的佐料调和而来，喷香可口……”（《永远的石板屋》）这是何等豪迈的吃法啊，真想有机会也这么吃一次。据我所知，担担面本是蜀地民间的风味小吃，其得名是因为过去这种面常由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而朱金华笔下的陕西商南县的“担担面”，是因“担”在两只调料碗上而得名。这样的“担担面”、这样的吃法，《舌尖上的中国》没有抓拍列入，实在是遗憾了。又想，若是哪位眼力不凡的美食经营者，将此面开发、引进于西安、北京等大城市，其生意之好，不难想象！

亲情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本乎天然的人类情感。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就是讲伦理的亲情文化。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渗入骨髓血脉的亲情文化将伴你终生。

《石尚斋散记》中写父亲的文字不多，但还是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一位个头一米八五、算盘打得很好、写一手潇洒毛笔字（这当是朱金华成为书法家的一个因素）、背着黄挎包走遍山乡沟沟岔岔，一丝不苟地为百姓服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的信用社干部。有这样的父亲，儿子的上进、勤奋、敬业就有了风范遗传的根据。

书稿中涉及母亲的文字有好几篇，由母亲的争气好强、勤劳能干、俭朴持家，写到骨折住院、拒绝输液、痛苦离世。其中写“有一次在路上遇见老师，我手插在裤兜跟老师说话，母亲瞥见，上来就是一顿爆栗……边打骂边斥责平时是怎样教你的，哪有手插在裤兜里跟尊长说话的”，看到这个细节，这位母亲的音容神态如在眼前。其粗暴动作的背后，是自古相传的尊师重礼的习俗，和千千万万个中国母亲共同具有的“望子成龙”的期盼。

与小说“我写”有别，散文有“写我”的特性。“写我”有间接、直接、反讽、自嘲等等方法。《兰州行》里，有这样的句子：“她从远方而来，流经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就像我这个过客，虽然没有给这里留下精彩，却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有了这段铺垫的厚实，将会走向更远……”这是与黄河互比了。《给



生命一个高度》里，他提出要有梅的风骨、竹的气节、松的精神，从而“给生命一个高度”。《两条鱼》里，他直言自己最忌讳复杂，“简约才是我追求的美”。《忘了吧》里，他写自己注定是做蜜蜂的奔波命，“好多朋友说挂我字能带来好运气……做生意发财了啦官场上升迁啦，我肯定地说这与我没多大关系……”《朋友刘凤鑫》里，他说自己是个很挑剔的人，“曾有个相交多年能推心置腹说话的朋友，后见他与父母言语冲撞说话生分，一副不肖嘴脸，遂疏于来往”……通过这些文字，朱金华将自己的事业目标、生活样态、做人标准、交友原则等等跃然纸上。

在我原来的印象里，朱金华是一位书法家。他篆刻搞得不错，我常用的印章里，就有他刻的一枚；他的字也写得蛮好，我现在的书房里，就悬挂着我嘱他写的，本人对文学艺术本质的认识：“情之美抒，思之妙达”。在书法上，朱金华主攻行书和隶书，我在研究、写作之余，间或也蘸蘸墨，挥挥笔，喜欢的也是行书和隶书。个人体会是，行书和隶书，学起来都不难，但要写出脱俗的风格和高妙的境界就不易了。行书往往流于飘浮，隶书常常陷入僵板。克服飘浮和僵板的途径之一，是爱好文学，修养心性。说到底，作文和写字，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字的气象格局，与人的品性精神大有关联。现在，通过阅读这部书稿，在我眼里，朱金华不仅是一位“龙飞凤舞”的书法家，还是一位“跃龙看飞”的作家。我相信，凭着这两“家”，朱金华的人生注定是“龙马精神”“龙虎风云”“龙行天下”的。

书稿中，朱金华有写他与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金融能手聚会贵阳时，以一曲《乌苏里江船歌》博得阵阵掌声，又以一首《泪蛋蛋抛撒在沙蒿蒿林》震撼了每个与会者的心灵。是的，生活、生命不仅是用来体验、书写的，还是用来歌唱的。——希望有机会，能听听朱金华的歌声，我相信，那歌声一定是高亢、豪放、荡气回肠、令人难忘的。

是为序。

（2015年1月29日于西安龙凤堂。《石尚斋散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版）

# 朴素，真挚，暖心

## ——序张岩散文集《心河流声》

和张岩相识大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期。一位诗人给我介绍说，供职于西安闹市区某商业单位的张岩，爱好业余写作，已是省级某报社的特约通讯员，常有“社会新闻”之类的稿件见诸报端，偶尔也写些散文、诗歌。慢慢熟了，我陆续收到、编发过他的一些作品。感觉是文字比较质朴，字里行间，流露的是真挚的情感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然而，90 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多年间，我几乎再没看到过他的作品。只听说他受聘在某大型集团公司从事企业内刊的编辑工作。大约几年前吧，我又读到了他通过邮箱发来的稿件。显然，眼界有了拓展，行笔也比以前自如了，在追求鲜活、生动的过程中，透现出一种从容和沉稳的节律。

现在，他将其早期及近年来所发表的散文、随笔、诗歌等七十余篇（首）汇聚一册，发来让我作序，这是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

文集由“故乡情”“父母情”“亲情友情与爱情”“山水情”“早期新闻作品精选”五个板块组成。

人说，“文字的根在故乡”。故乡，既是一个读起来既温暖又让人心疼的词汇，也是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永恒的主题之一。很难想象，倘若把故乡从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截去、把一个作家对故乡的记忆抹去，这个作家还能写出真挚动人、含蕴深厚的作品来。

排在文集第一板块的是“故乡情”。诸篇写故乡的文章，无不倾注了稠酽的感情，作者心中的精神原乡，总还是依附于曾经生长的晋西南故土。怀乡的情绪，萦绕其心头，洋溢其言表，流淌其笔尖。如《难忘故乡》《临猗，我可爱的家乡》《家乡的馍》《故乡的集》《家乡的黄土沟》《家乡的麦秸垛》《老家的土炕》等。阅读这些篇章的时候，我仿佛也走进了他的故乡，感受着他的感受。

文集的第二部分是“父母情”。无论是对父母的怀念，还是对家事的追忆，每一篇都写得情浓意切，感人至深。如《我的母亲》《难忘的纺车声》《没有了母亲》、《父亲和我》等。透过这些描写孝行、表达孝心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孝”，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作者身上的体现。

文集的第三部分是“亲情友情与爱情”。其中不少描写人物的散文，呈现出既平实质朴，又生动有趣的样态。人物的音容笑貌、品格性情，呼之欲出，如到眼前。如《外甥旧事》《我和靖儿》《女儿出嫁》《想你在梦中》《瓜哥其人》《岳母》《外孙女彤彤》等。

文集的第四部分是“山水情”。中国有句老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有心且勤奋的人来说，行路也是读书。在这个板块里，作者将外出旅游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记了下来，写了出来，可谓履痕处处，心花朵朵。如《初见大海》《激上泰山》《拜水都江堰》《情醉三亚》《拜谒中山陵》《入渝识三最》《初识台北》等。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不是经历过所有生活，都能够成为文学作品。只有体验、品味、思考、升华了的生活，才能进入文学的殿堂。张岩在体验生活与磨砺才思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可圈可点。其作品，能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绚烂、生活的美好和人性的纯良，能让读者的心灵得到滋润，情操得到陶冶，品行得到提高。

作者追求以朴素优美的文字阐述情感、张扬个性、思考生命、表达思想。其文字，无无病呻吟，不扭捏作态，娓娓道来又清新流畅，浅显易懂又含情寓思。

文学创作，大家，有大家的风格；业余，有业余的真情。特别是那些每天还要为一家老少的生计而奔波的业余爱好者，他们于忙碌中挤出一些时间作文，抒情，表达意绪，敞亮心扉。这份热爱和执着令人感动。

当你看到这部集子的时候，相信心际会涌上一份温暖的感觉。

俗话说“青年写诗歌，中年写小说，老年写散文”。五十多岁的人，正是好好反思盘点自己一生的时节。我相信，张岩的作品会越写越多、越写越好！

（2015年3月4日于西安龙凤院。《心河流声》，海慧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 尊严的呼唤

## ——读周建顺作品集《关陇风情》

拿到《关陇风情》(三秦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版)后,我抽时间认真地读了。这本书是一本拿起来就想读下去的书。看得出来,作者对描写的对象是熟悉的,写作过程是用了心劲、倾注了感情的,当然,文笔也是老道的、优美的。

全书以串糖葫芦的形式,写了二十个故事,而特别让我看好的,是第四个故事。这篇名为《上元赋》的小说,结构巧妙,故事曲折,语言幽默,人物鲜活,尤其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一个中华文化必须反思、中华民族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人的尊严、公民的尊严问题。

《上元赋》写的是生活在陕西西府陇州山区的,因水土和遗传问题而未能长到正常高度的九位村民,为实现梦想、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高存,高存的梦想是成立一个矮人协会。为此,他向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竟然收到了批复,言可以“来县相商”。于是,高存就率领着八名矮人,由九头大眼驴驮着,兴冲冲地踏上了奔县城之路。我们注意到:是县委书记的批复,使高存的使命感骤然升温、自信心悠然增强。途中,是县委书记的批复,让兽医站站长对高存刮目相看,从而化解了一场因驴而起的民事纠纷;是县委书记的批复,让曾经占过矮人女花便宜的粮站站长,瞬间由耍泼皮转换为送笑脸……

这仅仅是发生在陇州山区高存们身上的故事吗?非也!从古到今,中国出了多少上访者?这些上访者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县委书记批复”之类的东西,从而解决自己遭遇到的不公,讨回一份起码的尊严吗?也不仅仅是那些上访者,生活中,有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得到权势显赫的“贵人”对自己事业的提携、扶助、关照呢?高存的结局是悲剧的:他见到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却对所谓的“批复”矢口否认——原来是秘书误以为书记会同意而代了一回笔。书记不仅否认了“批复”,还气哼哼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不是鱼鳖泛潭!”

这话让高存傻眼、晕倒，回村后一病不起，终以生命相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位县委书记承认这个“批复”，对高存们以关心、以支持，使其梦想得以实现，那么，对高存们而言，可能就开启了人生的光亮之门；而对书记，又会有什么不好呢？然而，可惜，在完全可以举手之劳的时候，这位书记选择了放弃，放弃也就罢了，还恶言贬损。显然，在这位书记眼里，高存们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是一群“泛潭”的“鱼鳖”！可以判断，在书记的下意识里，只有他这个书记，以及与他同级别的、高于他的官们才是有尊严的，而官职比他低的人是没有或少有尊严的，至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矮子高存们，那当然是谈不上尊严的，或者说是没有尊严的。

近年来，我到处讲“尊、爱、利、和”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研究龙道信仰提出的核心理念。与这四个字相对应的是四句话：“尊天尊己尊人、爱天爱己爱人、利天利己利人、和天和己和人”。我将“尊”排在第一位，是觉得中国社会最缺乏、最需要，却也是最难实现的，就是这个“尊”。我讲的“尊”，是对每一位公民生命和人格的最基本、最起码的尊重。

媒体报道过，在国内让观众笑得前仰后翻的赵本山，在美国演出却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对那些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找乐的段子很反感。他们要求赵本山向残疾人道歉，并从此杜绝再拿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人找乐，同时号召中国的艺人们不要再上演对残疾人不尊重的节目。

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就在这个“尊”字上。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后，大家共同面对一个上帝，即所谓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总统和平民站在一个地平线上。他们的问题是往往将个体“尊”得过了头。我们的文化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它使社会秩序而稳定，使我们大家生活在亲情的环绕和抚慰中。然而，伦理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有效地防止“伦理过度”，它促成并维护着宝塔式的等级。于是，多见下对上、民对官尊，不见或少见上对下、官对民尊。这是中国人普遍缺乏尊严感、幸福感的一个根本原因。

如今，到了必须重视“尊”的时候了，什么时候公民们都觉得活得有尊严了，我们的文化就与世界文明接轨了，我们的民族就真正的强大了。

（2014年5月16日于西安龙凤堂）

# 文学作品应追求思想出新

## ——在首届阎良富平作家联谊会暨王书明诗集《漆水叙事》研讨会上的讲话

对阎良区作家协会的事，我比较重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是阎良作协聘的顾问，既然是顾问，在顾得上的情况下，就得问一问。二是我出生在离阎良不远的栎阳镇，对这块土地有与生俱来的感情。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我比较关注；对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也比较关注。

拿到王书明的诗集《漆水叙事》后即开始了阅读，感觉是三句话：内容鲜活多样，语言朴实清新，格调积极向上。从时间上看，作者从远古的黄帝时代写到当下；从空间上看，从农村写到城市，由关中写到了省外；从描写的人事看，有先贤，有英模，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普通老百姓。阅读时，有家乡父老姐妹带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来到你面前之感。语言是朴实的，来自生活，但又是经过选择、打磨的，是艺术的、清新的。这方面，王书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辈农民诗人。诗集的整体格调是与时俱进的、向上向善的，阴暗、灰涩、沮丧、绝望等负面情绪是看不到的。

那么，王书明为什么能写出这些诗歌并结集出版呢？我想了几点：一，他是生活中人。其实，人人都在生活中，但对不搞创作的人而言，生活不具素材性或素材性不强。二，他是生活中的有心人。这个心是诗人之心、艺术之心。有了这颗心，就能使原生态的万象杂陈的生活，变成高于原生态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三，他是积极生活、好学、勤奋的人。积极生活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价值取向。人都是由生到死的，或者说向死而生的，态度积极或消极，状况和效果大不一样。他也好学，读了古今中外不少名家名作。他还勤奋，几十年来，从没有放弃对诗歌、对文学的热爱，总是不停地钻研、琢磨、写作。创作是需要天分和勤奋的，天分强求不来，勤奋却是必须的：你今天写了，世上可能就会多一篇佳作；你今

天不写，那就什么也没有。

今天是研讨，在充分肯定成绩之后，我提两条建设性意见。一是醇发、拓展好作品的效应。诗集中放在首篇位置的叙事长诗《山这边，河那边》就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形象鲜明，故事曲折，矛盾冲突构成了戏剧性。这样的作品就还适合编成戏来演。二是应在作品中追求思想上的突破和出新。思想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思想性的强弱决定着作品震撼力的大小。王书明在《后记》中引用了艾青的话：“最理想的诗，是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现深厚的、博大的思想感情的诗。”艾青自己可以说做到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一生写了很多诗，唯有这一句流传久远。这句诗成为歌曲《致祖国》中的一句。我在加拿大探亲的时候，常反复听这首歌，听得热泪盈眶。于是，我期望，诗人们都能写出这样的诗，就是一句也好。

文学作品要写出思想很不容易。它意味着作者要能够想得到，想到了还要艺术地表达出来，即我讲的“情之美抒，思之妙达”。我有时也写诗，写诗时常琢磨着让诗中有思想、有意涵，从而耐人寻味。比如前些天写落叶的《斑斓》：“不恋枝头舞翩跹，何怨风厉霜雪寒？生来顺天尽心意，拥抱大地亦灿然。”还有5月份写的《过南阳》：“朝辞鹿邑圣哲乡，大道一伸即南阳。呼风唤雨英雄事，沥血呕心救世方。莫叹人间乏伯乐，从来天运助自强。诸葛一卧若不起，可有三国龙凤榜？”其中的“生来顺天尽心意”和“从来天运助自强”就是表达思想的句子。

出新的思想往往就那么一点点。像烧水，火力若差那么一点点，水就不开。《漆水叙事》中有一首《老油坊》，作者详细地描述了轧油的过程和人物的样态，其最后几句是这样的：“轧完油，撇出缸，女的才许进油坊。指头一蘸顺嘴溜，满街巷院都飘香。”这样的结尾应该说已经不错了。但是，若稍作改动，加上一句，效果会更好：“指头一蘸顺嘴溜，满街巷院蜂蝶忙。好油感念砣梁轧，越轧越美油越香！”

（2014年12月9日）

## 简评《天水关》

任何文化都具有地域性，而一个大的地域，总是由若干个小地域组合而成。地理位置、山川风物、气候气温、地形地貌、民族人种、历史沿革、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会使一个地域的文化和另一个地域的文化产生和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考察这些不同，正是文化研究者需要下功夫做的事情，因为它不仅能使我们对一个相对小的地域文化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也会充实和丰富一个大的地域文化的内容，并为认识其他地域性文化提供有益的参照。

中国文化无疑是一座摩天大厦，阎虎林先生做着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造福乡里，功德千秋。一册《天水关》（作家出版社 2003 年版），将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人物钩沉、碑碣刻石、诗词楹联、民间传说等等荟而萃之，使一个地域的文化风貌琳琅纸上，其情，其思，其功，其德，渗溢于字里行间。而且，阎先生是诗人，又是散文家，这便使其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文采焕然，具有了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特色。

（2005 年 7 月 31 日于西安慧雨庐）



## 歌词的修改（三则）

### 1. 《送你一个长安》可以改得更好些

2011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西安世园会）主题歌《送你一个长安》不错，大气，有历史感，但其中几句，若做些推敲修改，效果会更好。

第一段：“送你一个长安，蓝田先祖，半坡炊烟，骊山烽火，天高云淡，沿一路厚重走向久远。”——“骊山烽火”：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失信天下，西周亡国。写诗可以，作为世园会歌词就不合适；而后面的“天高云淡”是虚话，没有实指，与前面的句子不搭配。

此段可改为：“送你一个长安，蓝田先祖，半坡炊烟，泂镐开城，礼乐致善，沿一路厚重走向久远。”——“泂镐开城”：泂镐是西周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安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都城。“礼乐致善”：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对后世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第三段：“送你一个长安，李白杜甫，司马长卷，唐风汉韵，锦绣斑斓，采些许诗意观照明天。”这里把史序搞反了，应该是汉在前、唐在后。

此段可改为：“送你一个长安，司马长卷，李杜诗篇，汉风唐韵，锦绣斑斓，携一派豪迈创造明天。”“携一派豪迈创造明天”，比“采些许诗意观照明天”更能表达“汉唐雄风”对西安人的影响，和当今西安人的精神壮貌；从用词上讲，也与前面的“一路”、后面的“一方”相类。

第四段：“送你一个长安，秦岭昂首，泾渭波澜，灞柳长歌，曲江情缘，掬一城山水洒向人间。”——“秦岭昂首”：“昂首”的“昂”是一个动词，“波澜”的“波”是一个名词，两句放在一起不搭配。“掬一城山水洒向人间”：“一城山水”，西安若以“城”论，可以说是有水无山，山都在城外；而且，水可以洒，

山则不能洒。

此段可改为：“送你一个长安，秦岭龙脉，泾渭波澜，灞柳长歌，曲江情缘，绿一方山水和美人间。”“秦岭龙脉”：秦岭有“华夏龙脉”之称。“绿一方山水和美人间”：原歌词中没有一个绿字，这里用一个，以体现本次世园会“绿色引领时尚”的主题；“和美”是和谐美好之意，乃举办世园会和当今一切工作的目的所在。

（2011年4月30日于西安慧雨庐）

## 2. 昆明池：舰船纵横起“狼烟”？

网上欣赏到薛保勤作词，张朝作曲，韩磊、李思宇演唱的《又见昆明池》，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歌中“曾经汉武训水师，舰船纵横起狼烟”一句中的“狼烟”一词，是否用得妥当？值得商榷。

狼烟，辞典中最初的释意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一般通释为古代边境上出现的用来报告有敌人进犯的烟火信号。以此来看，将“狼烟”用在《又见昆明池》歌词中，就不妥当了：

第一，当年昆明池上的舰船属于汉武帝训练的水师，是汉王朝自己的，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来自边疆敌方进犯的烟火。

第二，昆明池在汉时的上林苑内，如果出现“狼烟”，就表明敌方已经进犯到汉朝都城长安的郊区，大汉的江山危在旦夕了。查汉武帝主政时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第三，古代舰船的基本用材是木头，如果出现“狼烟”，即浓重的烟火，是有可能被烧毁的。

第四，有人或说：“狼烟”后来已经演变为纠纷、争斗的代名词，比如“狼烟四起”“狼烟天下”“惹起某段狼烟”……基本上与狼粪或者烟火没多大关系了。——即使按这个后来的意思，也讲不通：歌词作者希望昆明池上起纠纷、起争斗吗？

（2019年5月31日于西安龙凤院）

### 3. “千年来”还是“远古来”？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首《风从千年来》的MV火遍网络，这首MV在人民日报旗下的视频平台点击量达到了1175.05多万人次，在丝路现场云点击量达到了1188万，在学习强国、视频中国——《云游中国》系列节目第三期、今日头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视频等多家平台发布后成为热搜。据黄陵县委发布的相关数据统计，从5月初发布一个月来，这首MV全网浏览量达到了上亿人次。

报道称，《风从千年来》是一首为华夏儿女谒陵祭祖而创作的歌曲，在黄陵公祭大典线上直播时，曾作为直播节目中的重要环节亮相。这首作品典雅、庄重、大气，既有“庙堂之音”的高雅，又兼“江湖之风”的韵味，再加上由赵季平作曲、薛保勤作词、韩磊演唱，三位文化名人组成的主创阵容也自带流量，一经发布便深受广大网友喜爱。

我上网搜听了这首歌，觉得确实不错。旋律优美，唱得感人。歌词中不乏好句子，如“五千年的翠柏五千年的根，五千年的血脉，五千年的魂”“黄陵啊，一脉相承，华夏同心”……尤其是最后一句“放飞，放飞，放飞中国龙”，使我这个龙文化的长期研究者倍感亲切和振奋！——我想，许许多多龙的传人们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然而，这首歌的名字却引起我思考。“中华文明五千年”，是考古发现、古籍文献和民俗资料足以证明的，包括十多亿中国人在内的许许多多地球人的共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由黄帝开创的，故有“古老中国一条龙，龙的根基在黄陵”之说。“五千年”这三个字也多次出现在这首歌的歌词中，说明主创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清楚、到位的。那么，为什么歌名却讲“风从千年来”呢？“千年来”是什么时候来？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啊，连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都不是！

或许本来是想叫“风从五千年来”的，但觉得有些不顺口，就将“五”字去掉了。可这个“五”字一去，就成“千年”了。“千年”与“五千年”差远了！也许有人会说：“千年”，本来就有时间久远的意思嘛，再说了，唱歌嘛，没必要较真呀。我却觉得，在“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问题上，较较真是必要的。因为，一直有人不认可“中华文明五千年”。20世纪，先是有人提出中华文明只有两千

多年（东周文明说）；后来又有人提出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多年（殷商文明说）；再后来，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坚持说中华文明只有四千年或不到四千年（夏代文明说）。

所以，我建议将歌名《风从千年来》，改为《风从远古来》。

（2020 年 6 月 18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轩辕黄帝手植柏（陕西黄陵轩辕庙）**

## 读书有感（四则）

### 1. 史飞翔：《终南隐士》《追影：真名士自风流》

《终南隐士》（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解析隐士文化；《追影：真名士自风流》（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梳理民国人物：两本书，都是炎炎伏夏中给人带来阵阵清凉的润心之作。在陕西 1970 后作家群中，史飞翔是鲜明的，不靠编排故事吸引读者，不以玩嬉文字招摇过市，史飞翔走的是“学者作家一体化”的路子。在陕西，近百年来，走这条路子的人屈指可数，走得通达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为什么人少呢？因为路难走，你得板凳一坐十年冷，你得三更灯火五更鸡，你得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在一次讲学中，有学生问我怎样才能成功，我回答两句话：做到自己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前者不算难，做到了你就小成功了；后者比较难，做到了你就大成功了。世界如此纷纭，生命如此短暂，能在某个领域攀登到山岭之巅，就有益于世、不枉此生了。成果喜人，功力可赞，当咬牙攒劲，台阶再上。看好史飞翔。

### 2. 于疆：《苏北利亚》

西安报业集团与北美商报社合作，在洛杉矶开“今日西安文化旅游海外推广”研讨会，于疆先生代表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出席，并带来了陕西籍旅美作家刘成章的致贺问候。七十七岁的于先生，开车一个多小时赶来。会上，我赠他拙作《平民世代》《卓立苍茫》，他赠我大作《苏北利亚》（广东花城出版社 2012 年版）。我从归程的飞机上一字一句地读起，到前些天读完。一部饱蘸血泪之作，一部令人心情沉重之作。当年有数十万人被打成右派，而将那段历史写出者并不多，故于疆先生这部书，有“立此存照”的意义。

### 3. 白忠德：《我的秦岭邻居》

和白忠德相识大概在 20 世纪的 90 年代。十多年来我阅读过、编发过他不少稿子，他也请我到他供职的学校讲过写作。在我接触的年轻人中，有人质朴却欠点灵性，有人有灵性却缺了些质朴。白忠德是质朴的，又是有灵性的。古往今来，成功好像比较偏爱那些质朴而有灵性者。白忠德的《我的秦岭邻居》（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版）写秦岭，秦岭的熊猫羚牛金丝猴等等就蹦跳着欢叫着投奔到他的笔下，他写得神采飞扬，写得津津有味，写得一往情深。我曾多次鼓励他，说你生于秦岭长于秦岭，现在又以秦岭为根据地和写作对象，这样的选择是很好的，因为秦岭太值得、太需要人来写了。而且，有定位地专注地写比东一棒子西一榔头地写更能够写出特色，就这么写下去，质朴而灵性地写下去，写到一定程度，不成功就由不得你了。

### 4. 曹军华：《雅玩润心：我的收藏故事》

获赠曹军华先生新书《雅玩润心：我的收藏故事》（古吴轩出版社 2014 年版），逐页阅览，只觉图文养眼、雅气若兰，不禁陶陶然。书名中的“雅玩”二字，耐人琢磨。我想，这“雅玩”是一种层次，也是一种境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实现和到达的。你得有“雅心”，还得有“雅兴”“雅情”“雅趣”“雅学”“雅资”“雅伴”等等。人在世，一活物质，二活精神，这“活精神”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雅”了。军华已然活到了“雅”的份上，值得点赞。

（2014 年 10 月 6 日于西安龙凤院）

## 发现的锐目

文学，或者说创造意义上的发现并不是简单的看见。发现不光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更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积淀。就像熟透的果子从枝头坠落，看见这现象的人多了，但由此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只是牛顿一个人。

陆续地收到了临潼几位作者的稿件，在编稿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上面一段话。

黄伟兴是《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老作者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日报晚报上发稿，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他两年前发表于《西安日报》的散文《呼唤》（获陕西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就让我们领略了他所具有的那双发现的锐目，这篇《虔诚》的短文，同样体现了他发现的特长。能够从当下农村中看似平淡的一件事上，“发现”现存于农村社会中那种几近触目惊心的愚昧，并由此而引发他对宗教迷信与信仰的深层次思考，这确实是需要有一双锐目的。看完这篇短文，我们或许还会想到，解决农村目前的贫困问题，解决农民问题，似乎并不应该停留在物质的层面。《风雨中的宽容》描述的应该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了，但作者的着眼点显然并不在惊心动魄上面。让作者感动的，或者说作者透过这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所发现的，是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一种交流，一种融合。而让人觉得特别高兴的是，罗锦高的这种发现，正是建立在他久已有之的对人，对动物，对整个自然的人文思考和终极关怀上的。或许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或许是由于性别的关系，张惠梅的《给竹子喝阳光》就轻快得多了，明亮得多了。对美的敬畏，对美的热爱，对美的赞赏让作者既发现了“所有人对花儿都面露笑容”，也发现了“所有的美都和阳光有关，也和善良有关”……细腻的感觉与睿智的语言同样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发现。

发现让文学增色，思想让目光明亮！

（刊于《西安日报》2004年6月9日）

## 文载以碑 木秀于林

西安碑林博物馆南墙宋槐下镌着两个楷书大字：“文庙”。两字雍容稳凝，庄肃端雅，任谁走到这里，眼里心里都要沉顿一下。在中国古代，无论官民朝野，士农工商，文庙都是要去朝拜的地方，尤其是以功名晋身的士大夫阶层，文庙更是文宗所在。虽说思想和文化多元了，可对中国人来说，其知行之主脉，还是孔孟之儒，加老庄之道，以此冲衍开去，构成了两千多年华夏文化之长河。这长河，流在人们的血管里，流在卷帙浩瀚的典籍中，也流在那一排排、一幢幢耸立的青石碑碣上。如今，继续奔流的长河纳汇新潮，催化枯腐，激荡在时下人们或忙或闲的生活中，摇曳在缤纷多姿的影视盘碟中，当然，也会凝冻在一方方新刻的碑石上。

韩健畅是《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的老作者。他的写作起步较早，出版过散文集，同时也是一个赅博的嗜书人，学养深厚，其文字典雅温婉，有时笔挟风霜，然于风霜中时现绵邈幽远悱恻之情。《骊歌书院门》不只是对破坏的批判，还有对破坏者的哀怒交织的悲悯。周琦以巧妙的构思讲了一个有中国传统特色和心理症结的涉贪故事，兜底时才将核桃枣一倒而出。药石针砭，此类文字对眼下的社会不可或缺。《升华不得》是韩移秋将历史和现实打捆思考，意韵深厚中含节制的讽刺。马千里的诗一直波澜不兴，然最后一行如奇峰突起，弦外之音，听者会心。

将碑林区几位业余作者的来稿编讫，我的眼眸又落到了“碑林”两个字上。是的，文是可以碑载的，反过来说，凡载着，白纸黑字，都有碑的意义；而成才之木，来自林，又秀于林。于是，我想到了“文载以碑 木秀于林”八个字，以期与几位作者及读者们共勉。

（刊于《西安日报》2004年7月14日）



## 美莲出湖

要说西安各区县的名称，最有诗意者当数“莲湖”。一汪平静的湖面，簇簇挺挺地长出一片莲来。碧绿的叶儿圆圆如盘，雨滴儿落到上面，一瞬间就滚成了珍珠。那花儿，红白相间，粉嘟嘟，嫩生生，让你想到怀抱中的婴儿。是的，湖是因莲而美的——要是没有莲，那还叫湖吗？

本期副刊选编了莲湖区几位业余作者的作品：杜书文的《溪儿湾的故事》，写了个名叫旺泉的是好人为乡亲们打井的好事。这样的好人好事，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褒扬的，因为它体现着人间特别美好的情怀和境界。李秀山的《感受西安“地摊戏”》写出了“我”对秦腔的痴迷，字里行间，流露着浓郁的秦风秦韵，其中为看戏和孩子“捉迷藏”一节，尤其令人心动。亦杰的《世象顿悟录》和刘公望的《排箫之慰》，一个犀利，一个飘逸，都堪称心力之作。

几位作者勤奋于生活之“湖”，那么，写出更好的如莲的美文，便是我们的期待。

（刊于《西安日报》2004年8月25日）



## 银户县 文户县

所谓“金周至，银户县”，是说这两个县，乃关中的膏腴之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都是天生的福人。不过，我觉得，户县还可以称作“文户县”，这个“文”，当然是文化的“文”、文明的“文”、文墨的“文”。宋代时，户县出了“关中第一状元”杨励；金朝时，王重阳在户县创立了全真道；明代的文学家、“前七子”之一的王九思是户县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户县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叫杨伟名；还有户县农民画，更是蜚声海内外。

户县也是出作家的地方，我的书架上就收藏着赵丰、杨涛、孙立新、韩健畅、杨照林等户县籍作家的多部作品。本期副刊特别推出户县文学创作专刊：《在大地的屏风上·城隍》，将审美的目光投注于关中民俗，着力揭示“乡民们对于土地和城隍的情感谜底”；《画家十爷》生动地将一位农民画家的性情风采、艺德美愿跃然纸上；《月梦》写得很美，一片诗情画意；《节水》撷取生活的几个细节，读来让人会心，也显示了作家刻划人物的功力。

（刊于《西安日报》2005年1月26日）



## 江文湛和他的红草山庄

暮夏时节，江文湛先生和夫人程岱女士邀我去看他们的红草山庄。面包车过皂水桥，入泮峪口，沿着清亮欢悦的泮峪河蜿蜒而上，走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拐进公路边的一个山坳里，说，就在这儿。

坳子有篮球场大小，两边青山夹持，一道白流从凸崖上溅落，唰唰声响。瀑下聚水成潭，潭水清冽，底石毕见。“这水叫小红草河，这潭就是艳妃池。”老江兴兴地介绍说：这里是长安县喂子坪乡的辖区。相传古代有一个艳妃，在宫廷倾轧、危及性命的情况下抱子出走，在这儿洗了脚，将孩子委托给山上的老百姓后削发为尼。瞧，大门南侧那块大青石，就是“搂子石”。

从搂子石斜对面的台级旋登至崖顶，另一番天地便豁露在眼前。但见马尾松青翠，银柳婆娑，茂密的灌木丛几乎封盖了小红草河，五颜六色的山花儿就星星点点地烂漫开来，引逗得蜂蝶辈尽作颠狂状。——这是一片相对开阔，又悄然隐蔽的山窝地，站在崖下路边，竟不察其里。

江文湛首先要在这里造就的，是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艺术中心。两层，下面是一百多平方米的多功能展厅，将经常性地陈列展示画家们的新作精品；上面是五套带卫生间的客房，供山庄内外的朋友们聚会时休憩，平日则以优惠的价格，向有造诣的文化人出租。

艺术中心后面，散落在小红草河两岸山坡上的，是五栋或六栋单体建筑。或小楼，或平房，式样不等，因地制宜，由入庄的各位画家自行去设计。江文湛自己，则准备就地取材，墙用山石错落落地垒起，间饰粉白，上覆红瓦；内装修以一件原始彩陶为中心铺展开来：从内到外都透逸出一种古朴旷达的山林味。

除此之外，还要起一座小凉亭，供大家闲暇时下棋聊天；小红草河上，架几处带皮的木排桥；再将河水拦一拦，便是天然的游泳池，大人小孩都可以尽情地踏浪嬉水。再植一丛修竹，栽一片云杏；芜杂清除了，引进新花种；保留野山楂、

野葡萄、野花椒、猕猴桃、五味子，等等。春天，在五颜六色的鲜花丛中徜徉；夏天，躺在小河边浓阴下，听林涛，闻蝉鸣；秋天有赏不尽的漫山红叶；到了冬天，折几枝毛茸茸的缀着银灰色小花苞的银柳条，做个插瓶，然后去踏雪访梅……

多么令人向往的环境！难怪老江谈起山庄的蓝图时，总是眉飞色舞，兴奋的程度不亚于即将完成一幅丹青佳构。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国画院副院长，江文湛现在的住房应当说已经不错了，但他就是不满足。“回归大自然！”他神色坚定地道，“现代文明为我们提供了种种享受，却也给我们带来了种种危害，污水废气乱排乱放，城市污染日甚一日。就说西安美院旁边那条小溪吧，20世纪5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虾蟹游鱼，而现在，全然一条臭水沟。再者，大自然是艺术的母亲和源泉，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更容易生发灵感。”

江文湛是一个耽于构想，又躬于实践的人。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他和他的同盟赴济南，下杭州，去深圳，到全国好几个地方反复考察，最后，“野马归栏”，选定了长安城南，秦岭北麓这个十亩方圆的小山谷。这里处于沣峪森林公园域内，周围峰峦逶迤，林木苍翠，风光秀美，有净业寺、观音山、九龙潭等名胜景观。更重要的是，长安县政府思想开放，卓识远见，吸引文化人开发旅游业，使喂子坪乡从艳妃池到玉皇苑这最精彩的一段，成为一个前景无量的旅游小区。当然，老江和他的同盟们也付出了辛苦和汗水，自筹资金，多方协调，跑了好多路，画了不少礼品画，用整整一天时间，为当地老乡写春联……

在中国画坛，江文湛是很有影响的大手笔。他的写意花鸟顺情适性，随机和缘，淋漓渲润，蹀然泼洒，均扔却负担，出神入化——以其新异不群之形，丰赡多义之涵，为海内外欣赏者和收藏家所喜爱。他的画潇洒，人也活得潇洒，是一位被贾平凹称为能够“潇洒走俗尘”的艺术家。

现在，这位已知了“天命”的艺术家又要干一件潇洒事了：不花国家一分钱，创建一座集创作、修养、娱乐、交流探讨于一体的文化山庄。在我们这样的国度，此举是颇具理想色彩的，它既是一个开拓性颇强的“大写意”，是艺术家和大自然之间的一次“本质对象化”；又是江文湛“地球村意识”的一次小实验——相信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尽管老江和他的同盟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11月18日）

# 画出精神的骨

## ——读阮班超虎画

我曾经觉悟到：写文章其实是写自己。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诗歌也好，从特定的角度看，都是写自己；写农村，写城市，写别人，从特定的角度看，也都是写自己。自观赏了阮氏班超的画虎作品后，我的看法又有了拓展：画画也是画自己，不管你是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也不管你是画国画，画油画，画版画，从特定的角度看，画的都是你自己。

从班超笔下跑出来的老虎，就是班超自己。

且看这幅《西北望》：两虎高立峻崖，身后松石叠翠，目前云水苍茫；一虎，头低俯，口大张，牙白舌红，似要撕噬咬碎这混沌的世界；一虎，头高扬，目瞪望，似在问：此山何高？彼天何远？乡关何处？梦醒何方？……再看这幅《双雄破雾》：硕硕两个虎头，迎面向你逼近，体毛向后靡，眼睛向前看，那眸子处眼眶上沿，以绿、黄、灰、黑、白的层次，凝视着你，击穿着你。还有这幅《天平》：一包头、屈身、持桨的艄公和一对母子虎同处冰天雪地之中，子虎偎母而亲，母虎开颜嘶笑，艄公袖手而思。作者题道：“天道是枰，冥冥是明，智者不厚，富者不盈，恶者难久，善者平平，高者垂危，卑者永宁，慧者尊之，狡者求幸，岂只人世，物象皆同。”……

显然，自然界里的日渐稀罕的百兽之王，到了班超的画笔之下，就既是虎，又不是虎了。说是虎，是说它具备了虎的逼真的活灵活现的身形体态；说不是虎，是说它的形象里有自然虎之外的人，有人的思、情、肝胆、魂魄、甘苦、祈愿等等。换句话说，就是阮氏班超将自己的人格品位、精神境界，借虎的形象艺术地、审美地表达了出来。这品位，这境界，非几十年勤学苦修、孜孜求索而不能臻，没有对社会、对人生、对大千世界的深沉的爱恋、独到的体验和灵性颖达的感悟而不能臻。

谚曰“画虎画皮难画骨”。我理解，这个骨，既是有形的物质的骨，又是无形的精神的骨。能将虎之毛皮画得蛮像回事的画家不能说少；既能画出虎皮，又能画出虎骨的画家不能说多；能画出虎的有形的物质的骨，又能画出虎的无形的精神的骨的画家，就堪称高手妙擘稀乎一见了。

班超画出了无形的精神的骨。

在班超的虎画中，表达无形的精神的骨的最佳位置不在虎身、虎皮，更不在虎腿、虎尾，而在虎头，尤其是虎眼。班超是画了三十年人物画后才画虎的。在他的人物画中，有一幅《梁淑溟先生像》最为人称道，也最为他珍爱。画面上的老先生，瓜皮帽，对襟衫，坐藤椅，依竹林，白须雪发，哲人睿态，尤其是那镜片之后的眼睛，有穿迷雾、决浮云之力，简直“跟刀子一个样”。

我读班超虎画，发现了好多双这样的眼睛。

(2002年3月13日夜深沉，作于慧雨庐；刊于《西安晚报》2002年4月26日)



班超虎画

## 虎来庐中

我的“慧雨庐”里来了五只老虎。站着两只：一只双目圆睁，直瞪瞪地看着我，似乎在说：久违了，朋友！一只微微抬头，斜眺远方，眼神高贵而抑郁，像一个忧国忧民的行吟诗人。卧着两只：一只侧身，用前爪刨抠着鼻头，似乎在检测自己的嗅觉；一只伸肢正伏，神态沉静而安详，像作思考状的大学教授。还有一只，凑到溪边喝水，伸出红红的舌头，那细细的白胡须似乎已触及到了水面。伴随它们的，是苍松翠枝伸，赭石红叶生。远处隐见群山起伏，瀑布奔流。

自然界里的老虎已经稀少到屈指可数的程度了，造访我的，当然是一幅画，而且是一幅内画。内画起初是在鼻烟壶里画的，现在已发展到在水晶球里作画了。水晶球大而圆，比鼻烟壶更具立体感，置一个底座，在灯下转动着欣赏。左旋右转，上俯下仰，眼球青睐圆球，圆球滋养眼球，方知晶莹剔透、精美玲珑是怎么回事。——艺术假以别致的料器，对艺术而言是彩云托月明，对料器而言是凡鸟变凤凰。

我收藏了这件题为《五虎图》的内画艺术品，将其摆在案头，让其与现代化的液晶电脑显示屏为邻，倒也一方一圆，有动有静，虎视眈眈，意趣横生。前天来了一位懂画的朋友，转来旋去地欣赏了一番，看到了艺术家的署名，问我这个尹文辉是哪人，我说河北饶阳人，“清末有个名画家叫尹少泉，马画得特别好……”朋友说。我说尹少泉正是这个尹文辉的先祖。朋友叹了一口气“怪道哩”，又说，“多少人正面画都画不好，这内画得把笔伸到里面反着画，还画得这么精致、细腻、传神，很不容易。”

由此，我们讨论起人生的价值来。我说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干事的，有人干大事，如秦始皇修长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布什对伊拉克动武；有人干小事，如你我写文章，尹先生画内画。大事未必都是值得做的事，小事未必就是不值得做的价值不大的事。仔细考察，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大事，往往缘于一个小心

眼，而且往往遗害无穷，至少利弊同生；而我们做的这些小事呢，且不说牵连到多么伟大的主题，至少是以给世间增添些许真善和美好为目的。就说尹先生吧，他把自己的学养、智慧、灵巧、耐心和毅力变成了像《五虎图》这样的艺术品，看着眼前的图画，你自然会想到濒临灭绝的动物，想到脆弱的地球生态，想到人类的美妙不美妙还很难说的未来。即使想不到那么远，你也会觉得挺好看——能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使人，使许多人，在生活中不断地感受到了美，这价值，应该说已经不小了呢。

（刊于《西安航专报》2004年11月30日、《陕西日报》2004年12月5日）





## 李敬寅的“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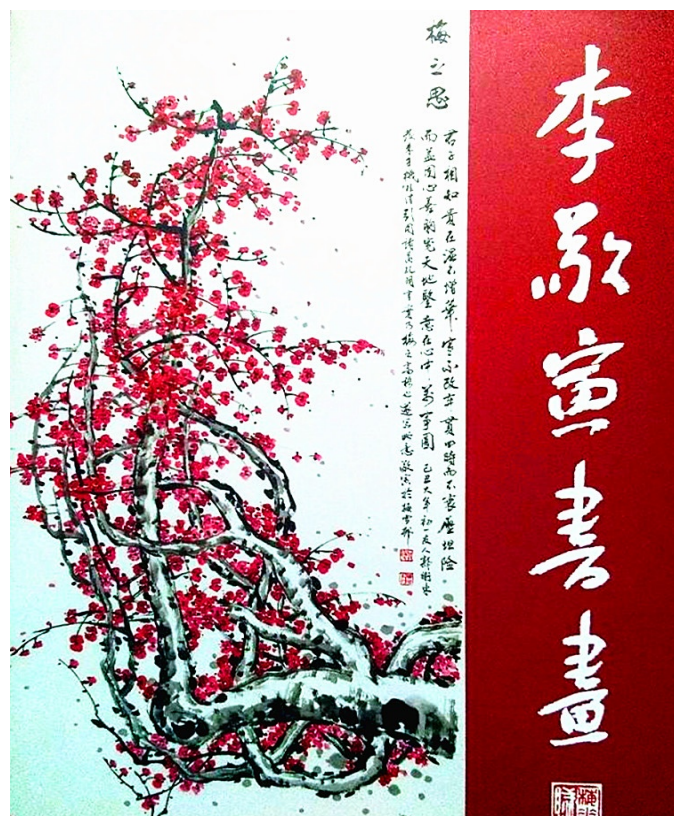
“李敬寅的梅气势大了。”——国庆期间，去碑林博物馆浏览“各界名流书法绘画篆刻邀请展”，一幅一幅地欣赏下来，敬寅先生的《梅花六条屏》就成阵列地喷薄在眼前了，我不禁双眸一亮，颌首击掌地叹了一句。

首屏是一丛“绿梅”，枝条勃发，花瓣茂茂。看那氤氲升腾的团团绿意，我不禁心生疑惑：有瓣儿泛绿的梅花吗？待看了作者的题诗，才恍然理解：“昨夜梦中降大雪，漫天玉龙无声落。一觉醒来东风舞，万树梅花醉诗魔。”噢，原来是“诗魔”醉写“梅花梦”了。梅是“东风第一枝”，绿色的春天在梅花的呼唤中姗姗而来。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红梅黄梅，还是粉梅白梅，都该隐含一番绿意了。敬寅先生用他的妙笔将隐含之意外化，盎盎然一幅唤春图了。次屏是一丛黄梅，繁繁洒洒，煌煌簇簇，真是“春风生渭水，洒金染梅枝；雪夜散清香，疑是菊艳时”。最醒目，也最能使人产生联想的还是第三屏，“灿若赤城霞光色”的红梅。望着那由点点斑斑而团团而燎原的殷红，我想到了太阳，想到了鲜血，想到了如旗的生命，想到了“红岩上红梅开”，想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

梅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特别的象征意味。它不畏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傲然开放，所谓“梅花欢喜漫天雪”“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它未叶先花，最早预报春的到来，所谓“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它天性纯洁，默输暗香，所谓“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这些内涵，我们在敬寅先生的梅画中再再地领略了，在他的题画诗中也读到了：“平生最爱是梅花，亦喜大雪纷纷下；风雪交加傲岸立，万树新蕾迎春发。”“长安城南梅雪村，玉树作骨冰为魂。”——“梅雪村”是他的书斋画室名了。不仅如此，我觉得上述之外，敬寅先生还画出了梅的大气，这种大气无疑是蓬勃向上与团结凝聚的结合。梅枝疏瘦横斜，要画出蓬勃向上的力量，实属不易；梅花俏小玲珑，其画历来孤芳自赏者多，团结凝聚者少，敬寅先生却将其画得万众一心，尤为难得。

我和敬寅先生曾是同事。十五年前我开始做副刊编辑的时候，敬寅先生已在西安晚报文艺部工作多年了。他敬业，勤奋，思路敏捷，下笔凌厉，出活快捷，且多才多艺。编稿写稿之余，常见他挥洒笔墨，铺染丹青。字是楷隶行都写，尤擅行书，铁划钢角，颇有劲道。画便是梅了，是那种“干枝梅”，一段横斜而来的老枝，点缀些许红艳。后来他调到了领导机关，见面自然少了，书法作品倒是时不时地在这儿那儿看到；画却见得希罕，这大概也是这次他的梅花让我特别震动的一个原因吧。我想，书画界和众多的欣赏、收藏者有谁谁谁的“牡丹”、谁谁谁的“月季”，谁谁谁的“荷花”，以及谁谁谁的“马”、谁谁谁的“鹰”之说，那么，我相信，一个现象将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便是李敬寅的“梅”。

（刊于《艺园》1999年第2期、《西安日报》1999年10月25日、《文艺报》1999年11月4日、《西北电力报》1999年11月18日、《陕西日报》1999年12月27日、《延河》2000年第2期）



## 苦之美

去年你在“省博”举办“石头娃现代山水画展”的时候，我因事未能去。好在请柬及册页上有你的简介、自白、感觉录和十多幅画作，使我大略地了解了你这些年创作的情况和达到的高度。对画作的欣赏，我至今依然是业余水平，常常是感觉不错，却不能清晰透彻地说出好在哪儿来。当然我还是被震动了，是读到你在《感觉录》中说出的“苦美”两个字时，我的心弦为之一震。

人世多苦的说法已有很多了，比较全面和经典的要数佛教“八苦”的概括吧。如何走出苦海呢，宗教家让人去信神，哲学家让人去悟道，一般老百姓也常常互相勉励“想开些”。大概惟有艺术家或身具艺术素质的人，才能想到把“苦”和“造美”“审美”连在一起。记得多年前我在赠友人的一首诗中，曾写过“且把平生血和泪，化作美酒杯连杯”的话，有点“苦美”意思，但没有你表述得这么简捷、这么醒目。

我知道，“苦美”的提出，是以你的人生体验为基础的，是你身世的写照。“文革”开始时，十几岁的你成了受人欺凌的“狗崽子”，接着是下乡、当民工，累得患上了“伤寒”，十多天高烧不退，命虽没有丢，记忆力却大减。之后，有当兵的机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却都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告吹。进入美术界后，你也曾因没有科班学历，工资不得升，职称未得评，房子分不到……

你的艺术之梦是与生俱来的，苦伴随着你，美也伴随着你。无论是做“狗崽子”，还是下乡当民工、进厂做工人，再苦再累，你都没有放弃你的五彩之梦，一有时间，你都要拿起你的画笔。那段时间，一家三口，住九平方米，你常常等到孩子和妻子入睡后，用被子将他们娘俩卷到一边，为的是腾出半个床来画你的作品……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你已成为颇有名气的美术家，你的山水画在国内外的艺术大展中屡屡获奖，且被几十种出版物收录；你的看家本领——书画鉴赏，已

步入明眸慧眼的佳境，且由此而进，又跨入了文物鉴赏家的行列。高级职称被破格评聘，客座教授、名誉院长、大赛评委等等也接踵而来；住房宽展了，孩子长大了，一切的一切都好多了——

但另一种苦又缠上了你。

前几天我去你那里，见你的柜架上大包小包地放着“舒降之”“脂必妥”“脉利通”及“丹参”“天麻”等药品。你说你自从去年办完展览后，病痛就上身了。过去总是忙，不在意，待有了感觉，一查就重了。颈椎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犯来了头晕得不能走路。四肢供血不足，有的地方肌肉坏死，裂出大口子；那腿一旦麻起来，用刀子割一块都没感觉。药是一天都不能停的，一停就撑不住了。

我说，你才五十岁出头啊，身体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呢？

你说，青少年时期，把自己给得太扎了。

说话间，你把一卷画从里屋抱到厅里，展开来让我一幅一幅地欣赏。这是一组题为《屋檐下》的系列作品。画面主图皆为深山老林中的破败房屋，有篱墙排立，有杂树交错，间或挂一件衣服，蹲一只黑狗。看上去有些深，有些沉，有些满，也有些乱。你说你描绘的是秦岭的一个角落，力图画出苍老雄健之美，表现出贫瘠、清苦、凄凉及呐喊之感。你还说你追求的是对传统的新理解，是用中西碰撞、融合（借鉴西方的设计、构图理论）的方式，从中国人本真的东西中寻找当代性……

然而，我想到的还是“苦美”。我觉得，你这一批画，表现的是更大范围的“苦美”，是用“美”的形式，观照和反映更普遍、更底层、更值得关怀和眷顾的生存。这说明，你已经把自己这株“苦美”之树植入了莽莽苍苍的“苦美”之林，你已经把自己这眼“苦美”之泉和大众的，乃至整个人类的体验之海注溶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上升了。这样的上升是不易的，按你的话说，要有比较清楚的理性把握，要有扎实全面的基本功，要有敏锐独到的感悟能力，还要不断地借鉴、学习，补充自己、突破自己，当然了，受罪的准备、奉献的准备是不可缺的，这或许更要紧。

有了美，苦就降低它的烈度，就可以转化和升华。这是我和艺术家们交流时的鲜明体会。同样的感觉也出现在你这里。一说起艺术，一进入你的美的领域，

你就两眼放光，眉飞色舞，似乎那些病痛、诸多烦恼都甩到月亮上去了。你给我讲你的画稿，说你的即将出版的名为《文物“高仿”辨伪》的论著，谈刘骁纯、郎绍君、李松、邵大箴等人多年来对你的关注，还说你要盖一座自己的美术馆，那当是用“石头娃”三个字组成的建筑群，青瓦白墙，民间风格，将绘画、雕塑、陈列、文物鉴赏、教学等等融为一体……我说你这是由“苦美”到“乐美”了。

是啊，对艺术家而言，“苦美”是与生俱来、无法回避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未必人人都能到达的境界呢。但人活一世，总还要从“苦美”的大地，跳到“乐美”的舞台上蹦几蹦啊，尽管就艺术品而言，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似乎惟有“苦美”，更能击中人心。

（刊于《西安日报》2002年11月18日）



石头娃作品

# 活在艺术中

## ——序韩靖《图说武则天，乾陵》

展读韩靖的书稿我心情很好。一场骤雨掠过，西安的天空出现了少有的湛蓝和纯净，朗朗的阳光在楼墙上快乐地跳跃。我一图一文地朝下看，看着看着，就不禁为韩靖的剪纸艺术而拍案称奇了。瞧，这位相貌姣美的武媚娘，两耳俏作风，腴体弯成龙，胸腰间的大莲灼灼盛开；那骑在烈马背上的武才人，竟是一手刀、一手锤，一手鞭，三臂同出；而那威仪万方的则天大帝则和横空而来的白马寺僧双口合一，光头与凤首连作并蒂的红果儿；还有翁仲肃穆、翼马精神、线画有韵、奇碑无字……是的，韩靖是灵慧的，灵慧的韩靖凭借通神的心窍和魔幻般的巧手，将千年前的大唐烟云化作奇谲瑰丽的艺术。这艺术是常变结合、虚实相生的，也是张弛协调、静动自如的。

于是，我想到了韩靖脚下那块深厚的土地。那土地是博大的、神奇的，它能生长波澜壮阔的盛唐文化，能生长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也能生长像韩靖这样的资质聪颖、勤奋上进从而潜力无穷的艺术家的。

我还想，人活一世，温饱之外，总是要找点事做的。或角逐于官场，或搏击于商海，或放浪于灯红酒绿……生活在中国西部的一位名叫韩靖的年轻人却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艺术。艺术是无顶之山无边之海，是苦乐相伴、纠生缠死的营生，它能使有限的生命升华到无限的时空。所以我想说：活在艺术中的韩靖是有福的，福分不浅呢。

（辛巳初秋于西安慧雨庐；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11月13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钩沉为友——怀念吴三大先生

吴三大先生字写得好，象棋也下得不错，出子凌厉，常走出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妙着。

那年陕西省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下基层采风，出发之前，我们在一家宾馆的大厅里交战了几盘。开局之前，我说吴大师啊，咱有个说头好不好，吴问啥说头，我说咱赢你的字吧，输一盘写一幅，如何？吴大师哈哈地笑了，说行行行。结果是一赢一输一和，平了。

第四局刚把子摆好，文联领导就喊大家上车了。吴先生意犹未尽地说咱找空儿再下，我说行啊。不料再也没找着空儿。到了渭南，参观、采访、吃饭、联欢，晚上按说是有空儿的，但吴先生被人拉去写字了。拉的人备了一瓶五粮液，吴先生一沾酒，艺性大发，那字就写得天潇地洒。快半夜了，还被一群人围着。几次说不写了不写了，但总是经不住央求，又写了。后来，采风团的一位组织者上前救驾，卷走了毡垫，吴才松手。

刚要离去，却看见了我，说铺纸铺纸，最后一幅。纸就铺在无毡的桌上，问给你写个啥，我说随你。于是龙飞凤舞，宣纸上依次出现“钩沉为友”四个字。旁边人问“钩沉”何义，吴先生说“钩沉”就是下象棋。

只说还能捞到再次“钩沉”的机会，不料第二天出发时，不见了吴先生，一问才知吴夫人病了，先生一大早就赶回西安了。后来有过两三次见面，我提到“钩沉”事，吴先生总是“呵呵”地笑出了声……

（2018年12月18日于西安龙凤院）

## 初识张炎侠

老张说你很厉害、很出色，是女能人、女强者，拉着我到唐华宾馆见你。

先看到的，是你的书画作品。弄文的人多少通点墨，对别人的字和画，我的目光历来是挑剔的。也许是照片没有拍好，你的画给我的感觉是“还可以”；而你的字，才委实将我震了一下。瞧这幅《城外春风吹酒旗》，潇洒、遒劲，风骨和神韵都是一流的。真难相信，这样的字会出自一双纤纤素手。我自叹弗如了。

成就一番事业，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本来就不易，作为一个女性，尤其不易。你的父亲，陶峙岳麾下的骑兵教导团团团长，一位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型军人，留过日，一笔好写。本来，他可以为年轻的共和国做好多事情的，无奈却被悲剧性的命运所劫持，你们兄妹，也只好跟着受罪。辗转流徙，你随父母落户在陕西周至一个偏僻的乡村。求学的机会被剥夺了，高中未毕业，十九岁，你结了婚。

婚后，你来到西安，先干临时工，后做营业员、核算员等等。1973年，你调到一家珠宝玉器店搞收购，后来又当出纳、做会计。虽然未能进大学校门，但你绝不甘心一生庸碌，无所作为。你决定用你的勤奋和智慧，撞开书法、绘画，这艺术宫殿的大门。

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作为书法家的父亲的言传身教不能分开。自古寒门出才子，你没有使家族的优秀基因付之流水。你求师于石鲁、程克刚、何海霞；临摹于柳、王、欧、米诸家。晚上，家人都躺下了，你还在练；早上，家人还没有起床，你已练了好几张；至于白日的闲碎时间，就更别想从你手中溜过了。盛夏挥汗，隆冬呵寒，一晃二十多个春秋，你终于迎来了丰硕的收获季节。1979年你就是省书法篆刻协会的会员了，你的作品，几十次参加全国及各省市书展联展，十余幅送展日本，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十五周年纪念”书写的唐诗，被日本方面珍重收藏。还有，接待国外书法界朋友，为出国人员书画礼品条幅，举办书法表演，义卖支援灾区，为一些单位部门题写公文头横，匾额等等……



“你这样痴心于事业，丈夫支持你吗？”我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开始不太支持，现在好了。”你笑了笑，回答说，“丈夫当初娶我，是要一个贤妻良母的。他是山西人，喜欢吃面食，我们喜欢吃米饭，这样就得做两样饭。他每月工资一甩，洗衣做饭家务活，一概不管。穿的用的，你都得给他准备好。这样过了十几年，他自然是没说的了。我迷上书法后，起早睡迟，生活上有些照料不周，他生气了，我们吵了架。当时我已调到大雁塔公园筹建处，就铺盖一卷，带着两个孩子，住进了简易工棚里，谁也不见谁。这样憋了两年，才又住在一起。现在，他的脾性变了，常常是袖子一挽，围裙一扎，亲自下厨房。我笑着说，看你早就这样，我们还有啥说的？……”

“嗯……不错。”我笑着点点头，“那么，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矛盾吗？”

“不矛盾。”你回答说，“我们宾馆是中外合资企业，正职都由日本人担任。商品部日方部长回国后，业务就压在我这个副部长肩上了，确实够忙的。上班时忙业务，下班后练书画，工作和爱好便相得益彰了。比如，写字画画，离不开文房四宝，而经营文房四宝，又是我们的主要业务之一。尤其是日本人，对我们的湖笔、徽墨、宣纸、端砚以及八宝印泥等，特别喜欢。咱是内行，自然识货。我们的四宝，都是直接从生产厂家进的一流产品，从不哄人坑人，薄利多销，信誉第一。西安和我们同量级的宾馆有十二家，我们的商品销售是最好的……”

你侃侃而谈。谈你怎么样到广东肇庆的“老坑”里去看端砚，怎么样在广交会上和山东的丝绸厂家挂上钩，怎么样同日方部长协调关系，取得日方总经理的信任……珠宝玉器、首饰古玩、刺绣抽纱、手工艺品……件件道来，如数家珍，这时候的你，不仅是一个书法家、女画家，还是一位珠宝古玩鉴赏、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了。

短暂的交谈，只能算作初识。你说你想举办个人书画展、想开拓你们商品部的经营项目，想……——我、老张、我们大家，衷心地祝福你，祝福那些有志气、有才气、有骨气的朋友们！

（刊于《西安晚报》1989年6月27日）

## 痴迷与撞击

一个寒冽干燥的冬日，你来了。一盘磁带撤入收录机，屋子里便回荡起潮水般的旋律和主持人那独特的浑厚、凝重的嗓音，耳膜和心壁便同时震颤起来……

在维也纳，皇族成员出场，人们不过鼓掌三次，那当然是礼节性的，而在首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竟滚滚五次而不息，许多人哭了，热泪如雨……贝多芬说，音乐应当使人的精神爆发出火花；你说，音乐发自心灵，进入心灵；我说音乐还是撞击，心对心的撞击！

在浩茫的冰海上，一艘客轮即将沉没，死亡山崩一样向人们压来，这时候，五位音乐家出现在甲板上，他们坦然地举起小提琴，开始演奏巴赫的著名乐曲，那可真是一首《葬礼赞美诗》啊！……音乐显示出人格力量的伟大和坚强，你说，音乐能战胜死亡；我说音乐还能召来天使，驱走魔鬼呢。

是的，在语言到达不了的地方，音乐开始了；在空气需要净化的时候，音乐开始了；在精神需要提升的时候，音乐开始了。音乐，那些发自伟大灵魂的华章妙声，真真是我们人类的“圣音”了——人类的精神圣殿之音！没有它们，精神世界将是一片荒漠。走近这样的音乐，便是走近崇高，走近圣洁，走向永恒，这里，需要灵性的契合，需要智慧的导引。

一切都源于一种痴迷。少儿时代，你就对着村头榆树上的高音喇叭哼之唱之舞之蹈之了；在小县城文工团那几年，天天编织着音乐的花环；考入大学后，你珍惜每一次展露歌喉的机会——而攻读的中文专业，又使你向音乐走近时，多了文化的底蕴，为日后成为学者型主持人培植了“基因”；毕业后在教书的同时，致力于严肃音乐的普及和推广，写论文，办讲座，苦口热心，激情洋溢；后来又兼职主持音乐栏目，奔波在讲台与电台之间。生活中的坎坷和磨难是众多的，有些还是很大的——音乐大师们给了你抗争命运、搏斗人生的力量，而多难的阅历，又使你对大师们的作品更痴迷，理解得也更丰富、更精细、更深邃。

也曾提着家制的一点熏肉，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地来省城拜师求学，却不知

被你感动的老师是穆斯林；也曾筹措几百元，进京购买贝多芬、舒伯特、斯特劳  
斯和柴可夫斯基，大师们的作品装满了行囊，回程的路费却只够三分之一。救驾  
的依然是对音乐的痴迷，你的声情并茂的歌唱和演讲，凉水就干馍的行为，打动  
了列车员、列车长……也曾倾两个月的工资，花几百元买一张门票，专程去北京  
人民大会堂，看一场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出……

痴迷，一往情深的痴迷，义无反顾的痴迷——当然还有良好的天赋、曲折的  
阅历、厚实的文学功底，使你主持的音乐节目具有了强烈的撞击力和震撼力。于  
是，一番番赞赏向他走来，一枚枚奖牌向他走来……

一个下午很快过去了。我说咱再听一遍《圣母颂》吧。这是宏阔豪迈的撞击；  
群山起伏，江河奔流，白雪皑皑，莽林森森，万象幽咽，长风千里——荡气回肠  
的旋律，使我欲哭无泪。我看到了母亲，白发苍苍的母亲。千千万万个母亲；我  
看到了高淼的天，看到了苍黄的地，看到了地球在天宇中漫游，看到了浩浩茫茫  
中的无数星体。

于是，我说这曲子真好，谢谢你。

（刊于《西安晚报》1998年1月12日、《灵岩》1998年第1期；收入《卓立  
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傅翀

傅翀是我的临潼乡党，他家所在的新市乡和我的出生地栌阳镇同处渭北平原，地连着地，路接着路。我是先听到他的名字，然后见其人的。我在临潼县创作组工作的时候，曾思谋着写点以旅游业为题材的作品，于是常去华清池，认识了在那儿上班的小郭。小郭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总是未说话，先笑开来。有一天小郭笑笑地告诉我，说他有男朋友了，在县旅游局上班，外院毕业的，爱好写诗，名叫傅翀。我问是哪个翀啊？小郭说是羽字旁一个中国的中的翀，意思是鸟儿朝着天上飞呀飞。几天后，华清池的大殿前，小郭将人介绍给我。当时的傅翀，二十岁出头，戴一副黑边眼镜，打了个小旗儿，导引着十几个人旅游。人是白白净净的，文文气气的，还多少有点儿腼腆。不久，我调到西安晚报社编副刊。再不久，临潼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我回去采访。会上，小郭同傅翀一块儿来见我，傅翀将他的几篇诗作让我看，虽不是字字珠玑，句句佳构，却也凝练雅约，玄玄地别有一番意韵，看得出作者才华上的潜力，和一番总要写出点什么的矢志。写到这儿，我想到前不久在他办公室书橱里见到的一张放大的照片——草原上，小郭骑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依然笑笑的样子。旁边竖题一行字：“来自红尘之外的关怀”。见我观看这幅照片，将社长和总编扛于一肩的傅翀，说他对家里有深切的欠疚感，儿子都十岁了，一年到头，团聚的时间真是屈指可数。我说古人言家国不两全，干事业的人常常是这边得了，那边就失了。当然也不尽然，邓小平和妻子子孙的天伦之乐就立着一个样板。

人间的交往，有的一认识就热起来，往往是热得快也凉得快；有的从来没热火过，淡淡然如溪河流淌，却隔年岔月地于平静中忽然卷一波浪花，让对方的眼睛为之一亮，心弦为之震动。傅翀给我的感觉属于后者。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末吧，忽然有一天，已调到西安市旅游局的傅翀送来了他的作品选集，黑色的压膜皮儿，金色的书名，里面收着诗，收着散文，也收着小说，一些是发表过

的、获过奖的。晚上入睡前，我靠着墙，一页一页地阅读，一直读到深夜。果然是诗有诗心，文有文眼，小说嘛，也完全是傅翀式的，能让人的思绪飞起来。末了我合上书，心里默默地说：傅翀还行，这是第一本书了，有第一本就有第二本，一本书一层楼，若干年后，这小楼就变成大厦了。

这之后有长长一段时间没见面。1994年的秋天，陕北的佳县举办红枣节，受邀前去的人中，有我，也有傅翀。这时候的傅翀已是西安旅游报的总编了。人处在什么位置上，就会有什么样的“势”，运动员是运动员的势，售货员是售货员的势。傅翀的势表现在不得不站在总编的角度说话，一有机会就宣传他们的报纸。一位同行者私下对我说，傅翀一张口就是他们的旅游报如何如何不可少，如何如何有前途，像卖瓜的王婆似的。我却从内心里理解我这位乡党。想想看，一个内刊号小报，不能公开发行，不让卖，不准登广告，市场经济，干什么都得落实到一个钱字，没有钱支持，这个报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好，该有多艰难？听人说过这样的话：要想上吊，就去办报。我想这句话，差不多就是针对“三不”类报纸说的。在佳县的沟壑崖畔上，我和傅翀说到他们的报纸公开发行的事，我说要把号办下来，是很难的，傅翀说再难也得去办，否则就没有出路。

再就到了去年冬天，这回傅翀让我着实惊喜了一番：先是收到一份公开发行的西安旅游报，接着便接到傅翀的约稿电话。报纸是彩印的，胶版纸，八开十六个版，图文并茂。工作关系，平日接触的报纸不算少了，但印制如此精美的报纸还真是少见。我想，这张报纸能以这样的面目面世，我的乡党肯定是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因为前两年正是国家大力整顿报刊的时期呀。事实果然，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傅翀告诉我，为了取得公开号，他先后赴京十三次，跑了许许多多的路，见了许许多多的人，吃了许许多多的苦，也有了许许多多的体验和感受。其间的曲里拐弯柳暗花明，不用虚构，一五一十地写出来，都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于是，也谈到了他的诗文创作，傅翀说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到办报上了。我说，并非一定要走文学这条路啊。人活着，其实都在写书，用自己的思想、情感、言行书写人生这部大书。你能在三十六七岁的时候，辟路闯关地创办一份报纸，不管怎么说，都是这部书的精彩华章了。

前不久，广西的朋友来西安旅游，我接待了几天，从吃、住、行、看几个方面领略了一番我们的旅游业。感觉是总体不错，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于是，想

到了“旅游大省”“旅游大市”，想到了“科技和旅游两个轮子驱动”，想到了“西部大开发”——想到了西安旅游报。这张报纸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了，但要将其办得好上加好，办成立足陕西，辐射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行业报纸，就不是件容易事了。于是，我想告诉傅翀：事业刚刚开始，同志尚需努力——我为乡党们加油！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9月6日）



# 驰骋英雄气 纵横中华情

## ——序《多伦多 108 好汉》

连续几年，我都是春节期间起程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待上两三个月。今年，想着该选一次绿色之夏赴加吧，不然看到的多是满目皑皑的白色天地，加上身患小恙未痊愈，就留在西安过年了。正月初二，收到了海慧出版社龙牧华社长发来的书稿——《多伦多 108 好汉》。

这部书稿，首先给我的感觉是亲切。由于家人生活在多伦多，我连续几年都去多伦多，平日也常与家人视频通话，对多伦多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对华人华裔生存状况的了解，虽不像常住者那么深切入微，却也不能说陌生。这样，阅读的过程，就变成了唤醒记忆、启发联想、延伸体验、升华感悟的过程。我与 108 位好汉未曾谋面，但一路读下来，他们似乎都成了我的朋友，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喜怒哀乐感同身受——这当然要感谢作者慧心慧目的观察和绘声绘色的描绘。

其次，多伦多好汉们的奋斗精神令我感慨。这部书的书名用了 108，108 是 6 的 18 倍，应该是一个吉祥数字了。看到这个数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里的 108 将。按施耐庵的说法，108 将乃是 36 颗天罡星和 72 颗地煞星的化身，天生的非同一般。然而，相比于小说里的水泊梁山，多伦多可就大得多了！而论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这些作为所体现出现来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多伦多好汉们可以说不亚于，或者说已超越了梁山好汉。难怪，阅读这部书稿，令我时时感到，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有“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尽管“变幻了时空”。

再有，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我自豪。作者陈萍写了 108 位华人移民的故事，这些华人，可视作海外几千万华人的缩影。他们背井离乡，有的还拖儿带女，不远万里地由长江、黄河之滨走向枫叶流丹之国。随他们远行的，不仅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还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渗透到他们血脉、骨髓中的中华

文化。他们善当先，和为贵，讲仁义，倡诚信，兴教化，重人伦，刚柔勤，灵巧慧……他们的成功和荣耀，是中华文化优秀精华的成功和荣耀。几十年来，我都以研究龙凤文化为己任，以“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为宗旨，所以，我不禁为他们在海外为传承、播扬中华文化优秀精华所做的艰辛努力而感动，为中华文化优秀精华悠久、丰沛、普适的魅力而自豪！

龙牧华先生告诉我，《多伦多 108 好汉》是海慧出版社推出的第一部书。天下事，有了第一，就意味着有第二、第三、第四、第 N……海慧出版社成立的时候，我曾写藏头诗一首贺之：“海襟浩大纳百川，慧心化作远行船；启锚正当好风劲，航路通达天外天。”现在，我把这首诗也赠予与此书的作者和读者，愿朋友们高扬风帆，浩歌前行！

是为序。

（2011 年 2 月 13 日于西安。《多伦多 108 好汉》，陈萍著，海慧出版社，2011 年 3 月版）



多伦多俯瞰



# 斑斓多彩汇情思

## ——序《枫国絮语》

主持“加拿大社区网”的龙牧华先生，请我为《枫国絮语》一书作序，随之将书稿发了过来。这是一部征文汇编，其中的多篇文章在“加拿大社区网”发表时，我曾陆陆续续地读过，还作过一些简短的点评。这次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

书中的文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怀旧”，即记叙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一类是“写今”，即抒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因文章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由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故所谓“记叙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就多是发生在中国故土上的事情；而“当下的现实生活”多是加拿大当下的现实生活。

“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也可一分为二：一是别人的在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一是作者自己的在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前者有《雨中的红娘》《守节婆》等，后者有《雪的情思》《假如能够再活一次》等。《雨中的红娘》让人心痛，进而思考：红儿的悲剧何以造成？是她的父母？是村长夫妇？是红儿自己？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文化在这桩悲剧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雪的情思》让人心暖，看到大雪天赶路为上航校的女儿送棉鞋的母亲，我们会想到做过类似事情的自己的母亲，会想到“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词。是啊，仁爱、兼爱、博爱……爱之说法可谓多种，然而，人间最天然、最无私、最伟大也最难忘的爱还是母爱！

“当下的现实生活”也可分为两个方面：别人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作者自己当下的现实生活，以自己当下的现实生活为多。在《共享主义金钥匙》《私人定制逍遥游》《有一种寂寞叫移民监》《中国老人在多伦多自找快乐》《瞧这姐儿仨》《咖啡余香》等诸多篇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华人移民物质层面丰富多样的衣食住行，也看到了情感层面五味杂陈的喜怒哀乐，更看到了精神层面的不懈求索和渴望升华。

是的，不管你生活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人都是物质人、情感人和精神人的综合交织体：物质人决定了人必须为吃喝拉撒睡，即为活下去和生命的传衍而奔波、劳作；情感人决定了人需要活在有情意、有滋味、有关怀、有抚慰的人际关系中；精神人决定了人需要超越工具化生存，活出精神的高度。物质人不一定需要文学，情感人和精神人却离不开文学，文学可以使人成为情感和精神的富有者，从而升华生命、有益社会。从这个角度说，应当为写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喝彩，为将这些作品汇编成书的龙牧华先生和出版此书的海慧出版社喝彩！

相信各位作者手中的妙笔会继续生花，也相信海慧出版社能不断地推出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读的好作品！

是为序。

（2015年12月11日于西安龙凤堂；《枫国絮语》，海慧出版社2016年1月版）



庞进（右）与龙牧华（2018年4月18日，加拿大奥克维尔）

## 《枫国絮语》第二辑前言

2016年岁末和2017年开年，对我而言，是特别有意义的。2016年12下旬的时候，海慧出版社社长龙牧华先生发来了《枫国絮语》第二辑排版稿，请为其作一篇《前言》，因忙于12月24日在西安召开的“庞进文学作品研讨会”，会后才得以打开阅读。12月31日，又应邀赴陕北黄帝陵，参与谒祖祈福活动，在洪亮悠长的“龙魂”钟声中，跨入新年的门槛。这样，直到2017年1月2日晚，才断断续续地将全部书稿读完。

不过，阅读的过程却是心弦每每被打动的过程。

书稿的第一篇是陈姝谕的《微信时代的喜与忧》。“表情帝”“闲聊妹”“班门哥”的命名很有趣，也准确。是的，微信的资讯共享、展示交流、学习借鉴等功能，使地球人似乎都成了低头刷屏族。读到“一个注重信誉的人，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任”这句话时，我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坚持”：坚持原创，坚持正能量，坚持每天至少发一条。接下来的《遗落在笔记里的泪痕》，读得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也有一个聪慧好学、性格倔强的女儿在多伦多。当作者自问“在她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我扮演的角色到位了吗”时，我觉得这也是在问我、问天下每一个父亲。《门前过路小孩与星空下的梨树》，通过一棵梨树、几枚梨子，写加拿大不同族裔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大龄男女为何行走在爱的边缘？》则将生活在枫叶之国的“剩男剩女”们心路处境，分析得入情入理，让人叹息再三。邓思杰先生文笔流畅、生动，而且多有切当透彻之论。

书稿中有几篇写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读虹化玉的《一只小小鸟的葬礼》，我不禁也为那只可怜的小生灵祈祷起来。读刘丁绰的《与黑天鹅的美丽邂逅》，我为作者敏感、细腻、想动物之所想的爱心而感动，好像也成了营救天鹅宝宝队列中的一员。还有出现各个篇章中的松鼠、狐狸、野鸭、大雁、啄木鸟、麻雀、蚯蚓，以及来自中国的大熊猫，皆活泼灵动，如在目前……的确，动

物们生活在加拿大是幸福的，其幸福，一方面得益于辽阔、美丽、没有污染或少有污染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得益于关爱动物、与动物和睦相处的加拿大人，尤其是受“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法自然”思想滋养的华人移民。

郭绍武的《水城茶馆》是我特别看好的一篇。文中提到的“著名诗人虚白室人刁永泉先生”，可是来自陕西汉中？若是，这个刁先生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想，有天到了多伦多，一定带上陕南出产的“陕青”，让龙牧华先生拉着我，约上刁先生，一起到郭先生的那个位于加拿大东部小镇的茶馆，也来它个“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谈到人的社会性，我与郭先生的看法一致，两年前网上流传据说是杨绛先生讲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时，我就发了一则微信，说：“世界不仅是自己的，也是与他人有关的。任何个体生命都既是自己的，又是他人的，没有了他人也就没有了自己。”

由于作者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以及他们的父母孩子，那么，移民生活就成为这部书稿的主要内容。于是，我们看到了《我要学中文》《语言的魅力》《分享音乐的快乐》，看到了《林家的幸福黄丝带》《新闻劳工》《加国华老九》《博士与田园》，看到了《温馨邻里情》《闯祸》《我的欢乐人生》《阿岗昆露营》……可谓艰辛与幸福同行，耕耘与收获相伴，丰富斑斓，多姿多彩。

在《迁徙的风景》里，杰夫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数字：加拿大的华人已达140多万，华人社团到2016年仅多伦多就已发展到3000个。“而同胞之间的团结问题却一直是个疑问。好像大家希望让局面有所好转，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更多的改善。”读到这里，我怦然心动：这些年我到处宣讲龙凤文化，说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凤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都可谓是人文学意义上的“龙凤传人”，那么，以“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为精神底蕴的龙文化，以“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为基本理念的龙凤信仰，或许能为解决海外华人团结共进的问题提供助力和方案。期待与多伦多的文学朋友们相会，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7年1月3日于西安龙凤堂；刊于《加拿大商报》2017年2月1日。《枫国絮语》第2辑，郭绍武主编，海慧出版社2017年1月版）

## 从纸币读加拿大

龙牧华先生发来《加币之恋》书稿，央我读、校并作序，于是，我有了一个“从纸币读加拿大”的机会。

加拿大的历史不复杂。16 世纪前，在这块广袤土地上居住、生息的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16 世纪后，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先后侵入。1763 年，加拿大成为英国殖民地。1867 年，成为英国自治领。1926 年，英国承认其“平等地位”，加拿大获得了外交独立权。1931 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其议会也获得了同英国议会同等的立法权。1982 年，英国女王签署《加拿大宪法法案》，加拿大议会获得立宪、修宪的全部权利。这样的历程，使加拿大的政治体制成为联邦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也是这样的历程，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被尊为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及国家象征。

这样，英国女王的肖像出现在加拿大货币上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女王只是一个象征，加拿大的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由联邦总理掌控。这样，由“身穿毛皮领外套”的加拿大第一任总理 Sir John A. MacDonal d 开始，到其后的多任总理的肖像出现在加拿大货币上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龙牧华从介绍、分析加拿大央行第一套纸币——1935 年系列开始，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直到第八套纸币——2011-2013 前沿系列，还有纪念币等，尤其对出现在各套纸币上的女王、总理的肖像，从摄影、设计、配饰、制版到印刷、发行，及相伴的故事、趣闻，如“魔鬼脸纸币”“女王一票否决”等，都做了详尽的介绍，使读者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对加拿大的历史、政治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当然，纸币上的肖像、图案等，不仅反映了加拿大的历史和政治。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教育、政府透明度、社会自由度、民众生活品质及经济自由等方面在国际上都排名靠前。这些，当然会不同程度，却也色彩斑斓地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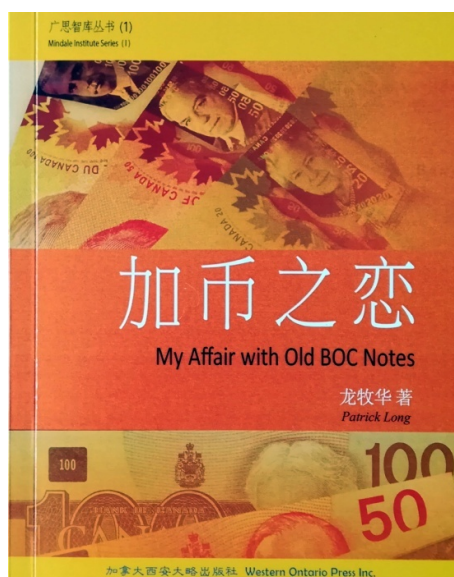
在加拿大的纸币上。龙牧华对这些“展现”，也都一一地做了梳理、分析、介绍。所以，可以说，读龙牧华这本书，实际上是在了解加拿大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欣赏其辽阔的版图、丰盛的物产、壮美的风景、宜居的环境、特异的建筑设施、多彩的民俗风情、多元的文化呈现，等等。

在我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活得有意思、有趣味、有价值，是一定要有某种爱好或者说嗜好的，没有爱好或者说嗜好的人生，是单调乏味的。而收藏，就是能够使人们形成爱好或者说嗜好的活动之一。如果一个人的爱好或者说嗜好不但给自己、给家庭带来了美善和快乐，还给他人、给社会带来了美善和快乐，那么，这个人的爱好或者说嗜好就更值得点赞了。

龙牧华是一个追求生活趣味和价值美善的人，也是一个一旦确定做某件事就立马行动的人。于是，我们读到了他为了第一批纸币的收藏，像一只鸟儿般早起，在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时，就开快车穿行在乡间小道上，终于按约定时间到达供货人家中……等等故事。这些故事，有声有色、有趣有味、有情有义，给笔者带来了阅读快感。相信，这样的阅读快感，也会带给有缘于这本书的各位读者。

祝福龙牧华！祝福读者们！

（2019年8月15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加币之恋》，龙牧华著，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2019年9月版）



# 文学艺术的根源

文学艺术的根源在于人本身。

人和人之外的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长了个其他动物都不具备的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大脑。这个大脑，使人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人与神即人与超越界四大关系时，有了由感受、悟知、体验、思考，而生发、形成的复杂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思想和感情这两样东西，像天上的云要聚集、飘移，地上的水要流动、蒸发，原野上花儿要开放，林子里的鸟儿要鸣唱一样，本然地要表达、要宣泄、要交流。事实上人都在以各自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表达、在宣泄、在交流。

所谓文学艺术，不过是以文字、诗词、文章、雕塑、绘画、音乐、戏剧等形式，以描写、象征、比喻、夸张、渲染、烘托、造型、弹奏、演唱等手段，表达、宣泄、交流得别致一些、美妙一些、艺术一些罢了。

（2005年4月8日于西安慧雨庐；2023年9月2日润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散文的“情”与“思”

2002年6月，我的散文集《灵树婆娑》有幸获得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颁奖仪式在风光秀丽的江苏省吴江市隆重举行。大会发言中，评论家阎纲先生用“情之美裸”来概括散文的本质特征。我将这四个字琢磨了一番，觉得概括得很好，但若将“思”字放进去，就更好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我在阎先生说法的基础上，用“情之美抒，思之妙达”八个字来概括自己对散文本质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我的意思是，散文不仅要抒情——这个情要“裸”，也就是要“真”，要抒发得美；更重要的还得有“思”，即不同寻常的、深刻独到的“思想”，当然，这个“思”，要巧妙地、艺术地“表达”。

我是恢复高考走进大学校园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开始笔耕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三十多年来，我写作、发表了一千三百多篇作品，其中八百多篇属于散文范畴；出版著作三十三种，其中八种是散文集。回顾自己的散文写作，没有哪一篇离开了“情”与“思”，也没有哪一篇未追求“情之美抒”和“思之妙达”。这里，且以收入《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中的《天地苍茫一根骨》为例——

那是1998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作为陕西省文联采风团成员，随团到韩城市芝川南原，瞻仰位于悬崖峭壁上的太史公祠墓。过“高山仰止”牌坊，进“史笔昭世”门楼，登九十九级台阶，其境其时，一种崇高感从心底油然而起。我明白，这是我走近一个令我从骨头里敬仰的人时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特别的，不常有的。

因了这种情感，在看到司马迁束高发、着红袍的塑像时，我特别注意到了那“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的炯炯眼神，和“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的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在写作时，我加上了思考：“据说，



受过宫刑的人胡须会随之脱光的，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永远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河岳的男子汉！”

写司马迁，不能不写他罹祸的原因和经过，于是，文中有了情思密切交融的段落：“……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文章最后，我将一腔情思推向高潮：“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天地苍茫一根骨》发表于1999年，后被《当代散文精品1999》《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等几十种选集收入；2005年成为北京海淀区高考模拟试题，该试题至今已被三十多个省市数千家教育单位使用。有论者以《挥笔写苍凉，豪情祭英魂》为题发表赏析文章，说：“作家庞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有着透辟的认识和深刻的个人体验。……他用那枝朴素秀丽的笔，苍凉疏放地构画出司马迁这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民族文化悲剧的旷代雄才的苦倔的形象，含血带泪地倾诉了几千年来文化人的追念和求索。”“作者深刻的思考、凝重的语言以及伟人的傲岸人格都赋予了文章震撼人心的厚重感。”“文章结尾处，更是通过强烈的语言造势将感情升华到顶点，使主旨得到深化……这个精辟的比喻，既体现了司马迁命运的悲剧色彩，又突出了他的不屈的精神，这一根骨头，是在对理想与事业的执着追求中挺立起来的独立人格，也是世世代代支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

厦的不屈脊梁。”如今，“天地苍茫一根骨”已成一句广被引用的名言，若将其敲入互联网的搜索框里，会有很多条信息呈现。

散文离不开“情”与“思”，“情”是散文的血与肉，“思”是散文的骨与魂。对一个作家而言，能写出将“情”与“思”抒发、表达得恰到好处，从而撼动人心、传扬世间的佳作不可能很多。这就意味着，对“情之美抒，思之妙达”的追求将是散文作家毕生的功课。

（2014年10月18日于西安龙凤堂）



2002年6月21日，庞进散文集《灵树婆婆》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 妙文全在一枚心

禅宗大师惠能说过：“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另一位被称为马祖道一的禅师将这些说法归纳为四个字：“即心是佛。”也就是说，佛不在西方，也不在庙堂，佛在每个人的心上。

因此可以说，禅学是一门心学。

文学也是一门心学，一门高格调的心学。

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它的创造者彼时彼地心河的流淌，心迹的外化。表现派从内容到形式都“心化”了：内容以表现内在的情感为主，形式上依顺于心灵的轨迹。再现派虽然主要以现世生活为描写内容，但这些内容都必然是经过作者内心体验、参悟、过滤、升华了的。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毫无疑问，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文章。没有一颗高格调高水平的心，怎么能写出高格调高水平的作品？你的心庸俗了，僵死了，陈旧了，枯涩了，你的文章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新鲜的特色，而难免被称之为文字垃圾了。

所以，妙文全在一枚心。

许许多多弄文学的人吃了许许多多的苦，却不见有多大长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花气力修心养心磨练心。更替的时序，变迁的世态，要求我们的心必须不间断地更新、扬弃、丰富和发展。心的本性是喜欢吐故纳新、活蹦乱跳，怎么可以将其封闭在匣子里，冻结在冰箱里呢？

朋友，愿博大精深、新奇独到、生机勃勃、光华四射的心跳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膛里——为了我们的“文”，也为了我们的“人”。

（刊于《洛阳日报》1987年9月23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悟泉

做副刊编辑时，常有人问我文章应该怎么写，我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说我写了为什么在报刊上发表不了呀？我说那是因为你想得新、不特，写得不妙、不绝。他又问怎么样才能想得新特、写得妙绝呢？我说没啥好法子，汽笛绳儿一拉——呜（悟）去吧。

悟实在是一种发现。发现别人和自己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再把这种发现用别人和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的符号（不光文字，还有画面、镜头、动作、音响等等）表现出来，这无疑就是新意盎然的创造了——只有能进行新意盎然创造（不光是写文章）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才算货真价实地有了点意思。

能让你开悟的对象是宇宙中的形形色色。也就是说，大自然中的不管什么玩意（包括我们自身），都能使我们无穷无尽地有所发现。比如一座山：原始人会发现洞岫、野果、木棒、石斧之类；古代人会发现木材、珍禽、矿土、药草等等；到了当代人，发现的当然更多：奇木异草、稀有金属、远古遗迹、旅游资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现，同一个人不同时空也会有不同的发现。那次你发现了一片怪石，这次你发现了一头猛兽，下次你说不定会发现一道瀑布、一派雾岚、一对野人、一段风情以及一缕游思、一串情趣、一系列的心神感应等等。

悟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比如登一座山，前人从正面上，你就从背面、侧面上；还可从上面下，从中间穿；或者不上不下也不穿，拿个望远镜坐在别处（另一个山头、飞机、航天器、月亮、太阳、银河系……）看；还可以扔一枚“原子弹”，把那山“炸”平了，看它是个什么样子。这里不应该有什么模式和规范，你觉得怎么样新特妙绝，你就怎么样想开去。

书是要读的。读别人的书是为了超越别人。你那样想，我就不那样想了；你那样干，我就不那样干了；你只是我的参照系，我不模仿你，模仿不会有出息。只要不是痴呆，每个人的心窝里，都应当有一眼或数眼悟泉的，只是有些人的悟

泉被石板盖着、被土层压着。揭起石板，掘开土层，活泼泼的泉水就会喷涌而出，成雨成瀑，成河成江，卷浪兴云，精彩一方世界。

（刊于《陕西青年报》1987年12月30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痛快些，舒展些

我常常感觉到，我们大家都活得太累。为钱财累，为权势累，为声名累，为自己塑造的天神、人神、鬼神累，累得懵懵懂懂，精疲力竭甚至头破血流呜呼哀哉还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就有层出不穷的用多少辆火车也拉不完的“累书”和“累文”——装腔作势、声嘶力竭；虚骄浮躁，自欺欺人；扭扭捏捏、可怜巴巴……作者写得累，读者读得累，末了就觉得伸着两条腿在这地球上走来走去实在是乏味透顶了。

痛快是生命的原质。我们从娘肚子里蹦出来，绝不是以痛苦为目的的。虽然常常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地落入苦海，被如佛教所说的“生老病死，怨憎会、苦别离、求不得、五阴盛”种种苦楚所纠缠，最后还要来个谁也拒绝不了的悲剧性结局——化作一具棺材瓢子或者一把土灰。然而，我们之所以为人，就因为我们把这些事先都知道了，不像牛羊猪狗之类，刀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死期之将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最美妙的价值取向：痛快人生。与其烦烦恼恼，不如快快乐活；与其别别扭扭，不如舒舒展展；与其作茧自缚，不如脱颖而出；与其委屈畏缩，不如酣畅淋漓！

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按人的本性而活着。人的本性是自由自在的创造。没有自由的身心，也就没有自在的创造。一位年过半百的人这样对我说：“唉，我们这代人最大的悲哀是肩膀上没有架自己的脑袋！”一个人的脑袋坐落在几亿人的肩膀上，主宰着几亿人的心思情绪、喜怒哀乐乃至生死存亡，这几亿人就痛苦到家了，自由自在的创造就没门了。

为什么总想搬用那些“大帽子”“大口罩”“大皮带”唬人呢？十多亿颗头，大小扁圆不一样；十多亿双脚，长短宽窄不一律。如果成了束缚人的创造力的绳索，任何“帽子”“口号”“皮带”都是该扔掉的东西。

为什么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子，总想拯救别人呢？你以为人家都在受苦受难，

岂不知你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世道也就很不错了。

如果你觉得只有唬弄人或者摆架子痛快，那么你就唬吧摆吧，人家完全可以不听你不看你你不理你，或者瞥一眼，丢到垃圾筐里了事。

写东西和做人一样，得来真格的。真格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不到笑的时候，你笑个什么劲？嘿嘿嘿、嘻嘻嘻、哈哈，仰脖子，捂肚子，摇头发，裂大嘴，纯粹一个傻葫芦！瞧，你又哭了，潸潸而下，汨汨而流，没骨的蚯蚓，断线的珍珠，涕泗滂沱，汹涌澎湃，哪来那么多的眼泪？本来嘛，哭和笑都是为了痛快，只可惜你不动真格的，这种痛快，也就变成了一种不痛快的做作和滑稽。

耍小聪明，既是做人的大忌，也是作文的大忌，明明自己吃的是糠，却要说吃的是狗肉，眼气人家的酒肉而打嗝，吐出来的还是糠，于是你就说你吃的那条狗吃了糠；明明八杆子打不着，偏要安排成姐弟、兄妹、双胞胎；明明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或者连自己都没有弄明白，偏要作出一副高深莫测状而故弄玄虚，把字典里没有的偏僻晦涩的词语堆上去；为惹人笑而笑，为幽默而油滑，脱裤子露新鲜，口红抹到痔疮上，像那些蹩脚的相声、小品、独角戏，不看不听不倒胃口……

什么样的构思最妙？

自然天成，返朴归真。

什么样的文字最美？

舒展洒脱，行云流水。

什么样的朋友最好？

山川大海，坦荡痛快。

再说一遍：活得痛快些，写得舒展些。

（刊于《长安报》1989年6月12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意象：智慧与情感的交融互渗

有关意象的解释有许多种。笔者所讲的意象，指的是体现着高妙智慧的渗透着强烈情感的有丰富意蕴的文学形象，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之所以用“意象”取代“形象”，是因为“意象”二字比较鲜明突出地体现了作家的高智慧创造的特征。形象，在一般人甚至一般动物的脑子里都会产生。狗通过形象能辨别自己的主人，猫通过形象不会将老鼠判断成麻雀。但狗和猫都不会超越本能需要而将更深刻更丰富的意蕴付于形象之中。只有人，而且只有具备作家素质的人，才能在脑海里智慧地将文学意象选择成功并艺术地将其外化。

智慧是思维能的释放和发挥，包括过程和结晶两个方面。任何智慧，都无法排除情感的影响情感的滋润；而人的任何一种情绪体验，也都必然有智慧参与其中。而且，智慧和情感说到底同源的一一都萌源于创造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对作家而言，智慧和情感犹如鹰鸟的两个翅膀，缺一翼而不能高飞。智慧规范着、制约着、指导着作家的情感；情感浸润着、影响着、涵纳着作家的智慧。没有不受智慧之光烛照的情感，也没有不受情感之河浇灌的智慧。情感因智慧而深化，智慧因情感而丰富。对文学意象的形成而言，情感显然和“象”联系密切一些，任何情感都来自也都会外化为一种“象”；智慧则和“意”联系密切一些，任何智慧都来自也都会凝聚为一种“意”。然而，“象”为“意”之表，“意”为“象”之里；二者交融、互渗、纠缠、化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美的文学意象。换言之，文学意象的完成有赖于智慧和情感交融互渗的矛盾运动。智慧情感化，和情感智慧化，乃是文学作品达到高品位的最重要的基本要求。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在浓墨重彩地宣泄、描绘、铺陈情感的同时，苦心孤诣地追求一种熔生存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评判、深层心理等等于一体的“哲理”意蕴，用笔者的话说，就是力图将高品位的新鲜活泼的智慧，渗透、灌注、融化在文学意象之中。这时候的情感便成为一种“智慧化情感”或“哲理化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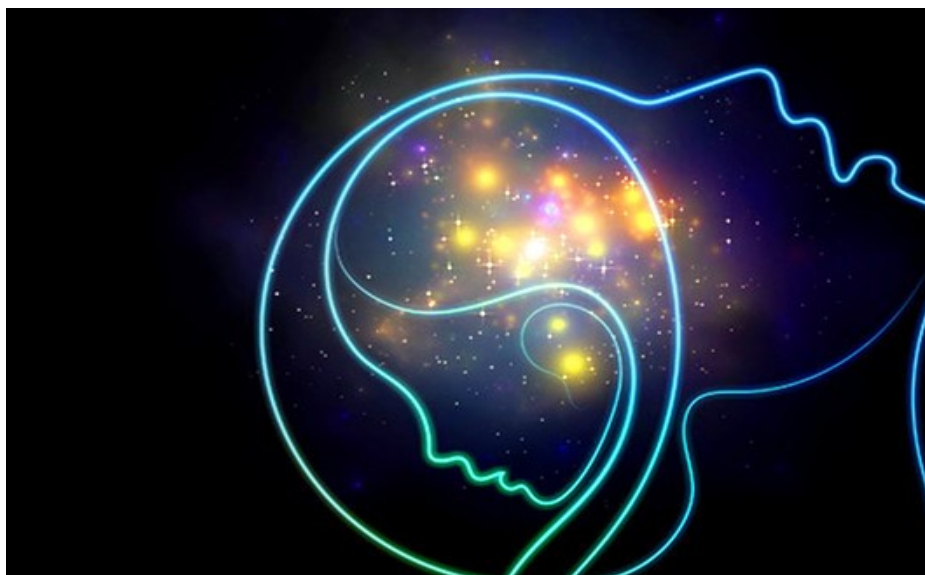


哲学家苏珊·朗格有一个著名论断：“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他讲的人类情感就是这种“智慧化情感”。不过，他的话若修正如下就更恰当了：艺术家表现的不仅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且要将这种真实情感智慧化为人类情感。具有智慧化、哲理化情感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好作品。

古今中外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无不是大智慧和大情感交融互渗的产物。《红楼梦》写情可谓摇魂荡魄，淋漓尽致，而在其摇魂荡魄的情感描绘中，又深刻地蕴涵着“苦”“空”等等具有佛门色彩的哲理意味。弥漫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非暴力主义倾向，萨特宣扬存在主义思潮的剧本和小说，昆德拉所揭示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历历再再都说明着揭示着智慧对情感以及对整个文学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参与、导引、制约及升华作用。

反过来也一样：作家若不把哲理作情感化处理，即不将高妙不凡的智慧蕴涵、融会、体现在生动鲜活的情感之中，那么，他所创造的作品就因失去具体感人之“象”，只剩下干巴巴的说教之“意”而接近于理论著作——不成其为文学作品了。

（刊于《西安晚报》1993年9月10日）



## 象之河与意之流

无论文学还是艺术，说复杂就复杂，砖头厚的书拉一火车也难以尽述；说简单也简单，用两个字就能说清楚：“意”和“象”，合在一起，可谓之“意象”。“意”是你要表达的思想、精神、情感、境界，等等；“象”是你所选择的语言、结构、色彩、旋律，等等。有“意”无“象”，谈不上文学也谈不上艺术；有“象”无“意”或少“意”，作品就缺乏感染力、震撼力和穿透力。古今中外的所谓佳作，都是些既有深刻的“意”，又有美妙的“象”，且将“意”和“象”结合得恰到好处的好东西。“意”不独步，“象”欠新美，或“意”大于“象”、“象”大于“意”、“意”“象”两张皮，都和好作品有距离。

西安建大报将其副刊取名“河流”，看到这两个字，我便想到了“象”和“意”。蜿蜒曲折、波澜壮阔，划山割原，涵鱼浮舟，河之“象”当大矣、美矣、多姿多彩矣；汇溪纳泉、摧枯拉朽、暗潮翻涌、潜邃渗广，流之“意”当深矣、丰矣、鲜活激荡矣！

“河流”没有让我失望。在其刊载的文章中，我读到了不少“意”隽永、“象”鲜明，令眼眸为之一亮、让神经为之一奋的句子和细节，如：“父亲那曾经坚挺的能撑起天和地的脊梁如今已略略有些弓起，仿佛一个括号沧桑的右半边。”（刘娜《烛光里的微笑》）“有人在天堂与尘世自由进退，孤寂时划一根火柴，暖一暖冻僵的手……”（灯灰《火柴里的天堂》）“……母亲瘦了。看得我心里酸酸的，这世界酸酸的。”（陈少华《秋凉的时候》）“灰头土脸的形象足以让我隐没在一捧沙中，伴着岁月的流转慢慢地成长起来。”（薛丽娟《不是漂亮女生》）“打电话回家，还未及怎么说话，母亲就急切地抢先开口了：西安今天有小雨，天气较冷，你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寒假回去，我意外地发现天气预报已成了父母的必看节目。”（张新玉《天气预报》）

不仅如此，从栏目设置上，“河流”也显示出有“象”有“意”，“意”“象”

结合的特点，如“情感天空”“心灵底片”“五味斋”“生活彩照”“红叶一枚”“往事如歌”“触摸词汇”，等等。而且，还将传统的“横块排”变成了现在的“竖栏排”，由黑白印而套红印，进而一跃成为“全省高校惟一的彩印校报”……这一切，当然是在做“象”的努力，然而，这“象”是含有“意”的，这“意”，便是趋时求新的观念，和奋力争先的精神。

“意象”的锻造没有终点，也没有至境，那功夫，要下得蜘蛛结网、蜜蜂采蜜般恒常，日转星旋、地老天荒般久远。这话，对搞文学艺术的人适用，对办报纸副刊的人也适用。和我见到的许多副刊一样，“河流”可以说已拓展出了自己的“象”，也奔流出了自己的“意”，但，百川向海，前面，自然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刊于《西安建大报》2004年3月1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也算散文观

我以往的写作，无论是对创造现象的哲学观照，还是对龙凤文化的烛幽探微，以及用种种手法写成的为数不算少的散文随笔，其实还都是打了一个基础。由于花在打基础上的时间多了些，这基础也就相对宽厚了些。现在，我想，我得设法在这样的基础上，盖一座楼，一座高楼。这高楼当然要盖得漂亮，还要能经得起若干级地震，绝不干那种到处裂缝漏渗的，被称作“豆腐渣工程”的活儿。

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建立了新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另一件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干成了，后一件事干错了。

时间就那么多，干了这一样，就干不了那一样。能集中精力干一件事，而且是自己最想干的事——其它的再好的事让别人去干吧——这样的人生就很幸福。

我常常有这样的幸福感。

有人将作家写作比运动员举重，说属于那个量级乃是天定。那怕多零点五公斤，举不上去就是举不上去。我说你不举，怎么就知道举不上去？也可能许多次没有举上去，忽然一次就举上去了。即使终生没有举上去，但你努力了，努力了也就行了。活人的意义，不就是这一次又一次地朝上举么？

我现在的年龄，正好是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年龄，也正好是路遥为文学殉难的年龄。我们这两位乡党，留给后人青山大树般的风范。太史公让人悲怆，路遥兄让人心痛。

需要献身，但献身的方式有多种。

我不拼，但我不停。

（刊于《美文》1999年第4期；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一次有关散文的发言

住在这个城市的文学朋友，隔些日子就会有一次以这样那样的名目举行的聚会。出席这样的聚会，在一般情况下，无需做发言的准备。因为一个省城的文坛，“腕儿”总是很多的，他们论资也深，论誉也重——光那些挂“教授”衔的就能坐满一屋子。他们发起言来，好似卖瓦盆，一套又一套。你只要将耳朵张成网，就保准网网不空。

过意不去的时候也有，比如朋友事先打了招呼，来的人少，聚会的时间由上午延伸到下午，其间又享用了人家一番招待，等等。觉得多少得讲两句，否则就有些对人不起。于是，就把想说的话斟酌一番，别人说过的，或者属于“老调子”的，咱就不说了。

前些日，大家又在莲荷盈盈的公园相聚，研讨一位女作家的散文。这位女作家是我大学时同校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她的散文，我以前拜读过、编发过，总体印象是写得真切、平实、细致而质朴；字里行间，跳荡着一颗爱心，灌注着一份真性情。真性情当是散文的生命。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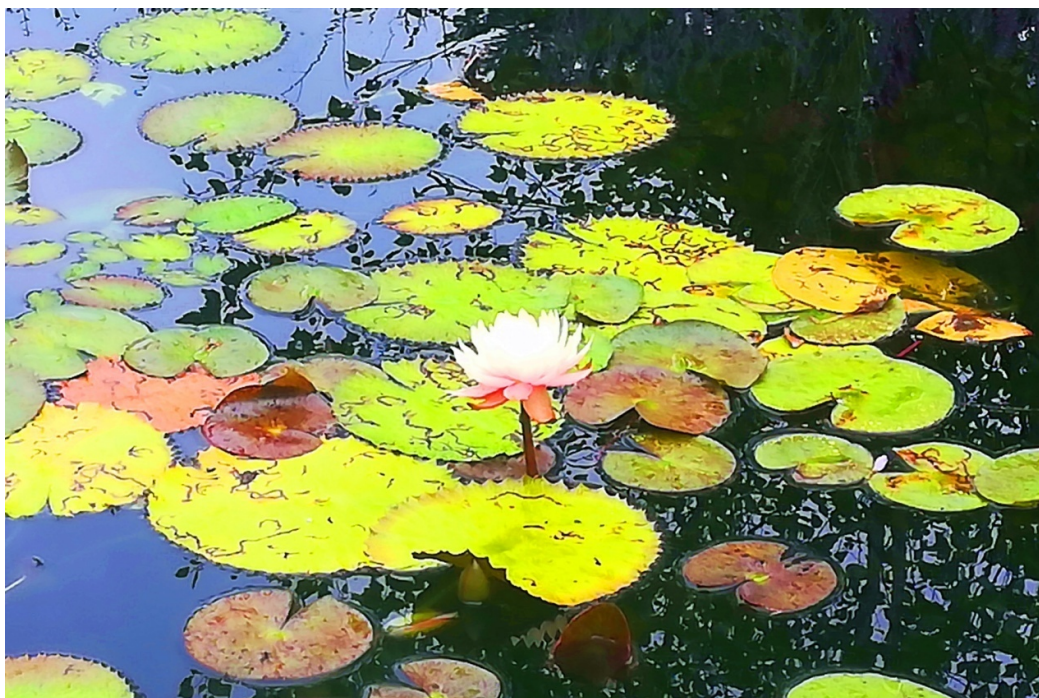
女作家的本职工作是大学教师。教书和作文其实是两码事。又要把书教好，又要把散文写好，还要做孝顺女儿、贤惠妻子、优秀母亲，等等，这对谁，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能达到目前的水准，她已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任何劳动，都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意思。

优势换个角度就成了局限。太真切了，就显得“满”，少了飞扬和灵动；追求平实，就难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篇章；写得细了，又往往陷入琐碎和拉杂。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意思。

前两个意思我没有说，因为我之前已有人大体上说过了。而后一个意思，一是和我写过一部《创造论》有关。我曾经考察过作家们的创造现象，发现那些能给人强烈震撼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饱含着不同凡常的“新异质”：或博大精深

的思想，或荡气回肠的情感，或绝妙别致的语言，等等。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难免挑剔和苛刻了。二是和我自己在散文上花的功夫比较多有关。散文没思想不行，但处理不好，“思想”便大于“形象”——不好读了；散文不讲究文字不行，但太讲究了，就往往失之于雕琢和卖弄——我自己就常常陷入这样的“困惑”。加上当了十多年副刊编辑，看了数不清的稿子，把眼睛都看“刁”了。

（1995年8月6日于西安慧雨庐）



## 墙上黑点与创造喷发

记得那天谈及如何进行文学欣赏时，我曾顺口举了个例子：比如墙上有个黑点，可以说它是个钉子，也可以说它是只苍蝇，还可以说它是枚太阳。欣赏者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审美心态不同，收获也就不同，不可能一律也不必强求一律。创作和欣赏是审美过程的两个环节，联系密切又不可代替。一篇文章写出来，其实只是完成了审美的一半，另一半得由读者来完成。你得品味、联想、填补、发挥等等。你说总得有一个客观标准吧，黑点就是黑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我怎么觉得，固然黑点就是黑点，但不能仅仅只是黑点。仅仅是黑点，怕不太符合文艺创作的特性，也把宽阔活泼、丰富多样的审美欣赏拘谨了。如果是数学教师，我可以给学生讲这就是个黑点，从这个黑点出发，可以划若干条射线；如果是粉刷匠，我可以认定它就只是个黑点，然后抹它一刷子。问题是我现在既不是数学教师也不是粉刷匠，而是一个文艺创作者或审美欣赏者，那么，这个黑点为什么不可以看作苍蝇看作太阳呢？

想得再深些，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怎么样看世界的问题。传统的观点往往过分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即客观实在性，其实，自从人类出现以后，就没有脱离意识的物质，任何物质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打上了人类意识的烙印。进入微观领域，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也受到挑战。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基本粒子，使人类永远“测不准”——不能同时测定粒子的确切的动量分量及确切的对应坐标位置。因为在测的过程中，你怎么也排除不了测量仪器和测量者自己即主观因素对被测量对象的影响和干扰。在宏观世界，这种影响和干扰我们或许觉察不到；而对于微观粒子，这影响和干扰的作用力就相当巨大了。可见，人类认识到的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基本粒子——注意，这里讲的是“人类认识到”——是不能摆脱以有意识为特征的人类而存在而运动的。

这就启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呢？比如，我们就可以将

创造作为世界的本原，从而突出和强调世界的创造性——这里的创造，指的是由创造物参与并发挥创造效能经过创造过程完成从而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活动。物质也好，精神也好，非物质非精神也好，只将其看作“创造物”就可以了（创造物指的是参与创造的一切）。比如这个黑点，它无疑是个创造物，既然是创造物，就得受创造律支配，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从而生成新的创造物。我看黑点和你看黑点以及他看黑点，是不同的创造过程，生成的新的创造物可能相似则不可能相同或大不相同。这或许是人们在审美创造中，将墙上黑点看作苍蝇、看作太阳的“哲学依据”吧。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创造态”。由于时间关系我发言时未能展开。你将“创造态”讲解为灵感状态，说灵感状态并不常有，即使写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也常常苦思冥想困涩多日而不能左右逢源一挥而就。这是很符合创作实际的。

由于我们将创造揭示为世界的本原，那么，创造物有人和自然物之分。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他是能动自觉有意识的创造物，自然物则是非能动不自觉没有意识的创造物。如果我们把创造物进入创造过程发挥创造效能的情形称作“创造态”的话，那么，创造态就是世间万物最常见、最普遍、最一般的存在方式了。

这是从宏观上讲的。具体地讲，我们可以将创造态相对地分为“创造静态”和“创造动态”。比如一支钢笔，作为创造物，它每时每刻都处于创造态，插在笔筒里是创造静态，拿到手中并开始书写就进入了创造动态。创造静态时，创造物发挥的创造效能小或者很小，（插在笔筒里的钢笔，只是一个摆设、一种点缀或一种预备）；创造动态时，创造物发挥的创造效能大或很大，（拿到手中开始书写的钢笔，就成为感情的导体、审美的工具或战斗的武器了）。人是“万物之灵长”，尤其是以创造新美为天职的作家艺术家，其创造态和其它创造物（尤其是自然物）的创造态有质的不同。插在笔筒里的钢笔想不到也不会去想它将要写点什么，而坐在书房、躺在床上、散步在河边的作家，则可能正在思考他要写点什么、该怎么样去写，即使是吃饭睡觉、打牌下棋，甚至和人聊天看人吵架，他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联系到他的创作。创作和他的生命交织融汇在一起，除非他的生命宣告结束。这也就是说，一个作家毕生都必须也必然或“静”或“动”地处在创造态中，他自始自终每时每刻都必须也必然以一个能动自觉的创造物的面目出现。



创造静态是创造动态的准备，创造动态是创造静态的必然，二者互相转化，相依为命。一个作家不可能总是处于创造动态，不吃不喝不睡不歇，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写它八万六千四百秒；一年三百六十天，写它八千六百四十个小时；也不能一直处于创造静态，总是在准备、在酝酿、在构思，而不见新的创造物——美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作家”还算是作家吗？

仔细考察，创造动态还可分为创造萌动态、创造悠动态和创造激动态。创造萌动态是创造的萌发期，如一个作家产生了写点什么不可的意念，于是就坐在桌前，拿起了笔；创造悠动态是创造的进展期，类似于佛教禅宗的“渐悟”。萌动态和悠动态没有时限，长则数日数月，短则瞬间片刻；也可能缩合为一，萌动即悠动，悠动即萌动。创造激动态是创造的喷发期，类似于佛教禅宗的“顿悟”，也就是您讲的“灵感状态”或“妙悟状态”。这里，一般要由“创造契缘”来触发，即“萌动”后立即进入“激动”（“悠动”的时间短暂到几乎没有，或者说已并入“萌动”里去了）。创造契缘指的是创造的“契机”和“缘分”，比如忽然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触到什么、想到什么、梦到什么等等，像一只鸟儿掉落在本来不相干的两根电线上，创造契缘接通了原来不通的神经回路，使你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突然间迸射，刹那间你便茅塞顿开、文如泉涌，及至若痴若狂、忘乎所以了。这是创造态的最高潮，你非喷发不可，也非一喷到底不可。在喷发过程中，你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感，这就是所谓的“高峰体验”或“极致效应”。喷发过后，你会感到全身通泰，内外舒畅，真是痛快极了，美妙极了。（当然，也会感到疲倦——好快活好快活的疲倦啊！）

看来，一个作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以创造新美为特征、为目的的能动的创造物，必须使自己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不断地发挥创造效能，力图不断地产生新的创造物——超越前人也超越已往的，足以最大限度展示创造价值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要抓住“创造萌动”，把握好“创造悠动”，十二分地珍惜“创造激动”——全神贯注，尽情喷发！

以上看法，青果而已。不揣冒昧，请您指正。

（刊于1992年第2期《灵岩》；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白纸黑字

世间三百六十行，与文字打交道最多者，大概要数记者、编辑和作家了。汉语言文字形、音、义齐全，表现力丰富，负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称其为东方古国的“第五大发明”实不为过，相信在语言世界里做他个“领袖”，也会是神采飘逸、风光八面的。但是，汉字的出错率大概不会比其他文字低，所谓无错不成书，无报不出错。我在记者、编辑岗位干了近二十个年头，可以说天天都和差错打交道，直接和我相关的差错也出了若干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故乡临潼的渭河大桥建成，结束了南北阻隔的历史。我是怀着一腔深情前去采访的，回来后写成一篇题为《桥》的报告文学。由于采访得深入，文章见报后，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然而没有料到，因我一时的不细心，竟造成了一件无法挽回的差错。那会儿还是铅字排版，在排几个工程副指挥的名字时，将顺序搞错了，该排第二的放在了第三。文章的三校样我是看过的，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位副指挥是在桥梁建设方面有不小贡献的知识分子，对声誉看得重当在情理之中。于是就认为我是在有意地贬损他、奚落他。责骂我的话多次传来，我说什么好呢？白纸黑字，抠都抠不下来了。

那年仲夏赴延安采访，一天下午，忽然云起风骤，噼哩啪啦地下起了冰雹。开始是蚕豆大，很快就变得像弹球，像核桃，地里的庄稼蔬菜被打得稀巴烂，显然一场灾难了。当晚我写了一则消息，用长途电话的方式朝回发。几天后归来翻报纸，“拳头大的冰雹”几个字显豁豁地蹦到眼中：听误了，抄误了，“蚕豆”变成“拳头”了。编报的同志和我商量，说过去了算了吧，我说还是更正吧，“蚕豆”和“拳头”，差远了。

“拳头”之错有通讯工具不先进的因素，然而工具先进了，也有因“先进”而出的错。经我手处理过一篇写聂荣臻元帅的文章。校样上有“元帅”字样的地方，全是元“帅”，可报纸印出来后，好多处都成了元“师”。什么原因呢？电脑

录稿员把“帅”错打成“师”，打印机没有将多出来的那一道在样稿上打出来。

一篇稿子从写到发，要经几道关。于是常发生望文生义想当然的事情。一次，我写了一则《临潼骊山川菜馆开门迎客》的消息——改革开放之初，这样的事情还算新鲜。一位老总大笔一挥，题目成了《骊山上有了川菜馆》。其实，那个川菜馆开在大街上，只是以“骊山”为名而已。还有一篇写秦俑的通讯，文中有“墓圪”一词，发出来却是“墓塘”。我去问校对，人家说：“我们还以为你写的是半个字呢。”还有一篇写栎阳镇的通讯，其中写到县西村。发表后评报栏里出现一个红色的大问号：“是镇西村还是县西村？”划问号的同志不知，栎阳在西汉时曾为“万年县”，因而确实就有了这么个县西村。

长期编副刊，外埠的作家不说了，省圈内的绝大多数作家的稿子都看过、编过。有的作家名气不小了，可稿子呢，内容不说，字先写得缺胳膊少腿，繁体、异体、简笔、行草混杂，的地得不分，折来绕去，夹缠出一串一串的病句。于是不免叹惜再三，对其文稿的价值，甚至敬业的程度都大大地产生了怀疑。因了诸多鉴戒，我就常给我自己，也给那些想当记者、当作家的人讲，最基本的是最不该忽视的，白纸是脸，黑字是眼睛鼻子嘴，一点点的马虎都要不得。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12月8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不看也罢

也曾兴致勃勃地跑十几里乡路去看一场电影《红灯记》，并为李玉和的英雄举措感动得落泪；也曾为看一眼电视，巴巴地央求那位公社干部，结果被拒绝在门外；也曾一早进城，连看四部影片，还不误晚上学校的电影专场……

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大彩电摆在家里，闭路电视几十个频道，晚饭后，摁着遥控块，挨个地扫视两遍，吸引住了，多看几眼；吸引不住了，啪一声关掉。光顾电影院也成了稀罕，除非单位包场，且在能走得开的情况下。

对影视剧的态度，为何有如此明显的转变呢？

大家知道，我们这茬人在最需要甘泉、雨露的时候，遭遇了人为的旷日持久的“干旱”。于是，仅有的几部被树为样板的文艺作品，就成了不由你不选择的选择。况且，那时候胸膛里好似一个理想和幻想的油气田，一遇火种，便熊熊燃烧，泪水也旺盛，稍稍激动，便扑簌簌夺眶而下。

如今不旱了，泉也多了，雨也多了，甚至频频发生“水灾”。物以多为贱。胸膛里不再有见火就着的油气田，泪腺也成长得相当坚韧，不那么易于激动了。

社会日趋多元。信息多，诱惑多，宣泄的途径多，排遣的方式多，影视和唱歌、跳舞、打牌、垂钓、游山玩水、养猫养狗等等一样，只是娱乐手段之一而已。拿我来说，上班时有看不完的稿子，下班后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似乎都值得去做并需要努力做得尽量好些的事情。于是，几乎没有大块的时间，也没有大块的兴趣在银幕、荧屏前一坐几个小时。

曾有人问我对振兴秦腔的看法，我说秦腔曲牌苍凉悲壮，能把人听得荡气回肠。但一件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你唱了我唱，翻来覆去地唱，一唱老半天，就和现代化的生活节奏不相吻合了。电视剧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见得有多么丰赡的内容，却一拉十几集、几十集，加上重复的片头，一大堆人名的片尾，

中间再插播些广告，让忙忙如我辈者，难得耐着性子看个浑全，于是索性不看。

文艺创作最要紧的是个“新”字。我们的编、导、演于新时期的影视剧，劲没少努，精没少成，使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上乘的作品有目共睹。其成功的精核，说到底在于出了一个“新”。由于存在着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和局限，我们更多的影视剧就难得一“新”了。题材雷同，内容重复，手法单调，语言模式化，加上表演上的做作与虚矫，使人一看开头，便知结尾；演员嘴巴未张开，便知其要说些什么；不该笑的地方笑，不该哭的时候哭，让你莫名其妙。花费时间看这样一部作品，不能说没有收获，但的确比不上读一篇颖拔独步、精湛妙绝的文章那样让人受益匪浅。

比如《画魂》，公映前媒体上吹得很玄。坚持看完后（单位包场，看过一半就想走），觉得并不比原作高多少。巩俐怎么看都是在“演”一个画家，尽管很费力，却远没有她的“九儿”“菊豆”来得坦然。这样的电影，看了也就看了，不看也用不着遗憾。

如此感觉，不妨推而广之，适用于眼下众多的影视剧，这便是我这篇文章的题旨：看也可以，不看也罢。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7月21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夹缠”的评奖

今年的“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了，奖项多达一百二十五个，中奖概率几乎是二分之一。有的传媒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为题来评价这种贬了值的“满天飞”评奖。我却想到了两个字：“夹缠”。够格的评上了，不够格的也评上了；不该评的没评上，该评的也没评上。好比我们去市场买葱买蒜苗，壮大顺溜的有，细小毛糙的、烂根带泥的也有，“夹缠”成一捆子，卖给你。当然不只是影视界了，戏剧界、文学界、企业界，以至于各个行业的评评选选，似乎都成了这种情形。一个显例是《诗刊》推举 20 世纪最具影响的五十位诗人，一些对新时期诗歌贡献重大的诗坛才杰（如北岛）榜上无名，而《诗刊》的编委和工作人员竟占去了十四个名额。我相信，这十四名中肯定有够格者，也肯定有被捎带、被照顾、被提携者——这就叫“夹缠”了。

为什么会“夹缠”呢？只要稍将各种评奖的“皮儿”剥一剥，就会露出“利益”的“核”来。中国有几千年人治的传统，人治导致“官本位”渗透到方方面面。权利权利，有权就有利。于是你看，如果哪个地方评个什么奖，这个“什么”有行政官员以作者、编剧、策划、监制之类的身份参评，那么这个奖就几乎少不了这些个官员的。为什么少不了呢？一种情形是这些个官员本身就是评委，甚或是这次评奖的筹划者和负责人，可口可乐的好吃食摆在眼前鼻子下，岂有不伸筷子的道理？况且，“见荣誉就让”的年代早成了过去，现在流行的是“排排坐，分馍馍，你一个，我一个”。再一种情形是这些个官员虽不是评委，或评奖的筹划者或负责人，但却和评委们有各式各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评委也是人呀，也得食人间烟火呀，单位的经费得靠官员拨，子女的工作得走官员的门子安排，自己的职称、升迁、待遇等等得靠官员点头，于是心里虽明白某某官员的作品够不上优秀，甚至差的码子很大，却也心照不宣地划投一票。

那么，非官员的某些不够格的人物、作品又是如何“入围”的呢？不外乎下

面几种情形：一是“活动”主管官员，通过某某官员给评委们施加压力，这一招往往特别奏效——谁谁谁都说话了，大家还不得考虑一番吗？二是“活动”评委，这一招得费些神，因为评委不止一个，于是就需要“ONE EY ONE”地“拜门子”了。三是“活动”赞助商，这一招也很厉害，因为赞助商是奖金奖品还有评委们要装进腰包的“评审费”的提供者，财神爷的意见，岂敢不当回事？四是自己干脆当一回“经济人”，为评奖拉一笔赞助，我把钱都给你们拉来了，你们还不给我一个奖？——往往是拉的钱越多，所得奖项的等级越高。至于“活动”的方式，就“八仙过海”了。请客吃饭，许以条件；送一份“薄礼”，表达表达心愿；如果对方需要，自身也具备，脸面呀，身材呀，奉献奉献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总之是为了得奖，可以不在乎手段。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得人以桃，报人以李；有利要图，有欲不刚。评委受到多方的牵制，且得了多人的好处，自己也有小“算盘”要拨拉，开评时就得照顾多方，给多人说好话，这时候，什么标准呀，原则呀，就要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让位给“利益”了。

如此这般的评奖，岂能不“夹缠”？如此“夹缠”的评奖，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失去了公正，还有什么品位和权威性可说？又怎么能够服大众？“夹缠”的评奖，对该得奖的得奖者不公平，等于蹇驴骏马一车套，紫铜黄金一炉烩。对该得奖的未得奖者不公正，等于剥夺了他们价值社会化的一次机会。对不该得奖的得奖者是一种毒害，惯了他们的毛病，加重了这些人灵魂的颠倒和错位。对社会而言，则失去了效范性，助长了营营苟苟的邪污之风；大家谈起某某评奖来，往往是哂哂一笑。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些不该得奖的得奖者并不是学习赶超的对象，而是一个社会是非混淆、价值失衡、精神滑坡、崇高贬值的活标本。

至真至善至美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峰巅，求纯求洁求精是通向峰巅的必由之路。尽管这个至高点人类也许永远达不到，但不断地向这个至高点进发，正是一个民族精神振兴的希望所系前途所在。我们总得向上走而不要向下滑吧？基于此，“夹缠”的评奖可以休矣！

（刊于《各界导报·百姓周刊》1999年7月2日、《海南特区法制报》1999年8月3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华山焚书与“爆冷门”

《文友》编辑部决定在 20 世纪末的最后一天，搞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国作家世纪末大焚书”，即邀请一批青年作家登上华山之巅，在钟声敲响的那千载一刻，将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付之一焚，“以与旧的世界、旧的观念、旧的世纪告别”。——这是该杂志继“评选中国十名最差作家”之后推出的又一策划。传媒对这件事反应强烈，有的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文友》又出怪招，作家表示反感——焚书辞旧，荒唐！”认为这是一项“让人不可思议的荒诞之举”，相信“届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参与这种炒作”。（《西安晚报》1999 年 7 月 1 日）出现这样的“非议”是很自然的，好比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在街上走，忽然有人双脚并拢地跳了几步，甚至自得其乐地唱起来，人们便纷纷报以诧异的目光：这人是不是有病？——前次《文友》搞“中国十名最差作家”评选，就被认为是“文坛上的一声怪叫”。

然而，静下心来想一想：难道中国就不需要评一评“最差作家”？我们总是评优选秀，发展到当今许多并不优秀甚至“差得码子大”的作家作品，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优秀”的行列且搔首弄姿招摇过市。在全社会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状况下，评一评“最差”，给一些发烧的脑袋一剂清醒一些警策，有什么不好？——至于评选的方法是不是科学，评出的结果是不是公允，那是另一回事，尽可以评头品足，以事改进。还有这次的“焚书辞旧”，怎么就“不可思议”了？几个作家带上自己的作品，到华山顶上烧一烧，怎么就如京城某“资深记者”和中国作协某“著名作家”所言，“浮躁”得“十分荒诞”了、“非常可笑”了？甚至让人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了？——这样的联想倒多少有点可笑，动辄将一种文学活动和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是“上纲上线”的脑细胞还在活跃？至于“是否要在本世纪末最后一天把最好的建筑物炸掉？把最优秀的艺术品销毁？”的指控就有点于逻辑不顾了：作家们能把自己的作品拿到华山顶上去烧，



也就意味着他认为这作品对他而言已不是最好的了最优秀的了；即就是社会公认那是最好的最优秀的也无妨，因为作家的作品绝对不会只出版一两本，并不会如“最好的建筑物”“最优秀的艺术品”那样，一“烧”就没了。

我曾经对宇宙间的创造现象尤其是人类的创造现象做过些考察，结果发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基本、最普遍的一条规律，竟是“新异替变”。创造学是一种“唯新学”。用“创造”的眼光来看，新的、异的，都是有价值的。“评最差作家”也好，“焚书辞旧”也好，都是过去没有的，不同于常态的，从而便是我们不可轻率地一概否定的。以“焚书辞旧”而言，你或许会说，作家告别旧世纪，用不着采取焚书的形式呀？即就是焚书，也用不着跑到华山顶上去呀？你说的诚然有道理，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告别旧世纪，多样化选择好呢？还是单调成一个模式好呢？《文友》组织这样的活动，谁想去就去，谁不愿去就不去，人家没有强迫你；再者，也莫小看了“形式”，“形式”是一定意义上的“内容”。就像一件新好的衣服穿上身常常能给人带来好心情一样，在华山顶上焚烧自己的书，对有的作家而言，或许是一次重大的“创造促进”：璀璨的星河注目着你，险绝的青山环视着你，松涛浩荡，云雾漫卷，面对大野旷境，无涯时空，你将你的“过去”一页一页地投入熊熊的烈火之中，这时候你就得考虑了：我如何否定过去，超越自己？“过去”是一种无法彻底抛却的包袱，然包袱太重了，我们就不能走到前面去……显然，这样的焚书和自个儿在家里烧，对一个作家而言，感觉绝对是不同的。

对《文友》的诸多指责，如“怪招”“人为的炒作”“无聊的策划”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样我们对《文友》的做法也是理解的。按一位先哲的总结，“出名”的方法大概有三种：捧名人，砸名人，和爆冷门。柯受良驾汽车飞黄河是“爆冷门”。朱朝辉开摩托飞黄河也是“爆冷门”，《文友》策划搞“焚书辞旧”依然是“爆冷门”。“爆冷门”的实质是“求新求异”，尤其是求“大新”和“大异”。柯受良一飞天下惊，朱朝辉一跃五洲闻，《文友》的做法，招来众多的注目，也是不待言的。一个刊物要存活，要发展，总得有人关心有人看呀！对新异的东西，拍手可以，不拍手也可以，而容纳在眼、理解在心又有什么不可以？不觉得吗？几千年带铐负链地、拖泥带渣地走下来，我们民族追求新异的那根神经早已不强健、不活泛，甚至可以说被束囿、被浸泡得接近麻木了，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并努

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今天，“激活”这根神经，显然是太必要了。国家不是在大力提倡“创新”吗？而“创新”，又怎么能仅仅局限于一个科技领域呢。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地赞赏和肯定任何一种“爆冷门”，因为对人类创造而言，不但要遵循新异替变律，还要遵循文明积淀律，也就是说，你的创造、你的“新异”，必须和人类追求文明的大方向相一致，必须遵守整个人类经过几千年淘漉所认识和总结的一些最基本的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如优化的原则、进步的原则、人道的原则，等等，否则文明积淀律就要制约你、惩罚你。——在大街上跳一跳可以，高唱几句似乎也行，跳得高妙、唱得好听还会有人给你鼓掌、为你录像，但如果突然当众脱光了衣服，怎么样呢？新异是新异了，但警察就要来找你了。——《文友》的“焚书辞旧”当然不在此列，因为截至目前我们还看不出它有什么违背文明积淀律的地方。

（刊于《通俗文艺报》总第 407 期、《西安旅游报》1999 年 7 月 16 日、《各界导报·百姓周刊》1999 年 8 月 3 日、《学问》2000 年第 1 期）



## 为什么要编这本书？

2008年8月30日，西安举行了一个“紫香槐散文丛书暨当前散文创作研讨会”。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在最后的感谢发言中讲了“一”“二”“三”：“一”是一颗诚心，即继续以一贯之地保持对散文、对文学、对朋友、对世界的一颗真诚之心；“二”是两个高度，即“努力写到自己的最好”“争取写到别人写不到的份上”；“三”是三句感言：1.从作者角度说，“好文难写”，过得去不难，过得硬不易；2.从读者角度说，“妙文难得”，即能读到的精妙之作总是不多；3.从发展的眼光看，“尚可乐观”：出版不易，发表不难；博客繁荣，万马奔腾；新人新言，可学可鉴；大浪淘沙，真金裸现，苍茫世界，期待卓然。

讲了这一番话后，我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尤其是“好文难写”和“妙文难得”。是啊，一个作家，呕心沥血，笔耕一生，然特别出色的，即自己认为最能体现水平的、别人也觉得非常好的散文，也就一两篇。这一两篇，就是所谓的“代表作”了。代表作，代表作，唯此作情真且美抒、思邃且妙达，能代表作为散文家的作家也！就像《逍遥游》之于庄子、《岳阳楼记》之于范仲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于鲁迅、《背影》之于朱自清、《寄小读者》之于冰心那样。然而，我们也发现，不少人虽也风风火火地行走在散文家或作家的队列里，但若问此君有何能让人记忆深刻、百读不厌，且一说其文便知其人的作品？大家竟都瞪眼、摇头、口齿支吾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于是，我想到了编一本专收当代作家散文代表作的书。所谓“当代”，指生活在21世纪，至今还健在的作家，古代的作家和上个世纪的作家，其作品多有定评，选本也已很多，就不再考虑了。这是第一。第二，此前，当代作家的散文选集已出过很多，如种种“年选”“精选”，但选的未必都是代表作，或作家本人认可的代表作。第三，对有些作家来说，其代表作可能不止一篇，那么，选两篇三篇呢，还是只选一篇？只选一篇，萃中拔萃，精益求精。第四，谁来选呢？作

家自己选。作家选定作品后，最好再写一百字以内的《自评》，谈一下此篇何以成为代表作、自己为何要选这一篇。

我将这些想法谈给我的老同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高经纬先生，得到了老高的肯定和支持。于是，我们便携起手来，抱着为中国的文学事业、文化建设做一件好事的态度，开始了这本书的策划、约稿、编辑、设计、印制、发行等等工作。

（2008年9月2日于西安慧雨庐。此书项目后来未实施）



## 幸运的行当

我的写作生涯，正儿八经地算，是从上大学以后开始的。这之前，中学时代，喜欢语文课，作文也写得不错，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还在县内一些中学展览过，在全县的有线广播上播出过，但那只能说是基本功的练习，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将来要吃写作这碗饭。1977年夏天，参加高考，在填报的志愿里，我写有中文系，没有料到，录取我的，竟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走进校园后，在学哲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等课程的同时，我开始了对文学的关注，常常去听中文系的课，也开始尝试着写一些文学性的东西。

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叫《刻在心灵上的记忆》。这是一篇“伤痕文学”，以亲历的事件为蓝本，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写了“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冤案。我写得很认真，改了再改，然后郑重地抄在方格稿纸上。那阵子，系上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在宿舍楼道办了一个创作园地，我的这篇小说被作为第一期的“头条”贴了出去，七千多字哪，一大片子，有没有人耐着性子去看呢？还好，一贴出去，就有同学围着看，其中不乏满面春风的女同学，看着她们仔细欣赏的样子，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趁热打铁，我又以工厂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第二篇小说《他与她》，由于写的是青年人的“爱情故事”，贴出去后，似乎比上一篇还受欢迎。接下来，我又写了第三篇《婚愁》。这是一篇“问题小说”，反映的是当时农村严重存在的买卖婚姻的问题。这次我没有朝出贴，而是投给了中文系办的《渭水》。这都是入校的第二学期，即1978年秋冬的事情。

1979年4月，春暖花开的时候，《渭水》第二期出版了，《婚愁》被放在头条位置。拿到杂志后，看着自己的名字和作品第一回变成铅字，我竟有点不敢相信，双手竟莫名其妙地有点发抖。尽管《渭水》不是正式出版物，《婚愁》也不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品，但它们对我的意义是非常的，因为这是一个标志啊。当面对着散发着墨香的杂志的时候，当我把自己的变成宋体字的作品再读一遍的时候，

当接受同学们的祝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决心：从此后，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这个叫“写作”的事业，不能分割了。

细想起来，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我做出这样的抉择。首先是外部的大气候：那时候，改革初起，创作界占潮头之先。《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一经问世，便全国轰动。让人觉得文学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辈子若能搞写作，也写出让世人争相传诵的作品，既释放了才华，又影响了社会，真是太伟大太光荣太美妙了！其次是内心的小认识：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茬人，是背着毛主席语录、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我们曾经崇拜毛泽东，也崇拜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伙人。如果说林彪事件，因年龄尚小，对心灵的刺激还不算太大的话，“四人帮”的倒台，刺激就很大了。今天还是革命家、理论家、伟大的旗手，明天就变成了大坏蛋、臭狗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看来，政治这玩意是险恶的！如此险恶的行当，不适合咱们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去做。那么，做什么好呢？写作吧。尽管文学这个“花姑娘”，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这个“色狼”的纠缠，但她毕竟属于艺术的门类呀。

从此，纸和笔，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身边的电脑，成为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算一算，在这个行当里，已经扑腾了二十多个年头了，成绩嘛，当然有一些，算不上大，也谈不上多么突出。发表了六七百篇文章，出版了十几本电子书，加起来大概有四五百万字吧，还有幸获得了“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其间，也做过其他方面的尝试，比如经商，兼职办公司，能干，干得也还行，只是觉得意思不大，不干了；还有，进官场，谋个一官办职，有过想法，也做过努力，只是“浅尝”了一下，就“辄止”了。为什么呢？不愿意放弃某些自认为不该放弃的东西而已。

人生苦短，若能做自己喜欢做、能够做的事情，就算是幸运了。这有点像男女婚配，如果搂在怀里的，不是你的所爱，那感觉，肯定是很乏味、很无奈、很糟糕的。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者。

（刊于《文化艺术报》2003年4月30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庞进文集第八卷·美抒妙达》后记

我整理、润色、撰写这部书稿的时节，正是夏暑之热燠体，至初秋之风拂面，月季、玉簪、紫薇、木槿、绣球、向日葵等等花儿开得如火如荼之际。于是，我看到了烂漫缤纷的色彩、千婀娜娜的姿态，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芳香。

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作家陈嘉瑞写的一篇《爱花的男人》。文中说“一个男人如果爱花，这个男人一般则不会懒”，理由是这个男人爱花就希望花开得好，要让花开得好，就得舍得在侍弄花儿上投入精力和时间，就得勤快。我爱花儿，却没有投精力和时间于侍弄花儿。但我也勤快。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大凡花儿开得好，就有不辞劳苦的蜜蜂儿光顾，为了一个甜蜜的事业，他们总是不厌其烦、自得其乐、嗡嗡有声地勤快着、工作着。这便给我以启发、以感染，激励着我也不厌其烦、自得其乐地勤快着、工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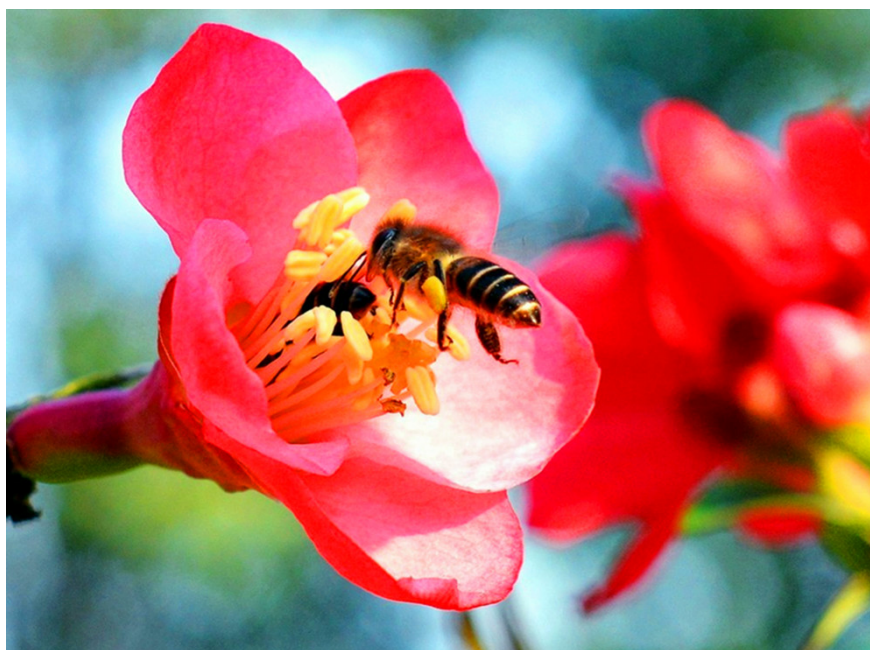
我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事写作，尤其是 1984 年春天入职西安日报社编辑副刊（2017 年春天退休）以来，和许多作家、作者、艺术家、评论家、文化学者有了交往。以年龄论，他们有的属于令我尊敬的长辈，我从他们的著述中汲取过无尽的营养；有的是我的同龄人或接近同龄人，其中若干位，成为与我心神相通的堪称“知音”的朋友；有的小我十几岁、二十几岁，他们使我看到了文学艺术如大田里的庄稼，总是一茬一茬地茁壮成长。我或采访过他们，或编发过他们的文稿，或为他们的著作写过序言、评论。

本书中的大部分，就是我几十年来写的关于他们的特写、报告文学、序言、评论、信札、散文、随笔。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微笑着，和我作剖心之谈。他们的故事、情思、才华，常常令我感动、赞赏，也给我以启示、参照、激励。用哲学的话语来说，我写他们，既是他们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学化，也是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学化，我在升华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升华我。而长期的笔耕生涯，使我对文学、对艺术，也已形成了一些基

本看法，如认为“文学艺术根源于人本身”“情之美抒、思之妙达”是文学艺术的要旨、诀窍等。这些观点，在本书的若干篇章中亦有展开阐述。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 (<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

(2023年9月5日是于加拿大枫华阁)



甜蜜的事业（吴歌 摄）